中国现代儿科学奠基人

诸福棠教授的一生

中国和平出版社



现代儿科学奠基人

——诸福棠教授的一生

刘文典



賢照國手

兒童福音



彭真

一九八八年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道德高尚
医术精深
京華鶴譽
人之師表



諸福崇同志九十大庆

陸定一敬贺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祝涂福崇老师

吾師德業薄紫雲
公慈勤和苦耕耘
從不為名名益重
老梅一樹吐清芬

胡惠美 謝志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和彭真同志合影



1927年，协和医学院毕业照

1947年，和吴瑞萍（右）、邓金鍌（左
在北京府前街儿童医院合影



诸教授（左四）查病房



1956年，诸教授（右一）在哥本哈根第八届国际儿科学会联欢晚宴上，右起：上海陈翠贞教授、徐庆丰教授和夫人



1963年，参加苏联儿科学会

1979年，和夫人朱定一赏花



1980年，伏案工作



1982年，研究修订《实用儿科学》，左一为诸教授



1985年，和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及胡亚美大夫合影



1985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向诸教授赠送条幅



1985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左三）向诸教授祝贺《实用儿科学》出第四版



1988年，北京儿童医院与加拿大同行结为姊妹医院，左起：周华康教授、诸福棠教授、吴瑞萍教授、胡亚美大夫、江载芳大夫



和孩子们欢度六一

序

我和诸福棠教授自20年代在协和医学院前后同学，毕业后又同在儿科领域内一起工作，在这悠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在诸老的率领下，从事我国逐步壮大起来的儿科事业。首先在协和医学院小儿科，1942年2月协和被迫关闭时，诸老是儿科襄教授、科主任，我是儿科讲师。此后，在他的创议和领导下，与当时协和小儿科的邓金鍌助教，三个人合办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解放后不久，我们把医院献给政府，以后改称北京市第二儿童医院，即1955年6月1日开幕的北京儿童医院前身之一。从1925年秋季到今天的64年里，我同诸老可说是朝夕与共，形影相随。我对诸老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知道得最多，体会得最深。他的特点是，目光深远，心胸开朗，事业心强、决心大、意志坚，有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精神，有先人后己、重视团结的美德，待人接物的真挚诚恳，尤为感人。诸老学问的渊博，医德的高超，我自信永远赶不上，学不尽，但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长期相处，多少亦会受到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能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朝夕相伴，确实是我毕生莫大的幸运。

诸老把毕生精力投放在我国儿科事业上。自从当医生开始，即全神贯注地致力于儿科的发展和争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早就洞悉医疗、保健、教学、科研四项工作同样重要，缺一不可。他愿望国内建立更多更好的儿童医院和保健机构，要办好

医学院校的教学和毕业后的专科进修，又要注重科研，基础与临床并重。诸老无时无刻不在为这些工作考虑和操劳，而且常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想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他所以能有今天的功绩，完全是由于继续不断的长期奋斗。

据我所知，诸老的一生中，有过两个关键性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1929年诸老因父母相继去世，回原籍无锡办理丧葬事宜，被当地教会所办的普仁医院美籍院长李克乐所器重，恳切邀请诸老留在无锡协助他办医院。盛情难却，诸老便留下了。后来协和的美籍儿科主任魏吉多次发信催促他回北京，诸老终于次年春天遄返协和，继续担任助教。如果当时不听魏吉的忠告，势必限于当一名开业名医，而难以对我国的儿科事业有如此建树。第二个转折点是，1941年诸老本可享受协和教授例行到国外休假进修的待遇，但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国家民族岌岌可危，诸老忧心忡忡，哪有出国游学的心情，便毅然决定放弃这个出国机会，留在北京，与同道共肩重任。那时他如果离开，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势必困在美国，长时期不能回来。那么，与我们共建北平私立儿童医院就不可能成为事实；解放后诸老对我国儿科事业的贡献亦无从实现了。

诸老致力于儿科事业的同时，经常为全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如1987年是诸老从事儿科工作60周年，北京市卫生局领导决定拨巨款庆贺。诸老闻讯后，立即上书卫生局局长恳切推辞，列举了不少能说服人的理由。局领导理解诸老为国为民的崇高心情，取消了庆贺活动，并在报上刊出诸老原信的一段，号召全市医务人员学习诸老“为国分忧从我做起”的精神。诸老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和他所培养的医务人员，对此一致拥护，认为这一举动对全国医务人员影响之大，难以估量。诸老忘我的思想境界和实际行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这本传记的胜利完成，同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实事求是精神

是分不开的。文典同志早有为诸老写传记的心愿和一定能够写好的信心。他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各个方面搜集资料，亲自走访了熟悉诸老历史、生活和言行的人，主要依靠诸老的老同学、老同事和诸老亲自培养而又与他长期共事的学生们，所以全书内容既丰富多采，又真实可靠，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又经常和我们商酌讨论，力求记事翔实，避免夸张。作者以解放前后的史实为背景，从对比中衬托诸老的一生，描写其热爱儿童，重视科学，信赖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全书运用了优美流畅的文笔和轻松愉快的风格，尤为此传记增色不少。

吴瑞萍

1989年8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风雨飘摇之季

一、生逢颓世

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妥协退让，终至遭到惨败，从此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伟大国家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锦绣山河成了帝国主义任意宰割恣意掠夺的“势力范围”！在英俄帝国主义协定瓜分大半个中国的当年，也就是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1899年阴历10月26日（公历11月28日），在无锡县东亭乡杨亭村，一个小生命降临人间，来到了这片受尽屈辱的国土上。襁褓中的诸福棠的声声啼哭使全家人感到由衷地喜悦。他是三代单传的诸家新一代的独生男儿，他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和希望。

这一户人丁虽不甚兴旺，却算得上一般的小康之家。杨亭村上姓诸的占大多数。诸氏族中按照拥有田产多少分为大房、二房、小房，诸福棠祖先属于小房，不足十亩田。老主人、诸福棠的祖父是一位“儒医”，靠多年积蓄购了些田产，最多时达到三十几亩。杨亭村背靠杨婆圩，村中有一条东西向的杨亭河，诸家就在河北岸。由于诸福棠的祖、父辈均已故去，他的终生未嫁的小姑母和他自己都在外边工作，旧家屋已多年无人居住，一直给杨亭小学作为校舍。这户人家虽已人去屋空，几代人的嘉言懿行还保存在乡亲们心中。同村施乃康老人，年近九十，没离开过杨亭，他记性好，小时候的事情能详述细节。他说：“诸

家人热心公益事业，常为村里办好事。诸福棠的父亲诸金吉创办杨亭小学让村里孩子们读书；还出钱修路，在村里设置便利乡亲们投递信件的邮筒，用给老母作寿的钱在村北高拱式的万安桥上安装铁栏杆，保证行人安全。诸福棠的小姑母诸希贤用自己做教员所得的工资帮助村里的少年读书。”诸福棠的堂叔诸莳良曾在无锡医专任中医教师，他有个得意门生名过永德，也是杨亭人，现在东亭乡医院工作，过永德与莳良老师关系密切，曾亲侍老师病榻前，并为老师送终。在多年相处中，过永德从老师口里听到许多琐闻轶事，对诸福棠祖辈深怀敬意。他说：“诸福棠的祖父诸玉鸣是闻名乡里的老中医，因他小名瑞清，村人称他‘清官’。诸玉鸣为人清廉公正，行医看病从不多收分文，穷苦患者还免交诊费。”

当年，诸福棠祖先在人文荟萃的无锡有一定的代表性，几代人都是潜心读书，不是悬壶济世就是教书育人，克己奉公，乐于助人。他们为人处世的家风和主要成员的言行，都在诸福棠幼小的心灵上打下过不同深度的烙印，影响他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二、民众的厚望

时约八十年前，上海有一家无敌牙粉厂生产一种“三圆牌”牙粉，牙粉袋正面印着三个圆形的像片，其中一个着学生装的少年在刷牙，那就是幼年时期的诸福棠。其他两个少年分别在制造和出售牙粉。

诸福棠当时正在上海南洋公学高小一年级读书，他在班里年龄最小，但成绩优异，评为品学兼优。工厂主恰恰看中了这一点。这就不难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和美好愿望了。那个年代正值腐朽衰败的清王朝面临灭亡，中国几千年封建君主专政制度行将彻底崩溃的前夕，民族资本主义在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

破土萌芽，初步建立了几家现代企业。“三圆牌”牙粉便是其中初发的幼芽。牙粉厂主寄厚望于未来的青年，独出心裁地宣扬几个“才露尖尖角”的小学生，向人们宣示知识人才的重要，暗喻这是“实业救国”、求存图强的希望之所在。当然，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宣传他的产品，似乎用“三圆牌”牙粉刷牙，人们可以变得更聪颖，能够加速成才。不过，在那个年代这位厂主有如此远见卓识，也确属难能可贵。那刷牙少年日后果然大有作为，成了饮誉海内外为国增光的著名科学家、我国现代儿科事业的奠基人。

现任无锡市政协委员的诗人、书画家倪小迂老先生，比诸福棠小一岁，今年89岁了，与诸家沾点亲戚，二人自幼一起上学玩耍，至今过从甚密。谈起童年时的诸福棠，倪老兴致极高，绘声绘色地说个不停：“福棠性格温柔，象个姑娘，从不和小朋友打架。他书念得好，年年考第一名，从小就是个好学生……”倪小迂对那牙粉袋上的诸福棠记得清清楚楚，印象很深。

年甫“束发”的诸福棠才华早露，引起人们格外看重。在家乡亲友之间，他也由于温厚善良的性格和安详儒雅的风度赢得称赞。离杨亭村七八里路的前旺村有一位叫朱云亭的中医和诸福棠的父亲是朋友。自幼多病的诸福棠时常到朱云亭寓所求医。他小小年纪知书达礼，对长辈毕恭毕敬，谈吐举止温文尔雅。朱云亭夫人看在眼里，渐生爱心，暗自为长女选下夫君。长女定一对那少年也颇有好感。二人稍长便开始了“半自主”的自由恋爱，终成眷属，恩爱如山，白头偕老。1974年二老度过“金婚”之后，朱定一还跟老伴儿开玩笑：“你小时候去我家看病规矩得很，母亲很喜欢你，说你不会干坏事，愿意把女儿嫁给你。”

鉴往知来。社会对童年时代的诸福棠给予的评价，并意识不到有什么特殊意义，但知道人们看他努力读书求新知，希望他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看他品德好有教养，期待他继承发扬

中华民族坚毅朴实、勤奋上进的优良素质，为国为民作出贡献。这种民众的愿望，正是他一生为祖国建功立业，为人类作贡献的一种力量源头。

三、祖上懿风

诸福棠的祖母范氏，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后裔。她慈详善良，精明能干，虽目不识丁，却有满肚子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动人故事，令幼年诸福棠听得入神，牢记至今。祖母说，范仲淹是贫苦出身，儿时难得温饱，一碗粥要划开四份，分顿吃。他自幼勤奋好学，发愤苦读；成才为官后敢言敢行，为民谋福，政治上主张革新，遭保守派反对。范仲淹长于诗词散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为世代传诵，千年不衰，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抱负，成了中华民族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世格言。后来诸福棠上学读书吟诵《岳阳楼记》时，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等名句，更有所领悟。

深受先辈善良祖训熏陶的老祖母，不光给儿孙们讲故事，还联系实际谈自己的体会，她常说："自己吃饱了，要想到还有多少人没有吃的；自己穿暖了，别忘了还有多少人衣不蔽体。不能太自私了，不能看轻穷苦人。"

身为"大清帝国"垂髫小民的诸福棠，受着周围环境和亲人家属的熏染，自幼就有较深广的视野，有一种朦胧的历史感。除了老祖母的故事，他还从老人们口里听说过关于诸家老祖宗的历史传说，说是诸家原从浙江迁来，几经辗转到了无锡。春秋时，吴王夫差攻打越国，越王勾践起兵迎战，大夫文种献计求和，越王允诺，派大夫诸稽郢前往，来到今江苏南部一带的吴国，说服了夫差，完成了议和的任务。《古文观止》选自《国语》的《诸稽郢行成于吴》篇，即曾有此记述。

杨亭诸家的族谱中更有详细记载:“始祖诸稽郢，春秋越国人,《国语》有《诸稽郢行成于吴》篇。吴亡,诸稽郢有功于越,故能留芳于后世。后因越王大杀功臣，大夫文种赐死，范蠡携西施隐避太湖，诸稽郢聚族迁居鲁（山东）之琅琊郡（由此为诸氏郡名),而今鲁之诸城县亦为诸氏子孙昌盛成为大族聚居之地。传至明朝洪武年间迁锡。始祖仲宾公先迁常州四河口欧阳里，再迁（无锡）杨亭横泾头”。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诸福棠从小就知道的，想不到自己的老祖宗曾是此公手下的官员。诸稽郢代表越国从浙江到苏州去向吴国求和是一种谋略，而不是屈膝投降，这一点诸福棠是日后细读古文才明白的；但越王勾践那种刻苦自励的精神却早就打动过他小小的心扉，激发了他奋发图强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意志。

诸福棠儿时记下了许多历史故事和优美的传说。后来又在长辈的身边膝下，从四书五经、古文名著以及祖父、父亲、姑母的言传身教中受到启蒙教育，由此逐步认识到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之伟大坚强。

四、书香门第美少年

诸福棠的祖父诸玉鸣读过很多古书，又从一姓虞的老大夫学习中医。玉鸣老人生性谦恭温和，不苟言笑,为人忠诚无私。开业行医靠技术本领，不事夸张宣扬，把个“内外科方脉”的牌子挂在门内院里。他整日为患者治病，还到远近市镇村庄出诊，总是随身带着两个药包，装着内科开方纸笔、外科开刀用具及敷药疮膏，乡民称便。

诸福棠是祖父绕膝的爱孙，从小受着祖父济世救人思想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祖父诊余吟诵诗篇，叫孙儿一旁随唱，诸福棠渐能熟背多首，印象最深的是唐朝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祖父着意讲解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深入浅出的释义，使孙儿顿有领悟。诗人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哲理，以及教人要有向上进取的精神，竟长期伴随着诸福棠，给他以鼓舞和力量，直至耄耋之年，在教导第三、四代学生要拓宽视野不断求知创新时，还经常引用这名句。祖父教诸福棠读书认字，并讲些故事，丰富孙儿的知识。一天，一家人正在品尝苏州朋友送来的味甘可口的洞庭山枇杷，老人说："'枇杷'二字与乐器'琵琶'音同义异，容易混淆，不可弄错"，随即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城里亲家翁讥笑他的乡下亲家翁写错了送礼单，把枇杷写成了琵琶，便作诗一首："枇杷不是此琵琶，惭愧当年认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笙管尽开花。"时过八十余载，诸福棠还记得这个故事这首诗。他从小读书认真，务求精确，养成了朴实之风，实在是得益于老祖父的苦心教诲。

慈详可亲的祖父对诸福棠有很强的感染力。老人与世长辞时，诸福棠年已十九，他看到乡亲邻里悼念祖父送的挽帐上"一生正直"四个大字，深切悲痛中对祖父高尚的品德益发感到由衷地敬佩。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很赞赏在教育界辛勤工作卓有成绩的诸希贤，对她老父逝世表示哀悼，并亲笔写了一首《玉鸣先生像赞》："袭芝荪、采芳芷，蓄道德、耽文史。医活人、诗娱已，貌温温、真君子。"这是对这位"一生正直"的乡村儒医的真实生动的写照。老人的性格品德隔代传给孙子，诸福棠处世待人敦厚诚挚，温良朴实，酷似祖父。

父亲诸佥吉，自然比祖父同诸福棠相处时间长，对他的影响更多。据史料记载、同乡介绍和诸福棠回忆，父亲一生主要办教育，当过私塾老师、小学教员、小学校长和本乡学务委员。这位末代秀才淡于功名利禄，无意在宦海浮沉。本世纪初，新学渐兴，诸佥吉就在距杨亭七八里路的毛梓桥办起了蓉阳小学，担任校长。诸福棠五六岁随长辈读三字经、四书，也背诵当时流行的三个字一句的《地理歌括》；八岁起正式成为父亲办的蓉

阳小学的学生。男人蓄发辫可谓怪事，当年却不论老汉、小伙儿、幼童，还是新学堂的学生，一律这般怪模样，诸福棠瘦削的颈后便也飘着一根小辫子。

新学堂稍有新内容，除国文、史地等文科知识之外，聘请了几位青年教员，设置算术、音乐、图画、体操等课。那时白话文还无人提倡，主要课程还是脱胎于论语，诸如“过则勿惮改”浅说之类。父亲与祖父不同，他生性活泼开朗，有一股急公好义的豪爽之气，善于交游，有很多朋友。父亲十分宠爱自己的儿子，但感到这孩子忠厚善良有余，却过于柔弱文静，便想方设法在课外另开“小灶”，让儿子多读些书，得到更多锻炼。他给诸福棠个别辅导的重点课程是《孟子》，教儿子从能言善辩的孟老夫子那里学些明辨是非善于处世之道。《孟子》里有一篇《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父亲讲得生动有趣，辅导文章含义也说得深透。故事是说齐国有一个人乞讨别人的坟头祭品，吃些残羹冷汁，回家却洋洋得意地欺骗妻妾说自己赴过盛宴，以示尊贵。父亲说，这篇文章是在痛斥那些追求富贵利达之辈的卑鄙无耻，教人要有骨气，不可趋利忘义，不知羞耻。诸佥吉教学生读古文，自己也时常动笔著文，他写的《残荷记》不失为寓哲理于写景抒情之中的佳作，用来作学生们学习的范文，也借以教导儿子做人要有气节，出污泥而不染。

父亲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的种种言行，对诸福棠是更好的教材。诸福棠还清楚地记得几件事：父亲早年在外教家馆，一次领了薪水回家途中，遇一朋友有急难待援，便把大部分薪金送给朋友了。父亲听说有个本地青年考取了清华学堂，知道那个年轻人很聪明，有才华，但经济困难，即代为设法，转请一家富户资助他上大学。至于父亲在家乡办学以及修桥铺路等慨解义囊的种种善行，倍受乡亲邻里的赞扬，对诸福棠影响也很深。

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不失时机地在这株幼苗上浇水培土。有一天，父亲带诸福棠进城，在行船途中即兴出了一道历史故

事题，对儿子进行知识测验。他说，一个船上有三个人，一个摇橹的，一个煮饭的，一个掌舵的。汉高祖刘邦手下就有这样三个人帮他创业。父亲问："是哪三个人？你喜欢做哪一种人？"诸福棠10岁时不但已看过《三国演义》,也学看《纲鉴易知录》等古籍，知道"汉初三杰"等一些历史名人故事。他立即回答父亲的提问："韩信是摇橹的，肖何是烧饭的，张良是把舵的"，他还兴奋地大声说："我要学张良！"父亲不禁大喜，尤其高兴的是儿子要以善于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张子房为学习榜样，这正是他最想得到的答案。

说杨亭诸家是个"忠厚传家"的门庭，并非溢美之词。诸福棠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长辈们教导熏陶下度过的。他从小积了些古诗文的根底，培养了良好的品德和一定的文化素质。他的大姑母嫁在一个殷实人家，他常去和表兄弟们玩耍。那家有一座林木繁茂的小花园，是孩子们畅游戏闹的好去处，也成了诸福棠的另一座课堂。善于思考的诸福棠细心观察各种花草树木，记下名称，问清习性和栽培方法，慢慢形成一种爱好，至今喜欢养花弄草。逛公园是他施展才能的好机会，他给随行的年轻亲友详作讲解，这是什么树、那叫什么花，奇花异草、各种树木，无不知晓，令人惊叹。

诸福棠没有让长辈们失望；但他的"可塑性"也不是毫无限度的。况且他还在受着那个历史时代的影响。他上蓉阳小学的第二年，1908年（光绪34年）11月底，学校门口悬起白帐，挂了两个大白球。原来，38岁的光绪于当年11月15日含冤病逝于瀛台的涵元殿。谁知，实际置光绪于死地的"老佛爷"慈禧那拉氏第二天也一命归天了。寿数将尽的清王朝为此大办"国丧"，诏示全国缟服素餐。九岁的诸福棠没有感到悲痛，反而为一个比自己还小六岁的儿皇帝坐上了金銮殿而觉得好笑。大好河山，几亿百姓，能由一个三岁娃娃统率治理吗！诸福棠没有预测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能力，对大千世界的风风雨雨也知之

甚少；但在反帝反封建新生革命力量对反动腐朽王朝最后冲击的怒潮里，也开始嗅出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到了辛亥革命（1911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高小读书，才能手舞足蹈地开始改革自新，首先剪除了那条下垂十年之久的小辫子。

第二章　好姑母

一、诸家“小妹”气概不凡

在诸福棠童年时期，对他的影响特别大的人，是他的好姑母诸希贤女士。

诸希贤生于清光绪 8 年（1882），她在同胞中排行最小，村人都叫她“小妹”。当时的乡村中女子极少读书识字。诸希贤自幼爱听故事，并能熟记复述给别人听。父母令她入村馆试读，三年后随兄长、诸福棠的父亲念书，不久兄长外出教书，她就跟母亲学纺纱，又随父亲学读中医书。17岁就在村里私塾教女孩子们读书。

诸家“小妹”不一般，她脑子灵，思想活，追求进步。当时女学初兴，她就决意外出求知，考入本县侯葆三办的竞志女校师范科。她学习成绩优等，校长让她在附属小学兼课，还免她学膳宿费。“男儿志在四方”，且看“女儿”志如何？诸希贤志向高远，听说当时我国唯一的女子师范学校——天津北洋女师招生，就借得三十元路费随熟人搭轮船（当时还没有津浦铁路）赴津应试，果然金榜有名，入学后专修数理新课，获最优等成绩，每月可得奖学金（当时叫津贴）。她用一部分钱买些参须、红枣之类补品寄回家孝敬父母。毕业后，诸希贤被分配到新开办的北京女高师任教，不久被聘为学监主任。四年后，无锡县教育局长再三恳请她回乡效力，盛情难却，1924年诸希贤南返担任了无锡县女子师范校长。

诸希贤在无锡女师任职期间，尽心竭智地搞好女子教育事业。她坚持勤俭办学，以节约所得修葺古城隍庙旧校址，扩建教室，添置教具，还在附近买下一块地皮，修了一座大体育场。她培养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齐头并进，全面发展。学校声誉日著，报考新生踊跃，在校学生由二百多猛增到八百多。江苏省教育厅长到校视察，当场命题考验学生，众女生解题纯熟，对答如流，极少差错。那位厅长见这个女校不仅教学有方，课外活动也能普遍开展，学生活泼而有秩序，守纪律懂礼貌，实为全省罕见，于是明令嘉奖，并传达到省属各校，以资观摩。

二、杏坛名师

诸希贤是极受尊崇的教育界名人。1982年，无锡女师（今无锡市十一中学）七十年校庆时，应历届毕业生之请，学校代为复印诸希贤校长像片，人手一帧永做纪念。当年十几岁的女学生如今都已届高龄，大家重聚母校一起回忆老校长勤俭办校、诲人不倦、乐于助人种种感人事迹，闻者咸为动容。

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诸希贤忠诚正直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那就是帮助严朴同志的夫人过瑛及其四个女儿的故事。陈云同志在所作《严朴同志传略》（见1949年6月10日《人民日报》）中介绍说：

“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严朴同志即转入无锡农村，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的武装斗争，被任为农协的委员长，他是无锡一带农民拥护的领袖，曾经是农民心目中的‘神仙’。1929年秋他在上海被捕，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严朴同志参加过长征，到苏联学习过。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服从组织的分配。1949年6月不幸病逝于北京。”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宁沪一带笼罩着一

片白色恐怖，严朴同志被通缉在案，全家受牵连，田地房产全被反动派没收，他的妻子过瑛被迫带着四个女儿外出谋生。诸希贤见义勇为，慨然聘任过瑛为县女师舍监，还收留她的四个女儿（大女儿即曾遭林彪、江青残酷迫害幸免一死的严慰冰）在女师免费就学。严朴同志的五个亲人绝路逢生，度过了难关。严慰冰为纪念过瑛同志逝世十五周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母亲》，文中提到："母亲……幸被当时无锡最有声誉的女校——无锡县立女中颇有胆识的女校长诸希贤先生聘为舍务主任，并答应女儿们上学可免缴学费……"这以后，诸希贤还多次借钱、出力帮助过瑛。一次，过瑛接过诸校长给她的四十块大洋，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你校长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诸希贤一生勤俭朴实，粒米片纸也不浪费，却急公好义，慷慨助人。受她资助而成才的女子大有人在，无锡有名的严家四姊妹、章央芬（解放后曾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及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务长）三姊妹，都是经诸希贤提携相助蔚成大器的。

三、热血浇鲜花

乐育英才的诸希贤也把深沉的爱给了她的侄子诸福棠。这位终生未嫁独身奋斗了一辈子的女教育家，把诸福棠视同嗣子，给予的扶养教诲甚至超过了他的亲生父母。1954年诸希贤逝世一周年，无锡出文集纪念，诸福棠特为撰写了一篇《我的姑母》，文中说："我在学龄初期，即由姑母教读，诱导我倾听名人轶事，以激发志气；教导我扫地擦桌，养成勤劳习惯。我犯错误时，她循循然规劝我，稍有成绩时，则欣喜地夸奖我，引导我上进。我患重病时，又千里迢迢赶来慰问我。她的言教身传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我的品格修养及学术成就，均得到她的熏陶……"。

诸希贤爱侄如子，出学费，勤勖勉，倾全力培养诸福棠，盼望他日益精进，尽快成才。姑母时时关怀着侄儿那单薄多病

的身子。诸福棠在协和读书时得了一场重病，吓坏了慈悲为怀的好姑母。诸希贤七十岁时写的自传（现存无锡市图书馆）中有这一段:“1921年5月余，余正带领北京高等女师师生参观沪杭女学，住上海务本女校。夜半忽有无锡来人，告以福棠侄在协和医院患斑疹伤寒并发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忧心如焚，即以学生参观事委托其他教员，匆匆回锡，与兄同车返京，到协和询问校医，云希望极少。幸经医护悉心救治，转危为安。以后学成致用，为儿童服务，有功于社会。当时自觉缺乏智能，未能普济世人。热望棠侄继起，以继余志。设有差忒，愿以自代，从而持斋不移，终身蔬食……”。

四、她爱这个世界

诸希贤牺牲了个人的美满生活和小家庭的幸福安乐，一心教书育人，培养了无数女中豪杰。她那颗伟大的爱心给了多少后生晚辈以温暖和鼓励。她寄厚望于侄儿，期待着诸福棠继承她“普济世人”的更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当她侄儿患重病时，她苦于爱莫能助，于是“愿以自代”,“从而持斋不移，终身蔬食”,祈祷苍天保佑。被誉为“巾帼不凡才”的诸希贤也难逃历史时代的局限，思想境界难免偏狭。她无力扭转乾坤，便于虚无缥缈间求精神寄托，希图苦行修道，摒弃烦恼，诸事如意。她晚年笃信佛教，从教育岗位退下来后，离无锡到上海,“曾一度参拜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应慈老法师，从学华严经，略知佛教的无我法，以度尽众生为愿。但以才识浅薄，未能宏法利生为憾。”（见诸希贤自传）

诸福棠深深理解姑母的心情，尊重她的信仰，学习姑母一生体现的民族传统美德。1949年，他把姑母接来北京，悉心赡养，极尽孝道，让老人安度幸福晚年。新中国的新气象拓宽了诸希贤的眼界，使老人思想开朗起来。她在自传里写道:“自

1949年由福棠侄和定一侄媳迎养北京后，更见首都气象日新月异，略闻政治思想的学习概况，不禁心向往之。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遍及全国，余避难于太湖边上的僻巷，流离景象如在目前，而今国权自立，独立图强的新中国已站立在太平洋西岸，此皆由于人民政府的领导有方。”

诸希贤一生勤奋，终生练字，不肯耗费光阴，虽生不逢时，大半辈子未尽如意，总算看到了解放后的国家昌盛，人民幸福，这都是无数革命志士先烈和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斗争取得的成果，求诸空灵是得不到的。诸希贤终于悟出了这个道理，在自传中深有感触地写道：“今见解放以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分男女老幼及宗教信仰，皆享有自由平等的幸福。窃谓共产党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类进步，国家繁荣和世界和平。余老弱无力，寄语我亲友：际此盛世，务必努力前进，创造现实的极乐世界。”

诸福棠从物质上精神上竭尽所能地为姑母创造一切条件，祝愿老人健康长寿，颐神保年。1953年初，诸希贤忽患中风重症，诸福棠延请名医救治，尽心护理，也难奏效，姑母于是年秋间溘然长逝，享年71岁。诸福棠遵照姑母遗嘱，为老人穿禅衣，坐莲花龛，举行火葬礼，并承刘稚兰居士护送遗骨葬于晋北五台山东麓的大螺顶峰。墓旁有乾隆亲笔古碑，刻文：“窗前东海初升日，阶下千年不老松”。这是描写此地优美风光的词句，不也是对诸希贤为人风范和光辉业绩的礼赞吗！

她是诸福棠胜似父母的亲人、启蒙老师和引路人。为了永留纪念，并给后辈作学习之用，诸福棠从历年姑母家书和给自己的信里摘录了一些警世之句，现仅举数条如下：

无论事业大小，皆以全副精神为之。尤宜未雨绸缪，在事前做好充分准备。

待人接物应实事求是，不可虚伪，处处要真诚相见，则万事皆可顺利。

做人之苦在于公私不分，若不从公共利益出发，则种种烦恼即由此而起。

重义疏财以敦品，励志力学为利人。

很多人喜护己过，很少人知过能改，怨人不如责己。

尚友古今名人，必须选察其名著，审察其功绩，深入而体会之。

人的感情触物而动，有时放逸无定，宜及时训勉，激发其理智，日进于善。

爱人不分贵贱为平等的起点。节用为自立之基，节用才能爱人。

…… ……

这些不乏哲理内涵的谆谆教言，使诸福棠受益良深。而最令他难忘的是姑母要他“放弃家产，外出求学，独立谋生，为国为民”。这是诸希贤高瞻远瞩的英明策略，对侄儿一生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诸福棠走出狭小天地，奔向了辽阔的世界。

第三章　洋场春秋

一、从“小上海”到大洋场

开通的无锡人眼光远，腿脚长，外出谋生闯练的很多。那里还有一种风气，一般人家都愿意把子弟送出去求学。最吸引人最便当的去处就是上海。

1910年，11岁的诸福棠身着袍褂，辞别故乡，负笈远行，由“小上海”无锡直奔黄浦滩那大洋场。姑母让侄儿“外出求学”实在是明智之举。思想性格开朗活跃的父亲也积极支持诸福棠去上海念书，并亲自护送儿子赴沪“赶考”。这农家子弟带着一身乡土气息，踏上奔赴十里洋场的征程，对故土杨亭的河圩房舍、一草一木恋恋不舍，更舍不得朝夕相处的一家亲人。诸福棠跨上火车，一路浏览江南水乡的秀丽风光，脑子里漫无边际地想象着，不知那远近闻名的“花花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随父亲到了上海，住进一家旅馆，一门心思抓紧时间为报考仰慕已久的南洋公学做准备；还牢记着离家时一些同乡长辈的告诫：早上只可吃些稀粥油条，千万不要多吃油腻，以免临时胃痛妨碍考试。那里的高楼大厦，五光十色的市容街景，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知道自己不是来游“大世界”，逛街观景的，但是英租界街心站岗的、头缠红布的印度巡捕和法租界街头巡逻的头戴三角笠帽的安南人，显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权威，却是他从未见过的新奇现象，到现在还记得清。

诸福棠在老家只随父亲在新学堂读了三年初小，成绩虽然

优等，所获自然有限；倒是从学得的诗书古文中记下不少格言名句，在脑子里刻下了印痕，对什么"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等等，是略有领悟的。他小小年纪还颇有几分责任感，也懂得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没知识，没本领，什么事也干不成。于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农村少年，在偌大的上海市安详自若，泰然处之，显示了胸有成竹、沉稳坚毅的心理素质，遇事不慌张，临战不怯阵。

二、南洋公学附小

南洋公学大、中、小学都有，学生来自全国各省市。诸福棠是来投考高小的。这是他头一回面临如此严峻的考验：报名的一千多，只录取四五十名。考场设在大学部的大礼堂，一片肃穆严森的气氛。诸福棠环视四周，看那众多的竞争对手中，极少象自己一样来自乡村的孩子。发下试卷，他细细看了一遍，先打了腹稿，然后逐一写下答案，核对无误，交了上去。惶惶不安地熬到了发榜的日子，当他得知录取的好消息时，心头一热，喜上眉梢；但外表看不出一般人"金榜题名"时那种欣喜雀跃的狂热劲儿。诸福棠稳重内向的性格，在本世纪初就基本定型了。

11岁的诸福棠成了住宿生，从此独立自主，由学监指导生活。学校有各种完善的设施，对小学生尤多照顾。小学部四周有小河环绕，只有一座小桥外通大学和中学的操场，平时不许随便外出。诸福棠开始不大自在，到底是初离家门，当着亲人面虽不曾哭泣，在学校宿舍就寝时难免暗自垂泪，但不久也就习惯了，并且爱上了这所赫赫有名的学堂。

凌鸿勋所著《中华民国大学志》一书中"国立交通大学"一章，有关于这个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一段：

"自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我国风气渐开。当时所谓官立学

堂者，即有译学馆（北京大学前身）与北洋大学，在平津两地相继成立。光绪廿二年（1896），盛宣怀氏奏准在上海创立官办学堂，定名为南洋公学……由上海电报局及招商局每年拨付银三十万两为南洋公学经费。盛氏自任该校督办，聘何嗣焜主持校务，称为总办。又聘美人福开森氏（John C .Ferguson）为监院，即教务长，由其规划学务，延请西学教师……光绪卅年改隶新成立之工商部，改称高等实业学堂。光绪卅二年又改隶邮传部。该校自隶工商部后，初由杨士琦为监督。光绪卅二年唐文治继任监督，始常川驻校，综理校政。唐曾随载振赴欧美考察，于新政多所擘划，在校以求实学、务实业为训，聘请中外专家任教授。暇则讲求国学，提倡体育，实行军训，风气为之一振，学校基础实奠于此时。民国九年（1920），唐校长以双目失明辞职（计在任十四年）”。

1979年版《辞海》第139页有关条目说，南洋公学分四院：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这所学府勇开风气之先，声名大振，虽曾一度更名，人们仍称之为南洋公学，直至1921年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等合并，改名交通大学，逐步办成了全国著名的高等工程专科院校，“交大”的名字盖过了它的前身；但南洋公学给人们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据诸福棠回忆，那里的小学程度也很高，课程多，要求严，有英文课，还教“纳氏（Nesfield）”文法；尤其注重国文课。唐氏 校时期，文风很盛，每年八月廿七日（阴历）孔子诞辰，全校大中小学生一律平等地参加一次国语作文汇试，出几个题目任选一个，试卷经过鉴定评判，最后由唐校长择优提名奖励。有一年，全校作文汇考冠军竟被高小三年级学生杨荫溥夺得，一时传为美谈。他的作文题是《说水》，文字美，含义深，写得实在好。诸福棠比杨荫溥低一班，很羡慕崇敬这位学长，常于暑假中与杨书信往来，学其文学素养。得悉杨荫溥写信必先起

草，修改后誊清寄出，诸福棠虚心效法，得益不浅。他的文学根底在南洋公学得到进一步加深。

诸福棠在小学里生活很有规律，白天上课，课余常参加小班足球游戏。每晚7--9时有自习课，有教员监督，9点摇铃下课，开放个人食柜，以存放的饼干做夜点，然后向老师领取小说分头阅读，有《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等，任意选择，唯独把《红楼梦》列为禁书。晚10点熄灯就寝。诸福棠平时不出小学校门，专心读书，各门功课都学得不错，成绩优异，总是名列前茅，获得"品学兼优"的荣誉状。那里小学生的水平超出一般学校一大截。诸福棠庆幸自己能在这样的学校求知。

更使诸福棠高兴，感到轻松愉快的是，他入学第二年(1911)，颈后那根恼人的小辫子被辛亥革命的激浪给冲掉了。上海这个大城市也受着革命浪潮的冲击，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当然，一个小学生接触的主要还是那座每日书声琅琅的学堂，除了课余可以在阅报室读读报，了解些国家和世界大事之外，学生们仍要按部就班地上课，每晚7—9时还要坚持上自习课。诸福棠不改初衷，一丝不苟地规规矩矩念书。

三、规矩学生

诸福棠由家乡的小天地来到大上海的第二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宣告终结，开始了一个新历史时代。

但是，对当时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土崩瓦解后，风云突起政局骤变的辛亥革命的形势，诸福棠并不真正理解；他直接感受到的变化只是头上那条辫子和与中国蒙受多年极端屈辱有关的黄龙旗，同时不见了。至于全中国，上海市在大变革的动荡

中如何出现种种令人不安的混乱，他就知之不详了。

童年就受儒家道德教育熏陶的诸福棠背熟了“修齐治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知道国家治乱与自己的关系，懂得应该关心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也有求强向上之心，无奈自己还是个无力效命疆场的少年，便把良好的愿望贯穿在读书求知的实际行动中了。

这里还要提到南洋公学的创办人盛宣怀（字杏荪），他本是清末秀才出身的买办官僚，曾办过电报局、纺织厂，又利用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办铁厂，开煤矿，垄断洋务企业，出卖过铁路矿山利权。但他兴办新学，引进国外新知识，介绍先进科学技术，还算是办了一件好事，诸福棠很满意南洋公学，小学毕业后直接升入南洋公学中学部，许多新老师，新课程引起他更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中学部除国文以外，各门课程几乎全用英文教本，重点课程是数理化、史地课，还有经济学、法律学等。学生学习生活紧张有序。老师们都很认真负责，诲人不倦。诸福棠还清楚地记得教国文的那位举人老先生朱叔子摇头晃脑闭目谈文学的神态，他讲起课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颇受学生欢迎。当时的英文老师叫徐守五，教读本、文法，又教会话，灵活生动，学生们感兴趣，记得牢。徐老师用英语翻译中国京剧可谓一大绝活，那洋戏词、洋道白惹人捧腹，使人难忘。十几岁中学生的英文程度达到了可观的水平，这对诸福棠日后的学习和事业都大有帮助。

诸福棠一直是班上拔尖的好学生，论天资倒不见得比别人高，他靠的是坚毅不拔、勤奋刻苦，规规矩矩地念书。当年上海的冬天比现在冷，室内又没有暖气设备，不生火炉，砚台里的墨汁都结了冰。晚上课余，同学们早早地钻进被窝取暖了，诸福棠放下帐子，挡挡风寒，坐在床上抓紧点滴时间读书。他身子单薄，不好动，却并非书呆子，兴趣还是比较广泛的。小学时，他学会了猜拳，不是为了饮酒行令，只是和同学们“五

魁首”、“八匹马”地游戏玩耍，总结战果时，他总是胜多负少。一个叫薛绍清的高班同学是围棋能手，收了诸福棠和另一个叫高福昌的同学为徒，诸福棠入门后一度着了迷，不仅兴趣盎然，也锻炼智力，就是太费时间。到了中学，课业更紧了，他便舍弃所好，不再涉足棋枰了。这时，诸福棠培养起另一种爱好——集邮，见了一种新邮票就如获至宝地纳入册中，如果是外国邮票则更为名贵，鉴赏之余总要从地图上查出那个国家的确切位置，了解其概况、国情。诸福棠特别喜爱中南美洲一些国家的邮票，象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的邮票，花花绿绿的，漂亮极了。集邮的爱好有助于他关心国内外大事，并把地理课学得更好。

十几岁正是学龄期的黄金时代。在南洋公学小学和中学读书的七年是难忘的。

四、初识进化论

诸福棠不象许多同学那样活泼，但心地却是宽的，他关心集体，热心助人。念到中学三年级，他十七岁那年，学校的足球队和圣约翰大学足球队比赛，那是上海地方轰动一时的盛事，同学们人人关心，连小学部的小弟弟们也组织了啦啦队，为校队呐喊助威。诸福棠身子弱，体育丙等，不能在绿茵场上拼搏效力，便想方设法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间接、迂迴地做贡献。他们班的李家两兄弟是足球名将，校队的主力，球艺高，功课却差，常为考试犯愁。诸福棠见义勇为，为李家哥哥代写考卷，帮助这位足坛猛将顺利过关，以便他安心地奋勇战斗，破网得分。同学们都赞誉这是“义举”，诸福棠自己也认为是为集体尽了力，从而感到慰藉。不过，他不赞成锦标主义，反对球迷们偏狭的过激行为。有一次，两校球队在圣约翰大学足球场上再度交锋，结果“南洋”队败北，这本是兵家常事，

"南洋"的观众和球迷们却难以忍受，气不知从哪儿出，竟迁怒于的自己的校医俞凤宾，砸坏了这位上海名医乘坐的小汽车。这完全是蛮不讲理的胡作非为。俞凤宾（已故北医大教授、著名内科专家王叔咸的岳父）是圣约翰大学早年的毕业生，就因为这个缘故而遭此横祸。这帮球迷真是幼稚无知，可气可恼。可见，狂热的球迷闹事非自今日始，也不是外国的"专利"。

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辛亥革命虽初期受挫，却激起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新的奋起。孙中山不愧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为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历尽艰辛，不屈不挠地苦战奋斗，他在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和封建军阀们进行紧张激烈的特殊战斗中，曾应邀抽暇到南洋公学演讲，诸福棠做为一名中学生参与盛会。那天，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连过道窗前都挤满了听众。孙中山频频有力地挥动着手臂，他讲述了《建国方略》的内容，生动地描绘着建设中华的宏伟蓝图。诸福棠听到要在全国修建十万里铁路的计划，十分兴奋。爱好地理课、经常研读中外地图的诸福棠，看到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只有寥寥几条铁路，总是暗自神伤，痛感祖国之落后，如今有了希望，怎不倍感欢欣！然而，事与愿违，孙中山1925年病逝后，他的继任者虽然把"总理遗嘱"背得烂熟，每周都举行纪念，发誓继承遗志，完成总理未竞大业。但是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偌大的四川省直到1949年连一根铁轨也没有见到。

中国的事情怎么这样难办，为什么就不求进步呢！诸福棠渴求答案。

中学生倒是大了几岁，学校不象对小学生那样管得严，允许他们自由出入校门，到附近徐家汇和福开森路（当时有李鸿章祠堂，后建复旦大学）一带遛弯散心；节假日还可以到校外小店吃碗馄饨。他们的眼界开阔多了，课余也不光看小说，还读许多杂志。《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它1915年创刊，正是诸福棠读中

学时期。《新青年》的激进态度，反封建文化思想和传统的革命立场，对青年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它第一次在进步的中国思想界举起了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旗帜，把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推向高潮。诸福棠也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开始对自己头脑里积淀的孔孟之道、儒佛思想中那些消极成分进行反思和粗浅的分析批判，逐步树立起科学观点。他对《新青年》不断介绍国外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很感兴趣，受到启发，尤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了信仰，从而坚定不移，成了他青年时代奋发学习、追求进步的指导思想。

诸福棠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规规矩矩念书为了什么？为了求新知，求进步。一个人不图强上进，碌碌一生，无所作为，那就是虚度年华，毫无价值。大而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循守旧，不求进取，怎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大中华，也曾有过光辉灿烂的年代；到了近代，主要是清王朝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吃光了祖宗的老本，使“四大发明”的光彩黯然失色，被远远地甩在世界先进国家的后边，把曾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糟塌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之邦。诸福棠是从那个黑暗的朝代跨过来的，更有深切感受。一接触到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展之一”的达尔文进化论，诸福棠似乎找到了国家濒临灭亡的原因，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自然界如此，在政治、社会领域，国家、个人也有这个问题，时值世界科技文明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年代，更是不进则退。在当年，他只认识到这样高，至于国家贫穷落后的更深刻的根本原因，还理解不够。但诸福棠是个善于思考的青年，渐渐对刻苦求学的目的有了进一步的领会，自觉性更高了，亟欲学成报国，把知识献给人民，并且立即找机会实践。

上海、无锡之间交通如此便利，坐火车只消几个小时。学校放寒暑假时，诸福棠就回家省亲度假。在中学后两年，他约

七八个同乡好友，利用暑期在无锡城里借一校舍办起“青年合作社”,义务为初中、小学的小朋友们补习算术、国文等课程，帮助他们提高进步。这件事受到乡亲们的称赞，说这些年轻人思想好，进步快。多年后，他们果然大有作为。诸福棠的主要合作者顾毓琪（旅美著名学者顾毓琇之兄),后来在上海创办同德医学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创办时的一个组成部分),卓有贡献。

诸福棠在中学时代学习成绩优异，为继续深造和建功立业打了个好根底。他还从进化论得到启示，树立了一个牢固的信念：人类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要自强不息，不断地求胜向上。他衡量事物常用这样一句话：进步就好。

第四章　理想与病魔之战

一、多病之躯

诸福棠生性文静，身子单薄，运动场上很少见到他的影子。上体育课踢足球，他被编到丙组，也只是象征性地跟大伙儿跑一跑，没人敢同他“合理冲撞”，怕碰坏了他。到了中学上军训课，同学们都背钢造真枪，学校专为他造一杆木枪，走在分列式里他显得很特别。

那位曾遭球迷乱拳之祸的俞凤宾大夫，在南洋公学做了多年校医，大、中、小学生都是他的服务对象。这位名医对诸福棠有很深很好的印象，一是由于这个学生品学优秀，主要因为诸福棠是他的“老主顾”，他很熟悉这个经常闹病的文弱书生。“南洋”办学认真，教学质量高；卫生工作却差，对小学生伙食也注意不够，尽吃纯白米，蔬菜少，缺乏必要的营养，有些学生得了脚气病，这里边就有诸福棠。脚气病，在世界上是我国最早认识到的一种疾病，早在隋唐时代，“药王”孙思邈的著作中就有记载。虽然当时没能明确提出是由于缺乏维生素 B_1（硫胺素），却指明是多发于食米区的疾患，一般诊断治疗也与近代相似。诸福棠当年对这种病没什么认识，不知道脚气病严重的还能要命。他只觉得疲乏软弱，肌肉酸疼，下肢微肿，不想吃东西，他去向校医求诊。俞凤宾大夫给他开了药，他按时服下。他对医生的讲解嘱咐很感兴趣，增加了不少知识。他明白了，这种病是由于多吃白米及缺乏豆类与肉类食品所致。

要预防就须多吃糙米、豆类、肝、肉蛋、酵母制品等，不宜挑食，要饮食均衡，不要多吃精米白面。儿童发育期、消化病患等情况，应增加硫胺素摄入量，改进膳食。经受了这场病痛，诸福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思路，懂得了：吃，不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要防病保健，讲究营养是十分必要的。他深感自己正当长身体的时期，体质如此之差，实为一大憾事，他多么渴望能身强力壮啊！

然而，毕竟是个多病之躯。祸不单行，诸福棠在"南洋"高小又染上了白喉。这种急性传染病不仅在儿童中才有。当他觉得喉痛、发烧、恶心、疲乏时，又惊动了校医俞大夫。那个年代还没有药效理想的白喉抗毒素，他被送进了传染病医院，经过十多天的治疗、调养，总算没出现什么险情。诸福棠又闯过了一关。他感激那些医生、护士，钦佩羡慕他们冶病救人的高尚职业。

由于身体弱抵抗力差，诸福棠频繁地遭受病魔的侵袭。1917年中学毕业那年夏天，他突患重症伤寒（这是当年华中南水乡因水源污染流行极广的病），秋间又并发细菌性痢疾。这场病可不轻，害得他在病床上躺了半年，休息了将近一年，身体更衰弱了，考大学也耽误了。

深受病患之苦的诸福棠决心学医，以济世救人。久仰国内外闻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水平高，便把目标瞄准那座"象牙之塔"。不幸的是，到了1918年夏天，他又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错过了报考协和的机会。病愈后暂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医预科，插班二年级就读，准备来年再考协和。

1919年他考取了协和医预科三年级，正准备北上入学，病魔再次缠身，又患重感冒，误了9月1日报到的期限。

二、摘掉这帽子

病魔缠身，误了大事，诸福棠恨自己这不堪一击的脆弱的身体。他想起这几年尽在病榻上受折磨，心力交瘁，力不从心，正青春年华，竟白白荒废了二年大好时光！诸福棠思考再三，认定这不怪自己，也不能因为“受之父母”而责备爹娘。他所担心的，是自己的身体被人利用，作为“东亚病夫”这个诬称的一种口实。不，必须摘掉这个屈辱的帽子！但当时的政府是无能为四万万同胞摘下这顶帽子的。要靠民众自己！

在被孙中山誉为“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的“五四”浪潮中，诸福棠也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一颗爱国青年的心狂跳着，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下，激发斗志，愤起苦读，以待学成报国，为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以身许医

诸福棠无法计算全国每年有多少同胞病死，但知道自己的亲友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就不计其数：两个叔叔夭折了；大姑母的两个儿子，一个19岁死于结核病，一个患霍乱而夭折，还有一个小表妹好好地在上海学护士，忽然得急性杆菌痢疾病重身故；妻兄在苏州医专读到二年级，21岁死于猩红热，这种病在解放以前曾多次在全国猖獗，成人住院患者病死率为30％，儿童竟达50％左右。

上海市在解放前五十年内，有十二次霍乱大流行，仅十年间就有25万人患病，死亡10万以上。东北地区从1910年起三次鼠疫死亡人数逾10万。据北京市第一卫生事务所统计，1915—1925年，城市居民结核病病死率为2—4％，农村更高，

占当时世界最高位。瘟神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长期流行，直接受害或受威胁的达一亿人以上；严重流行地区更是毁村灭户，田园荒芜，炊烟断绝。江西省34个县市三四十年粗略统计，毁村1300多个，灭门绝户2200多家，死亡30多万人。此外，象天花、性病、伤寒、疟疾、麻风、黑热病、钩虫病以及各种地方病，也很流行，危害十分严重。旧中国没有妇幼保健设施，妇女得产褥热等病的很多；有些地区新生儿破伤风的病死率高达50％以上。(以上参照《中国医学发展简史》)

诸福棠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痛感中华男儿责无旁贷，他在选择为国效劳之路。

诸福棠要走学工救国这条路是很便当的，他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时，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向他敞开了大门，免试迎候他入学。他可以在“南洋公学”那座熟悉的校园里再呆几年，中国的工程师队伍里就会又增一份有生力量。然而，诸福棠另有所瞩，他难忘病患害人之苦，急欲甩掉“东亚病夫”的屈辱帽子，为中华民族雪耻。诸福棠立志从医，为民祛病保健。他知道孙中山先生从医入政，鲁迅先生由医从文，都干起了革命，做出了利国利民的伟大业绩。他也记得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认为，良相良医都以济世救人，医国医民为怀，本质上原是相通的，都可以施展才智，为人民谋福利。他审时度势，省察自身性格条件，决定弃工就医，赴北平协和医学院求学，今天看来，他仍觉得自己当年的选择是恰当的。

第五章　龙门初跃

一、北　　上

设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是当年闻名国内外的一所大学，每年有大批青年竞争那几十个新生名额。诸福棠有志有才，敢于去敲这所名牌大学的门,他步行赶往设在圣约翰大学的考场，接受比报考南洋公学时要严峻得多的考验。他被录取了。

正是金秋季节，暑气渐退。诸福棠生病刚好就急着北上就学。父亲不放心，亲自陪送他去北京。那时候火车票分三等，他们买的三等票，木板坐席，车速又慢，路上要过一夜，自然十分辛苦；好在车上可以为年老体弱者临时搭铺，只需付些“茶房钱”,夜晚便可躺下歇息。世界第三大河万里长江，当时只有渡船连接南北两岸，火车分节上轨道轮渡也是后来的事，更没有如今雄伟壮丽的长江大桥可以“飞渡”过江。诸家父子随众多乘客携带大包小裹在下关站下了火车，上船过江到对岸浦口另乘火车继续北行。喜爱地理课的诸福棠一路观赏各地风光，兴致极高。安徽、山东、河北都是他从未到过的地方，尤其是那巍峨多姿、气势雄浑的东岳泰山和辽阔的华北大平原，还有那茁北待收的玉米高粱，都使这江南学子大开眼界，顿觉心旷神怡，精神一振。一昼夜旅程虽只经过四个省份，已感山川大地十分秀美可爱，神州祖国无比壮丽伟大。

火车驶抵终点，父子二人在前门车站下了车。诸福棠来到这“五四”爱国运动发详地已是10月，还能感到火热的政治气

氛，民众对亲日分子至为不满，余波未息，街上仍可看到反帝爱国、抵制日货等激动人心的标语。

1919年10月1日，诸福棠来到东单帅府胡同东口外一座叫“娄公楼”(Lockhart Hall)的西式建筑报到入学。那是旧协和医学堂的校址，现在改为新协和预科的教读场所。1917年奠基的新校舍正在东单三条一个旧王府遗址上紧张施工。他本来考中预科三年级，由于误了9月1日开学的时限，他不得不服从协和毫无通融余地的严格制度。预科物理教授兼教务长斯梯佛罗（W.W.Stifeller)表情严肃，全无笑意，冷冷地对诸福棠说:“我们这里功课很紧张，你延晚一个月，我们正准备写信给你，不必今年入学了；你既然来了，只可插入二年级，等待月终考试，如不及格，还是回去好。”怯生生的诸福棠无言以对，只好自认晦气。他办了手续，搬进了预科学生宿舍，心中一直惴惴不安，等待吉凶难卜的月终考试。

二、过　　关

诸福棠早就知道协和的严格要求，预科教务长的冷面孔总在眼前闪现，不能轻易忘记，那“如不及格，还是回去好”的最后通谍式的警告，更使人难于安睡。这意味着搞不好还要重返故乡等待一年后再入学!

月终考期到了。预科二年级的主课除物理、化学、生物等以外，还有中文、外文，物理是最难的，教授又是那位令人不寒而栗的斯梯佛罗，同学们都把力争物理及格当作第一要务。考试结果，证明物理确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全班只有两人及格，其中一个便是诸福棠，他放心了，其他课程也顺利过关了。饮水思源，他认为在“南洋”读中学打下了好基础，是这次取胜的原因。诸福棠不负父老厚望，他在协和定居了，开始随班正式上课。课余在校园漫步，听学长们谈起学校的历史沿革，才

对协和有了更多的了解。

协和的前身是1906年由一个英国教会机构伦敦会创办的协和医学堂，不久又有长老会、美以美会、内地会、伦敦教会医学会和英格兰教会五个教会机构参与办校，这六个机构英美各占一半。在中国的医学院校中，这是第一个由英美医务人员合办的学校。早在1909年，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创办的罗氏基金会派两名医生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考察教育，拟在北京建立一个医学教育机构；1914年他又派出第二次考察团，专门到中国调查研究医学教育事业，决定在中国建立医学院校，同时提出援助其他医学院校和医院的意见和办法，随即成立了作为罗氏基金会分支机构的“驻华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1915年夏，罗氏基金会派出了第三次调查团到中国作进一步考察，最后决定接办协和医学堂。“驻华医社”当年与之达成接办协定，以20万美元买下原有房屋、地皮、设备等财产，并从1915年7月1日起担负一切开支；同时投资建新校舍和附属协和医院，以12.5万美元购买东单三条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后，即开始筹建，1917年奠基动工。

协和建校之初就决定了高标准严要求的办校方针，培养有前途的男女学生成为高质量的、将来可以做领导的医生、教师和科学家。为保证教学水平和学生质量，实行八年学制，在进入五年本科之前，须学满三年预科，在中学毕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理化生物、中文、外文等课程，打好自然科学和语文基础。这些课程可以在综合大学学习，也可以在协和自办的预科学习。由于当时综合大学的课程，特别是自然科学课质量不够高，协和先开设了预科班，到了1925年移交燕京大学办理。除了燕京医预科毕业生可以考入协和本科，学生来源还有东吴、沪江、岭南、金陵、清华、南开、辅仁等大学。八年制，办预科，都是协和的特点，当时在国内院校是首创。协和从开办就明确用英文教学，因为当时国内缺乏必要的中文教材，同时考

虑到学术发展需要，使用英文教学可以直接吸收世界医学知识，便于同国外进行科学技术联系，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学生所用参考书主要也是英文的。早期占多数的外籍教师也只能用英文教课。这样，对学生的要求就更高了，记笔记、写论文以及写病历、化验报告、处方等全用英文。进入协和，英文必须达到"四会"：听、讲、读、写。诸福棠在"南洋"有过多年锻炼，小学就有英文课，中学课本多数是英文的，根底较深厚，到了协和自然可以应付裕如。预科规定还要学第二外语，他选学德语，成绩也不错，三十年代他自美返国，取道欧洲，历访德、奥等国，没有语言障碍。

协和，是万人瞩目难以攀登的高等学府，每年全国众多考生中只有少数青年能迈进这个高门坎儿，八年中经过层层严格淘汰，毕业时一般人数不多，早期更少，1924年第一班只有三名毕业生，第二班只有五人拿到毕业文凭。人们认为协和各种考试70分才算及格，尤其是一种特殊规定。对这些，诸福棠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入得门来，自当全力以赴，拼个高低。

三、国难励志

"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近代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当时，诸福棠正抱病在家，虽不曾身临其盛，但在这场空前大激荡中是无法置身事外的，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更激起了爱国心和救亡图强的使命感。在中学就受《新青年》影响的诸福棠相信民主和科学是救中国的良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阻碍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状态的根本因素，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尽管当时不可能有更深的领悟。进入协和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穿西服、学外文书，甚至课外日常生活中也要求说英语，一切按美国的标准和作法

办；这在当时反帝爱国思想空前高涨的形势下，显得很不协调，难免遭到非议，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身在其中的诸福棠也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然而，他不曾模糊大方向，没有忘记时代赋予的使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是他求知上进的基本动力。

尽管洛克菲勒办协和有自己的目的，这里有世界著名的专家教授，有现代化的教学、医疗、科研设施，实行八年的严格教育，却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诸福棠入校以来更加勤勤恳恳，发愤苦读。他依靠学校所给优秀生奖学金，父亲、姑母也资助一部分，他俭朴节约，不乱花钱。协和没有寒假，暑假长达三个月，诸福棠不常回无锡老家，假期照样伏案学习。有一年暑假还在学校图书馆兼做临时管理员，每日可得三角小洋，主要是为了能在书海驰骋，尽情开卷饱览。

新校舍工地就在邻近，一片嘈杂，也不曾影响学生们的学习生活。诸福棠每天有规律地作息，课业再紧也还有可以松驰一下的活动。他至今还记得预科一位英文教授查可（Zucher），他在课堂上板着面孔，一丝不苟，课外是个很活跃的人，兴趣也广泛，爱看京剧，常请荣独山同学（曾任上海医大放射科名誉主任）作陪上戏院，认真听取荣独山的翻译讲解，诸福棠有时也一同前往助兴。诸福棠认为查可教授既会工作，又会生活，这样好。

预科总还是准备阶段，是为本科训练打基础的。寒窗艰辛近二年，眼看就完成预科学程更上一层楼了，诸福棠又被病魔击倒，那可是险些丧生的一次灾难。

四、战胜死神

1921年，诸福棠22岁，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如果有一副好身子骨，更是龙腾虎跃之年。然而他那病弱之躯令人惋惜。

这一年，协和新校舍将落成开幕；暑假前诸福棠念完预科即可升入本科。不料，春天4月他又突患斑疹伤寒，并发了支气管肺炎。

课业繁重，学习紧张，年轻人们倒能适应。诸福棠清楚自己体质不强，平日多所珍重，却难敌突来之灾。一天，他忽觉剧烈头痛，疲乏、寒颤、胸痛、恶心，晚上睡不着觉。那种滋味远比前些年得过的那几种病难受得多。他到校医韦尔诺（O .Willner）那里求诊，韦大夫诊断为斑疹伤寒，当即把他送进协和医院住在“E楼”病房。协和新校舍正式开幕之前，附属协和医院已迁入新址收容病人。这“E楼”是头等病房，住院费很高，却不收诸福棠分文，这对一个20挂零的青年学生无异是一种殊荣。这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继续出现严重症状，使他辗转病榻，有时昏迷不醒，大夫清楚，诸福棠并发了支气管肺炎，这类重症“预后不良”，也许难逃可高达17％的死亡率。

诸福棠重病住院，惊动了众亲友，父亲、姑母闻讯匆忙上路，千里迢迢赶来北京探视。当他们来到这座宫殿式的大医院，走进头等病房，看见医生、护士认真负责的精心治疗护理，心中稍感宽慰。亲人守在床边，给诸福棠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当时还没有氯霉素、四环素之类有效的抗生素，医生只采用和治伤寒差不多的一般疗法，加上患者体质弱，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大大超过一般病人几周的恢复期。“老天”有眼，给这个未来的出色医学科学家留下了一条命。诸福棠更感激协和校医韦尔诺大夫，视为救命恩人，三十年代初诸福棠留美期间，曾专程前往耶鲁地区韦大夫家中拜访，表达感激之情。回忆当年病中情况，深感韦氏回天有术。

诸福棠出院后先到西郊香山慈幼院借地暂住，过了些日子便回到无锡老家，在太湖之滨的惠山寄畅园继续疗养。舅舅家表弟在那里开设一家照相馆，腾出一间房供诸福棠养病。

诸福棠在惠山疗养期间，一家人为他辛苦为他忙，做些可

口饭菜，说些体贴话语；又有湖边山下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他日渐康复，瘦削的脸上露出些红润，身子也有力气了。但总是难以排解心中郁闷，他想着北京，想着协和，想着已经进入本科的同学……据报纸消息和同学来信，得知协和新校舍九月里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盛况空前。出席开幕典礼的有政府要员、各界名流、中外贵宾；欧、美、亚洲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学校长、教授和医学团体负责人也赶来祝贺。“大总统”北洋军阀徐世昌的代表颜惠庆、内务部次长齐耀珊、教育部次长马邻翼到会致贺词。会后，徐世昌在“总统府”盛宴款待参加开幕式的中外贵宾。与会各方人士参观了新校舍，对这组有14座主楼高标准的宏伟建筑群和各项先进设施，赞不绝口。庆祝活动延续了一星期。古老的北京城出现一个高水平现代化的协和医学院，成了轰动国内外的重大新闻。远在江南养病的诸福棠心情激动，急欲早日返校就读。他最感遗憾的是没能参加开幕典礼期间举办的学术活动，在一周里差不多每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三次学术报告和讨论，280多位国内外著名科学家献出各自的科研成果，提出独到见解，有幸与会者都有如获至宝之感。

第六章　本科又五年

一、重返古都

年纪轻轻的诸福棠已经有了几次和重病周旋的经验，这次更是与死神搏斗取胜的。他重返协和时已进入1922年，幸好学有根底，他通过了严格考试，正式升入本科。重病拖后腿，又误了一年好时光，预科时的同班同学已是本科二年级了。

病一场，诸福棠就想得更深一层，当个好医生治病救人强民救国的抱负更坚定一步。斑疹伤寒本是体虱传染，病原是立克次体，协和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干净的环境，衣被勤洗常换，哪有虱子藏身之地！莫非是出门坐人力车，从那里带来的？翻翻教科书，问问前辈人，倒也另有传染途经："干虱粪内之立克次体可生存数星期之久，每可和尘埃同时吸入呼吸道中，或由眼结膜进入体内而发生感染"。这就难防了。茫茫寰宇，大气横流，尤其生活在"无风三尺土"的古城北京，哪能不喘气、不睁眼啊！诸福棠认定，疾病，是个人成才报国和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大敌之一。"东亚病夫"的帽子不就是这样戴上的吗！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片土地上就有那么多疾病呢？这是需要想得更深才能悟出道理来的。当年有一件事对诸福棠的触动和打击甚至超过自己大病一场，促使他想得很多很多。已经进入本科三年级差两年就要毕业的好友李克明突然病逝。时过半个多世纪，李克明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久萦脑际，难以忘怀。诸福棠曾作李克明小传，悼念亡友，全文如下：

“早年校友李克明1899年生。幼年随其父李月峰牧师迁调常熟、无锡等地，离学校较远，早出暮归，不惮跋涉之劳，从此养成勤学习惯，朝夕攻读，从无倦容，旋由苏州英华中学转入东吴大学，勤奋好学，常冠同侪。尤擅英语，曾获全校演说首奖。1919年自东吴毕业，得理学士学位，立志学医，得苏州博习医院医师们的慨助，投考北平协和医学院，取入本科一年级。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借地招考协和时，君与我邂逅相遇，从此交往甚深，相见恨晚。君温良寡言，举止闲雅，落落大方，曾任协和学生会会长，布置工作井然有条，是我校学生中杰出人才之一。

“1922年春，世界学生同盟会集会于北京清华大学，君为协和代表，佐理会务，竭尽心力，稍觉疲累。回校不久，即染中毒性猩红热，当时尚乏有效疗法，遽尔转剧，不幸于4月17日逝世，距发病仅五日。全校师生深感痛惜，无不凄怆下泪，嗟其壮志未酬，竟遭夭折。1922年暑假，余南返，赴苏州安乐园李君墓地致敬，留诗一首以志哀悼之忱：

惆怅华园日已曛，短碑篆刻故人坟；

良朋有意培硕学，恶疾无情夺幼芬。

壮志凌云师友赞，英才出众盟员钦；

黄鹂几个啼声哑，只见落花不见君。”

猩红热为害之烈，如今已鲜为人知了。当年却曾夺去无数宝贵的生命，重症可使儿童患者半数惨遭不幸。诸福棠患斑疹伤寒，死里逃生；李克明染猩热红，未能幸免。个人痛失好友，国家痛失良才，怎不令人哀伤。诸福棠专程赴苏州向亡友致敬时，还看望了李克明的老父，诸多安慰，劝其节哀，又不免同洒一把辛酸泪。

诸福棠自幼重情义，心里总是装着别人，他患斑疹伤寒后二年，协和又有一位同学得了这种病，诸福棠献出200毫升鲜血相助，使那位同学霍然而愈，少受许多痛苦。他只是考虑患过

斑疹伤寒的人体内有免疫性，给患者输血有好处，就全不顾自己是那样的弱不禁风。这颗真诚的爱人之心日益深沉，贯穿了他的一生。这许是做一个好医生和正真的科学家极为需要的品德情操吧！

二、苦　学

一座占地10公顷的协和楼群在清豫王府旧址拔地而起。豫王府曾是封建皇帝临幸游乐散心的所在，被外国人买去建起一座大学堂，主要培养我国的高级医学科学人才。诸福棠喜欢这所学校。

学校学习十分紧张，超常的快节奏使精力高度凝聚，无暇他顾。正如他自己说的，“入本科后，功课如层层波涛，迎面而来”。头几年的临床前期课程尤其严格。学生们也明白，如果不掌握好基础理论，只知道什么药治什么病，不明其中道理，将来只能当个江湖医生，没有条件搞研究工作。对那一段学程，诸福棠获益终生，记忆犹新。最难的是生理课，教授是英国人克鲁馨（Croskshank），他专长研究，对实验课抓得很紧。实验动物初为青蛙，后改为小狗，一般当天做不完，常在夜间或星期日到实验室去继续做。生理学是一门不下苦功很难过关的基础课。最早在协和任教的中国人、国际知名的吴宪教授的生物化学也是一大难关，每次上课前五分钟要出一题笔试，内容往往不是课本和讲堂上讲过的，学生们视如畏途，为之汗颜。诸福棠每次都能顺利通过。神经解剖学由荷兰著名教授卡泼斯（Kapps）主讲，大家对他的教学很感兴趣。他用五色图线代替神经通络（当时还没有通络仪器图），讲得生动活泼，很有意味。此公爱着中装，长袍马褂，俨然一位东方学究。老教授仪态可亲，对学生要求却极严厉，考试达不到70分的及格标准，照样亮起红灯。寄生虫学更不好过关，美国著名寄生虫学家法

伍斯特（Faust）教授要学生们记熟各种蠕虫的尺寸，连小虫卵子的大小都须记牢，几近强人所难了。学生们在八年严峻考验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松一口气。诸福棠也不轻松，孜孜苦学，日求精进。

协和有此传统，关卡层层密布，毫无情面可讲。这样高标准严要求，倒也磨砺出了不少过硬的拔尖英才。

三、注重实验

协和的繁重课业是难以忍受的，非有过关斩将的坚强毅力，痛下苦功，是无法拿到那张文凭的。诸福棠往往以分秒为计时单位，匆匆促促，每天从早到晚穿梭于课堂、实验室、图书馆、宿舍之间。他不是“单干户”，和同班好友胡传揆、陈舜名、袁贻瑾三人课后校正笔记，讨论问题，相互切磋，成为莫逆之交。如今，毕业后曾在常州任职的陈舜名已作古，袁贻瑾旅美多年，曾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已退休，现居纽约；胡传揆已仙逝，他多年任北京医学院院长，专门研究性病、皮肤病，对解放后在全国范围内消灭梅毒等性病大有贡献。

协和的教育方针，强调实验室和临床实践在教学中的重要性。课堂授课不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所占时间不超过总学时的1/3。讲课不是照本宣科的填鸭式，重在给学生启发诱导，解难释疑。在前期阶段，学生就有机会学习一些进行科学实验研究的基础知识。第二和第四学年，都安排一部分时间供学生参加科学实验。经过几年的学习锻炼，诸福棠的科学思维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大有提高。他是图书馆的常客，能熟练检索文献资料，及时掌握国内外医学信息。二年级时，他曾随药理学教员陈克恢研究用于收缩子宫的中药苦草，从中提炼出一种钾盐，二人合写一篇文章，登在生物学和实验医学的会报上。陈克恢兢兢业业、刻苦钻研的精神对诸福棠有很深的影响，常

见他在深夜还在灯下用功。1925年，陈克恢和一个美国教授合作，从中药麻黄中提炼出麻黄素，一举成名，麻黄素作为一种常备西药，沿用至今。陈克恢后来被美国人请去在有名的礼来药品公司（Lily）担任研究室主任，颇负盛名。

诸福棠做学生时还跟随一位内科副教授研究回归热螺旋体在显微镜下的变化。回归热病人在高烧一周后体温急剧下降，以后又反复发作；每次体温下降前，显微镜下都可以观察到回归热螺旋体的凝集现象，说明体内产生了抗体。这种有所启发的研究工作使诸福棠很感兴趣，认识到学术研究永无止境，要对人类有所贡献，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多年后，他回忆协和往事，深感在当学生时搞些小研究很有好处，这为他日后在医学事业中终于有所发明创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学有所成，离不开名师指点。协和请来的都是中外著名学者教授，学生们身受其惠，印象深刻。诸福棠很喜欢听内科教授斯乃博（Snapper）讲课，这是个欧洲犹太人，讲课条理清楚，要点明确，入耳入心；并善于讲临床示范课，抓住一个有趣的诊疗问题，大大发挥，使听者终生难忘。斯乃博教授讲课，堂堂人满为患，许多助教、讲师也来听讲。诸福棠读到三年级时，美国著名儿科权威豪慈（L. Emmett Holt）来协和任客座教授，他收集了大量材料宣讲儿童保健方面的知识和防治儿童疾病的重要性。豪慈教授把很多材料制成幻灯片放给广大听众观察，形象生动，内容具体，效果很好。诸福棠由此萌发了专攻儿科的念头，并在半个多世纪里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儿科事业。与诸福棠共事五十多年的吴瑞萍教授说过，今日中国的诸福棠大可与当年美国的豪慈齐名，都是闻名世界的全国性儿科权威。豪慈教授是洛克菲勒的朋友，他建议洛克菲勒创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对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不幸，豪慈来协和刚半年就因慢性肾炎并发心力衰竭与

世长辞了，年仅68岁。教授之死令人痛惜，诸福棠很有感触。一个有学问的外国人带病飘洋过海前来传授科学技术，死在异国他乡，还献出遗体，就地解剖，以利后人。诸福棠亲眼看到病理解剖标本，豪慈教授的肾脏已经干缩，又小又硬。这种为了事业不惜做出牺牲的精神十分可贵。诸福棠想，人生寿命长短不定，各种疾患的病理变化也很复杂，作为一个医生，一定要努力钻研，学有专长，能为病人解除痛苦，才算尽了自己的天职。

四、书生未忘匹夫责

协和按照它固有的步调在走自己的路；在那里就读的炎黄子孙们一面刻苦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还随时关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华民国的各路军阀连年割据混战，中国上空笼罩着战乱乌云。当时冯玉祥的大本营设在北京南苑，战斗部队屡有伤亡，他求助于协和，由三四年级高班学生组织了医疗救护队，为伤兵们疗治疾患。三年级学生诸福棠参加了内科组，随队前往南苑后方医院。他发现伤兵们患破伤风的很多，他们牙关紧闭，肌肉强直，痉挛搐搦，十分痛苦，惨不忍睹。诸福棠耐心地为病员注射抗毒血清和服镇静药剂，悉心治疗。他非常同情这些伤病士兵，苦于内战频仍，国事日非，眼望着可怜的劳苦汉子们受着不应有的折磨。

冯玉祥将军不同于一般军阀，老百姓对他印象较好。他同协和还有一段缘分。据当时在协和当了多年护士长的邵莲英、邵桂英回忆：冯玉祥于1923年3月住协和医院做疝气手术，须用局部麻醉剂。冯将军说：我是军人，不怕疼,坚决不用麻药！大夫就没用麻醉剂给他开了刀，结果良好。这是协和第一个不用麻醉药动手术的病例。冯将军身材高大,协和的病床他睡不下，就专门为他特制了一个，听说这张大床至今还保存在协和一个

仓库里。

中国的各派军阀都代表着不同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他们的自相残杀正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的侵略行经，反对军阀混战，必然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1925年的“五卅”爱国运动就是中国反帝大浪潮的开始。协和是不许学生参加校外政治活动的。但是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革命浪潮，冲开了它森严的门禁，在杨济时、贾魁、诸福棠、陈志潜等平时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高班学生积极带动下，同学们心潮澎湃，怒火冲天，冲出校门到天安门参加游行示威。诸福棠和同学们抬着一副大型宣传画，画的是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工人开枪，一旁还写着沙翁名句：如果你有眼泪，现在下泪吧！他们高呼口号，热血沸腾，身上注入了反帝爱国的新的活力，益发坚定了辛勤求学誓雪国耻的决心。

诸福棠是个有名的用功读书成绩优异的好学生，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积极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协和有一个宗教社会部，星期日做礼拜，还常办一些活动，并不强迫学生信教。诸福棠不是教徒，偶而参加教会的礼拜，宗教社会部不断请一些名人演讲，他是专门去听演讲的。《协和校刊》不定期出版，几年出一次，诸福棠是第二期校刊的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有林巧稚、吴朝仁、施锡恩、陈志潜等。第二期校刊的内容大致是记录校内师生的日常活动以及国际医学发展情况。

“五卅”运动是协和医学院学生第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这场运动在学生们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从此增加了与社会的接触。1926年，以学生会成员杨济时为首的一部分学生和青年医师，发起组织了“丙寅医学社”，主要成员有陈志潜、朱章赓、贾魁、诸福棠、李瑞林、胡传揆等。他们创办了一种通俗医学读物，向人民群众介绍近代医学的卫生常识。由于没有经费，不能单独出版，经朱章赓的亲戚介绍，在当时的《世界日报》

上占一个版面，每周出一期，除介绍卫生常识，还对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揭露抨击，如许多开业医生并无真才实学，使用假药骗人；警察局只收卫生费，从不关心环境卫生的改善；政府对天花、霍乱、斑疹伤寒、猩红热等烈性传染病不闻不问，等等。这个周刊很快受到各界人士的关心和重视。后来周刊又转到《中华日报》，最后成为天津《大公报》的一个专刊，一直办到1930年。

五、接过“文海奖”

艰苦漫长的学习历程快要结束了，协和的千锤百炼为一生事业铺垫了厚实的根底。诸福棠还有一桩“终身大事”有待完成。老人们已催过多次，他终于利用1924年的暑假回无锡完婚了。25岁做新郎，在当年算是相当晚了，也是因为两人的学业都没完结，新娘朱定一还在无锡女子师范读书，他们把长辈们认为不可再缓的大事看得较淡，行罢“合卺”大礼，一对新人便各自回校了。朱定一一年后毕业来到北京，诸福棠在和平门外租下两间砖地小屋建起了小家庭。朱定一又考入建在西长安街的瞿氏产科学校，二年毕业，学到了一些医道。那个时代妇女工作的不多，朱定一有学历，也很能干，但为了帮助全心全意做最后冲刺的丈夫完成协和的学程，她做了一名出色的家庭主妇，成为诸福棠事业上的好后勤。夫妻恩恩爱爱，相敬如宾，诸福棠全无后顾之忧。

在协和能考及格已不容易，名列前茅年年得奖更是众人瞩目的佼佼者。诸福棠便是这样一个。到1927年毕业时，按本科五年总评，他又是全班第一名。协和设有一种“文海奖”，约计金额400元，每年授予毕业班的“状元”。文海，是一位外籍教会医生，曾为创建老协和医学堂作出突出贡献。为了纪念他，把他住过的建筑叫“文海楼”；把他捐献的一笔钱作为奖学金，

叫做“文海奖”。这是协和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奖，先后获得这项奖的有刘绍光、刘士豪、李延安、诸福棠、林巧稚、朱宪彝、范权、卢观全、周华康、张学德等。

1927年6月晴朗的一天，在东单三条路南协和礼堂里举行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诸福棠一班10名同学（其中包括一名菲律宾人，一名泰国人），个个身着镶红边的黑袍，头戴长方形黑帽，跟随着穿红袍、黑袍各种礼服的教授们进入礼堂，坐在台下头排。台上坐着学校负责人和各界来宾。毕业生家属也应邀参加盛会。礼堂里一派肃穆而又热烈的气氛，千百双眼睛注视着戴方帽的那10个幸运儿，羡慕，祝贺，又诸多感慨：8年寒窗，层层淘汰，最后剩下这么几个尖子，难能可贵呀！典礼开始，先是一些名人演讲，然后毕业生鱼贯上台领取文凭，每人得到两张，一张是教育部立案的中文文凭，另一张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颁给的医学博士学位的外文文凭。1916年，协和在纽约州立大学正式立案，该校根据协和的办校方针、人员、设备和实际水平，承认协和毕业生的学历，并发给医学博士文凭。

毕业典礼的“压轴戏”是颁发“文海奖”。主持人一番赞扬之后，喊出“诸福棠”三个字，这位面容清癯的高才生按捺着急速跳动的心，缓步登台，成为协和获此殊荣的第四人，全场掌声四起，典礼气氛达到高潮。诸福棠的姑母诸希贤本来要亲自到会的，无奈远在江南，公务繁忙，便委托好友、北京女高师音乐教师沈葆德代表家长出席。沈老师高兴地分享了荣誉，对诸福棠亲切祝贺，勖勉有加。

是年，诸福棠28岁，要不是几度重病，三年前他就该毕业的。他领头步出礼堂的时候，手里比别人多着一份荣誉，人们蜂拥上前热情祝贺。诸福棠不是那种兴奋起来就不能自已的外向性人，他暗自欣慰，回顾十多年的学生生涯，展望前程，思绪万千。协和的严格培育使他对科学和教育的重要性和深远意

义有了新的认识。不管怎么说，学到新知识，练就真本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事业即将开始，且看他在今后更加漫长的岁月里如何奋勇前进吧！

第七章　扬　帆

一、新台阶

这张文凭来之不易。混日月，熬年头，是拿不到手的。投机取巧，制造假象，蒙蔽老师，更不能达到目的。诸福棠全凭中国人刻苦、勤劳、朴实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外国人提供的环境和条件，含辛茹苦，自强不息，奋斗多年打下了扎实的根底。纽约大学发给的那张博士文凭，说明得到了国外承认，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诸福棠告别了寒窗生涯，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喘息未定，仰望协和那高耸的宝塔尖，仍然不敢松一口气，还须日夜兼程，奋力拚搏。等级森严的协和教师分五级：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医师分六级：实习医师、助理住院医师、第一助理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诸福棠在三、四年级时各有几个月时间分别做了门诊和住院见习生，但只学鉴别诊断，不学如何治疗。到五年级当了一年实习医师，就开始学习独立地全面掌握诊治本领，连血尿便痰的常规化验也要自己动手。毕业后，诸福棠留校被聘为助理住院医师，要一步一步攀登高峰，路程还长着呢，比学生时期有更多的甘苦。激烈的竞争，无情的淘汰，在协和是贯彻始终的，不论是学生还是医生、教授，人人都随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好在那是公开的公正的竞争，那里没有尔虞我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怪现象；没有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和公认的

贡献，只凭主观愿望就要去摘取桂冠，那是妄想。所以竞争者们尽管在繁重的业务压力下废寝忘食地工作，心境倒是平和的。

重视实践，也是协和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临床前期各科的教学强调实验室的严格训练，学生要进行实地操作，严密观察，做到以实践验证理论，加深对理论的认识。临床各科的教学主要结合病例，在病房床边示教，还有巡诊讨论和临床病理讨论会，培养对待患者的正确态度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临床教学采用导师制，因为学生少，一般是一位教授带领一个学生；方法仍然是启发诱导，让学生独立思考，培养自学钻研、探索创新的能力。

协和的毕业生经过层层筛选，已具备无往而不胜的条件。他们当然愿意留校，在这个人文荟萃设备先进的环境里继续深造。但校方要精中择优，只留几个，先当助理住院医师，以后再升。诸福棠由于成绩出众，只用了一半时间就当上了第一助理住院医师兼助教（当时儿科属于大内科，没有住院总医师，只有第一助理住院医师），一般情况，在毕业后三四年才能达到这一步。"住院医师"，顾名思义，是要"住院"的，要24小时一直呆在医院里，全面地时刻地对病人负责，甚至到院外去半小时，也要签名请假，安排好替班人，登记离院时间，回院时销假。诸福棠干起工作来就投入全部身心，高度集中精力，又无后顾之忧，他是乐于"住院"的。说起住院医师制度，创始人原是19世纪末期德国柏林大学的兰根伯克教授，美国的霍尔斯德特教授参照其模式，在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外科建立起住院医师制度，成为美国医学界住院医师制度的鼻祖，从此在全国传开，不久被各国采用。多年实践证明这是个好制度，对病人，对医务人员的培养提高，都大有好处。

诸福棠当住院医师时，正值美国著名儿科专家魏吉教授（A·A·Weech）在协和主持儿科工作，指导儿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诸福棠做魏吉的助手，一边协助他采集营养性水肿

及良性肺结核浸润的研究资料，一边处理住院病人，参加门诊教学。他做学生时就培养了较强的自学能力，跑熟了图书馆；等到当了住院医师，每天接触大量病人，除了悉心诊治，更生出深沉的同情怜悯之心，急欲探求解其危难之良策。诸福棠动脑子搞科研的兴趣，在实习医生时期就得到培养，他曾和他所佩服的同学刘士豪（我国著名内科专家、教授）一起赴香山慈幼院调查儿童缺钙的情况，获益非浅；他曾帮助在我国首先钻研以豆乳喂养婴儿的专家祝慎之医师做婴儿饲养豆乳时的代谢研究，学到不少东西，对这种造福人民的开创性工作深表钦佩，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做住院医师时，他在出色完成诊疗、教学任务以外，做了不少研究工作。诸福棠做过维生素A、C的研究，写有论文；在1928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过《乳酸牛奶喂养婴儿》的论文；在1929年美国医学科学杂志上发表过《手足搐搦症在香山慈幼院儿童的年龄、性别和季节分布》的论文。他知道，只会看病治病，最多当个好大夫；不断探索创新，才能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住院医师还算是“小医生”，但任务是多方面的，诸福棠还要辅导见习学生和实习医生，他登上了这个新台阶，身体虽弱，精力却十分充沛，工作再繁重，也是胜任愉快的。他正式穿上白色短褂，感到怡然自得，因为这已经很不容易，协和规定，主治医师以上才能穿长的白大褂。

二、选定小儿科

当实习生，要在各科轮转进行，为的是全面熟悉和掌握各种病症的诊断治疗方法。当了正式医生就要确定专科，进行定向培养。诸福棠选定小儿科，绝非事出偶然。他自幼多病，受尽煎熬，伤了身体，误了学业。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难道只是美丽的诗句？幼苗弱小，长不成参天大树、栋梁

之材。一个国家是强是弱，看看他们的孩子就一目了然了。当年的中华大国，竟是“东亚病夫”！诸福棠自从到门诊部和病房实习，见多了遭受病灾之苦的可怜的孩子，他们缺乏必要的营养，细脖、大头、肚子隆起、嘴角糜烂，患坏血病的，维生素A缺乏症的，干眼症甚至失明的屡见不鲜。能住进医院还算幸运。街头巷尾、穷乡僻壤那么多嗷嗷待哺和生病没钱医治的孩子，更是惨不忍睹。1929年，西北大旱，陕西、甘肃等地连年闹灾荒，大批难民涌入北京。刚工作两年的诸福棠在协和医院和儿童救济院亲眼看到无数患儿被急性传染病痢疾、斑诊伤寒、回归热等夺去生命。那个年月，天花、白喉、伤寒、黑热病和先天性梅毒等到处流行，惨遭苦难的儿童难以计数。幸存的孩子们个个瘦骨伶仃，端个饭碗牵着母亲的衣角在施粥场讨些稀汤果腹。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却引不起一心争权夺利的反动军阀和苟延残喘的脆弱政府的重视，根本谈不到采取预防措施，消灭疾病，保护幼小生灵。诸福棠倍感痛楚，立下志愿，要以全部精力刻苦钻研儿科学，找出预防传染病的有效办法，解救苦难儿童。我国老一辈的爱国知识分子，总是从苦难深重的祖国的迫切需要出发，选定自己的专业，努力做出贡献，这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十分可贵之处。

当年死在中国并献出遗体的著名美国儿科教授豪慈，对诸福棠影响很深，他叹服豪慈教授的服务精神，认为对自己专攻小儿科是一种精神感召。还有那位魏吉教授，曾想方设法培养诸福棠成为卓有贡献的儿科专家。诸福棠任住院医师期间，对病儿满怀深情，爱护备至，离开病房一步都放心不下。对重病患儿尤为悉心诊治，守护床侧，回到宿舍也往往由于挂念病儿而睡不安稳，时常深夜跑回病房查看。这种高度负责的医疗作风和高尚医德，使患儿家长深受感动，赞扬不已。魏吉教授看在眼里，认为难能可贵，悄悄地给诸福棠创造学习提高的机会。1929年夏，诸福棠的双亲不幸在同一个月里相继去世，他回无

锡奔丧。当地教会办的普仁医院的美籍院长李克乐大夫，恳请诸福棠留下协助院务。一向重视情面的诸福棠经不住李克乐的恳切邀请，不便断然拒绝，便答应暂时帮忙。魏吉教授见他不回来，多次写信催促。诸福棠两下为难，反复权衡，终于次年春天回到协和，继续担任助教。

魏吉教授非常赏识诸福棠这位助手，但当着本人的面并不轻易赞扬，只是一味地严格要求。因此，诸福棠当年不知道魏吉教授如此重视自己，一直到近半个世纪以后，旅美学者许汉光教授（诸福棠的高足）给他寄来一份外文材料，才有所了解。那是从美国出版的《中国宫殿式的协和医学院》（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一书中翻印的“儿科故事拾零”的章节，其中有关于魏吉教授的一段回忆：“我最感满意的是同住院医生诸福棠一起工作。诸福棠是一个出色的学者和科学家，他对患儿特别关心，担心患儿的痛苦，甚至夜间都睡不踏实，是我一生中所遇见的最负责任的住院医生。”

魏吉慧眼识人。诸福棠没有辜负良师栽培，他选择儿科是小病人们的幸福。

三、第一个中国人临床科主任

协和从内科分设小儿科是在20年代。首任科主任哈蒙德（Harmmond），对儿童生长发育特别重视，曾带领医学生夏声利用暑假去内蒙古调查正常儿童体格。后继者是女医师盖伊（R·Guy），1926年至1928年做小儿科主任。协和严格规定，女教员一结婚即须离职。盖伊结婚后，魏吉教授接任。魏吉1930年返美，小儿科主任由勃拉克（A·P·Black）担任。

1936年起，诸福棠担任小儿科主任。他是当协和临床科主任的第一位中国人。这时他的职称已升至襄教授。协和建校后，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在各方面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越来越

多的人在医疗、教学、科研等领域里做出了成绩，有些成果是对世界医学事业的重要贡献。诸福棠回忆往事，不忘他从事儿科事业的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当年回无锡奔丧被当地普仁医院留下，要不是魏吉教授连续催促，滞留无锡，也将只满足于当个开业名医，而难以对我国儿科事业有所建树。第二个转折点是，1941年他本可按照协和关于教授定期出国休假的制度，再去国外，但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严重局势下，他决定放弃这个机会，留下没走。如果出去了，当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就会被阻海外，此后开创中国儿科事业的种种作为和贡献都无从谈起了。

协和儿科不算大，是个富有团结互助、协作创新优良传统的集体。在诸福棠主持科务那些年，全科上下对业务工作一丝不苟，个个认真负责，视患儿如亲人，诊疗护理精益求精。每人还担负一定的科研任务，医、教、研紧密结合，不分轩轾，从无互相嫉妒埋怨的陋习。每逢春秋假日，集体外出郊游，诸福棠常做东道主，备下野餐食品，医护技工亲如一家。诸福棠主任对工作要求严格，业务常规井然有序，病案书写翔实工整，不但住院医师每日详作记录，主治医师甚至教授也常在病案上发表诊治意见，文词简明整洁，一目了然，上行下效，相沿成风。科里经常举行读书报告会，演讲交流各自读过的新版文献书刊。在以后几十年里由他主持领导的儿科单位，都采用这个传统作法，受益者印象深，收获大。

此时，诸福棠一家从和平门外那间小屋先迁至东裱褙胡同，1939年，又搬到东单北极阁协和教授宿舍。两个女儿美端、美瞻相继出世，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不少欢乐。妻子朱定一跟丈夫学习英语，还学会了做西餐。家里断不了来一些中外宾客，主妇的一手中西合璧的美馔佳肴，赢得热情赞扬。

协和小儿科人才辈出。每年从协和毕业生中精选几人来深造培养。常有外单位来人进修，成绩好的便留下多工作几年。

诸福棠对同自己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助手和后生晚辈都有深厚的感情，至今不忘。1987年协和七十周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话说老协和》，诸福棠在《回忆协和医学院儿科往事》一文中，历数了自己的儿科同道，赞扬他们做出的业绩和科研成果，他们是：范权、吴瑞萍、王志宜、吴鼎、宋杰、李壁夏、邓金鍌、陈务民、李季明、顾启华、徐庆丰等，还有斯威特（Sweet），库德努（A·G·Cuttner）、迪特里克（Deitrick）等外籍人士。有一位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派到协和进修的曹钟梁医师回忆当年情景，有这样一段叙述："第二学年，我先从在儿科作一个月的实习生开始。我对诸福棠老师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言行与我在第一学年所接触到的一些人大不一样。对我这样一个外来的进修人员，他十分和蔼谦逊，热情关怀，他似乎充分了解来协和进修人员的各种复杂心情，对我们十分体贴入微地予以关照（即现在的思想工作），不论在工作安排上、生活细节上都想得很周全，使我非常感动，毕生难忘！"（《话说老协和》321页）。诸福棠还提到外单位来进修的秦振庭医生（后任北医大儿科主任、教授）和协和1932级校友汤润德，他们曾协助自己收集大量关于北京正常儿童的衡量数值，这些材料后来都发表在《实用儿科学》中了。诸福棠在协和的同事、助手吴瑞萍、邓金鍌后来成了他一生事业的长期合作者和知心密友。

诸福棠高超的医术和感人的医德，使他在北京和全国的声名日见增长扩大。他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不分昼夜。中午回到家，夫人朱定一早已准备好的饭菜摆在那里，诸福棠接着忙手里的工作，往往下午一两点才吃午饭。天长日久，他养成一种习惯：事情一着手非要做到底，完成了才吃得香、睡得酣。直到晚年，他这个一竿子扎到底的作风始终保持着。一个人要想做好一件事情，完成一项事业，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怕是达不到目的的。

本章概括的十多年，正是国际风云突变和饱尝忧患的中国的多事之秋。诸福棠在协和潜心致力于医学事业，同时关注着法西斯肆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演变，在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一颗炎黄赤子心反复地受着考验和锤炼。

第八章　出　海

一、太平洋上悲国耻

协和有个传统，毕业生留校工作约三至五年，一般都有出国进修深造的机会。不是本校毕业的助教、住院医师也一视同仁。多数去美国，也有去欧洲的。魏吉教授1930年回美国后，为诸福棠联系好了到波士顿哈佛医学院儿科进修的事情，1931年诸福棠奉派启程，他先回无锡，转往上海，登轮赴美。

诸福棠心情有些激动，自己的既定目标是科学救国，这就要到国外去求新知了，但心头又有惆怅之感。他是一个爱国者，他不能不受周围大环境和总形势的影响，他一直关心着中华大地上的风云变幻。时序进入20世纪30年代，多年混战的军阀偃旗息鼓，改头换面了，中国却仍是一家独裁的落后状态。那个东邻扶桑之邦觊觎华夏，早已垂涎三尺，比别的帝国主义更贪婪，危害性更大。诸福棠在"五卅"运动示威游行中高呼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抵制过日货；但他知道这个步步紧逼的凶残的侵略者是不会被几声口号吓回去的，何况中国的当政者一再容忍退让，拱手揖盗。诸福棠对此深感不安。当他和送行的妻子朱定一、妻妹朱瑜、一岁半的女儿美端前往轮船码头，路过一个公园时，看见门口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时，心如刀绞，生性平和的诸福棠几乎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家园呀！

和亲人们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诸福棠登上日本轮船"大洋

丸”，在二等舱一个铺位上安顿下来。这是一艘远洋大客轮，除房舱、饭厅外，还有阅报室、球艺室和游泳池。诸福棠无心欣赏那些豪华设施，常常站到甲板上独自远眺，这太平洋则是名副其实，它波平如镜，风浪不兴，使人免遭颠簸之苦。那些日子，天天晴朗，水天相接，一片湛蓝，十分壮丽。船上有各种肤色的乘客，日本人居多。诸福棠原以为自己一个人在这长途航程中会倍感寂寞的，不料却同协和三位同事耳鼻喉科助教胡懋廉、病理学助教康锡荣和从事公共卫生学的王世伟，在船上相遇，他们也是去美国进修的。“大洋丸”先到日本横滨港，停泊两天多，诸福棠和三位同伴到东京去观光，住在基督教青年会，晚上看了一场日本戏，不觉得有什么好看。关东大地震前的东京城倒蛮热闹，随便浏览一番，第二天回横滨登轮继续远航。

“大洋丸”驶离檀香山后几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大规模侵我中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节节退让，日寇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当“大洋丸”上响起“九一八”事变消息的广播时，几名中国热血男儿惊愕得呆了，眼望着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切齿痛恨，悲愤交加。他们相对无言，默念国耻，低头缅怀铁蹄下的苦难同胞。此情此景，痢人心窝，益增发愤图强誓雪国耻的志气。飘洋过海求学深造的诸福棠决心不虚此行，务求有所作为，实现科学救国的宏愿，决不甘做任人宰割的亡国奴！

万里航程在苦闷中度过了三个星期，“大洋丸”终于在目的地抛锚。诸福棠和同伴们在大洋彼岸的旧金山登上了新大陆。

二、哈佛两度春秋

诸福棠对美国有较多的了解，但是初次见面难免陌生。经过在大洋上缓慢的远航，没有如今短时高速飞行造成时差的不

适反应。语言也是没有障碍的。他并不急于赶到波士顿去，从美国西部开始游览名城，参观名校，访问名医。他先到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参观访问，然后乘火车南下，涉足大峡谷国家公园，欣赏其灿烂夺目的地质变化；再向东到达圣路易城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儿科，又折北行到密执安湖畔的芝加哥，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和负有盛名的芝加哥纪念儿童医院。接着，经过尼亚加拉大瀑布，抵达目的地波士顿。在横贯美国大陆的长途旅行中，他历访了各地名教授，也尽情观赏了天然胜景。这个新大陆上的新国家当时创建不过一百多年，不象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古国有看不完的文物古迹。美国有许多摩天大厦和花花绿绿的物质生活，但更吸引人的是它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各国莘莘学子迢迢千万里前来求学，多数是奔这个来的。诸福棠也正是抱着同样目的来寻觅救国强民之道的。入侵之敌的狰狞面目一直在眼前晃动，加强了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此行一路访问参观，收获颇为丰盛。按协和标准衡量，美国的大学和医疗机构未必尽属上乘，却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好经验，诸福棠一一记下，用以充实提高自己。如果是个生手外行，参观访问中问不到点上，看不出门道，势必有虚此行，只落得看个热闹。

异国他乡，诸多不便。到了波士顿哈佛医学院，须先在外边租房住下。诸福棠和胡懋廉寻到一家房主，那老妇人竟用异样的目光不友好地打量着他们，摇头不应。二人并不灰心，同老人随便聊起来，他们熟练的英语慢慢融化了老房东心头的冰山，消释了认为这是两个日本人的误解，接纳了这两位远方来的客人。"九一八"的炮声尚未寂静，新大陆的平民百姓同情遭受侵略的中国人民，痛恨狼子野心的日本强盗。

一个月后，诸福棠和同伴分手，搬进了波士顿儿童医院医师宿舍。波士顿儿童医院是哈佛医学院儿科的附属医院，接待诸福棠的是有名的勃兰克芬教授（K·D·Blackfan），他的第

一助手麦肯襄教授（C·F·Mckhann）做诸福棠的研究导师。这里医疗设施和学习研究条件都不错，诸福棠如鱼得水，一展身手，先干了一个月实习生工作，以了解当地的诊疗常规，就正式在传染病房任住院医师，诊断治疗有条不紊，精当妥贴，受到美国同行的称赞。晚上，他通过电话同患儿家长联系，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孩子的病情，耐心回答问题。未曾谋面的家长们很是满意，竟不知这是一位前来进修的中国医生。诸福棠一到晚上就到婴儿病房来，翻阅病案，查看资料，为研究工作做准备。美国护士们用热情协助的实际行动，表示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勤奋好学的大夫的友好情谊。

诸福棠话语不多，以情感人。他精湛的医术和优良的医疗作风赢得了人们的崇敬。第二年夏天，他在儿童病房任代理住院总医师。在美国进修的年轻中国医生，还没有一个在这样著名的美国儿童医院里荣任如此职务。诸福棠当年33岁，人生地不熟，水平不高能力不强是干不了住院总医师这种差事的。一次，病床收进一个五六岁的黑人病儿，一个美国实习医生为患儿验血检查，只凭上次住院时所作的结论，仍旧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诸福棠凭自己的经验和认真负责的作风，怀疑诊断有误，从废纸篓里找出被那个年轻医生扔掉的血片，亲自进行观察，几小时后，红细胞果然发生了变化，由圆形变成了卷叶状，从而确诊那孩子患的是“镰状细胞贫血”。原来那个实习医生没有等待足够的时间，查出阴性结果就把血片扔掉了。这一纠正，挽救了病儿，教育了实习医生，在波士顿儿童医院里引起了震动。诸福棠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许多赞誉的话没有使他忘乎所以，他始终谦虚谨慎地工作着，如饥似渴地向美国同道学习。他在参加勃兰克芬教授的临床教学中发现婴儿病房里专设一个示教室，把病儿抱来示教，以免与病房其他音响相互干扰；学生们还可以坐下听讲，大家全神贯注，效果极好。诸福棠回国后，一直采用这个办法。

早在上个世纪，清王朝在多年闭关锁国之后，贫穷落后加上帝国主义的瓜分侵略，搞得难以支撑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等首倡“师夷”之说，开始派人出国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图自强。20世纪30年代，派往欧美的留学生更多了，诸福棠不断遇到旅美求学的同胞。著名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中国协和医大的谢少文教授当年也在波士顿，诸福棠与他过从甚密，常到他那里吃家乡饭，一起念祖国，谈事业。协和1929级校友、公共卫生专家朱章赓教授当时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一个秋天的下午，朱章赓从巴尔的摩来到波士顿拜访诸福棠，同属旅外学子，又是他乡遇故知，二人在离哈佛不远的园林中并肩散步，相谈甚欢。朱章赓讲起国际公共卫生形势，认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尚未受人注意，当政的官僚更不把它放在眼中；以后无论专业医疗或公共卫生，都应大力推进预防保健事业，国计民生都可受惠。诸福棠也感到医生的治疗工作有限，卫生事业必须防治兼施才能较快发展，这都需要政府大力推行，否则学到了许多东西仍属无效。二人唏嘘之下，相互勉励，要在这方面加倍努力，做出贡献，誓与欧美齐驱。他们早在30年代初的这一心愿，一直到人民当家做了主才得到实现。朱章赓曾于50年代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多年，在日内瓦时即常到新中国领事馆学习马列主义，退休回国后参加了共产党，担任北京医学院副院长，正待为人民卫生事业做出更多贡献，不幸病逝。诸福棠惜其才，惆其志，常常忆起两人在波士顿的会晤畅谈。

三、人类福音

诸福棠魂牵梦萦的是求取新知，为国效力；同时牵挂着一家大小。在他出国期间，妻子朱定一携长女美端暂回无锡老家，在姑母诸希贤身边，也好有个照应。1932年，二女儿降生了，

诸福棠在美远瞻怀念，给孩子取名美瞻。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愿他们都快快地健康成长，担当起振兴祖国的神圣使命。可叹的是，自己的国家是如此的贫弱落后，无数儿童因病夭折，未能成才报国。孩子们的悲惨命运正是国家民族的写照。诸福棠回想起1927年刚刚毕业当"小医生"时，协和儿科主任盖伊带领他们几个年轻医生到当时的生理学助教张锡钧（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协和老教授，1988年病故）家，为他儿个同时患麻疹的孩子看病。那时候对这种严重危害儿童的传染病没有预防办法，只做些对症治疗，嘱咐家长多给孩子喝开水。这对诸福棠是一个刺激，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不能只当个会治病的医生，必须想办法让孩子不得病少得病。疾病是不分国界的，不要认为美国是什么天堂，那里麻疹流行也很严重，孩子们照样遭受灾难，为此丧生的也很多。诸福棠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继续钻研自己早就有的一个想法：怎样寻找一种防患于未然，免使儿童得麻疹的好办法。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多少年来，孩子们必患一次麻疹，个个难逃此关，已成为不可改变的定律。要想免除，谈何容易！他和朱章赓在哈佛校园的倾心密谈和加倍努力搞好预防保健工作的宏愿，成了一股推动力量，促使诸福棠更加奋发进取，刻苦钻研。

在协和多年养成了勤于思考的好习惯，又打下了善于搞科研的基础，诸福棠冥思苦想地探索预防麻疹的良策。他想起了在大西洋的法鲁岛曾有过一种现象：在麻疹流行时，岛上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丧生，而许多得过麻疹妇女的初生儿却安然无恙。他便大胆设问：是不是患过麻疹的母亲产生了一种抗体，通过胎盘传递给了胎儿呢？为了证实，他收集了健康产妇的胎盘，从胎盘的盐水（2％）浸液中用不同浓度的硫酸镁液沉淀下来两种不同的球蛋白，一种叫优球蛋白（Euglobulin），一种叫假球蛋白（Pseudoglobulin），后者易溶于生理盐水中，那就是含有抗体的球蛋白。诸福棠用来在兔子身上试验，证明它含

有白喉抗毒素的成分；又在正患猩红热皮疹的皮区内进行“转白试验”，证明它也含有猩红热抗毒素的成分。最后制成大量的这种球蛋白，用肌肉注射方法给予接触麻疹的易感儿（在较早的潜伏期中），证明可以预防发病，至少可以减轻症状，不致并发肺炎而危及生命。诸福棠当即把这一新发现报告了研究导师麦肯教授，得到他的支持。这次研究的一系列试验和观察，都是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实验室和婴儿病房仔细进行的。

那些日子，诸福棠废寝忘食，十分兴奋，隔一两天就提着一个消毒过的小桶，送到和儿童医院同一条街的哈佛妇产医院，求那里的护士把正常产妇的胎盘留下，然后再亲自取回，十分珍视地作为试验研究的好材料，从中提出宝贵的假球蛋白。反复多次的试验研究终获成功，诸福棠作出实验报告和临床报告，写成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传染病学杂志和儿童疾病杂志上。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闻讯来采访，尽管诸福棠虚怀若谷，自得得很，那记者还是搜集到需要的材料，写了《麻疹病儿的福音》一文刊登出来，立时成了轰动全美国的新闻。中国人的发明，美国儿童首先受益，随即名扬全球，被各国广泛采用至今。科学本来就是不分国界的。国际上公认，胎盘球蛋白确有麻疹被动免疫的功用。二十多年后的1956年，诸福棠代表人民中国到丹麦参加第八届国际儿科学会，美国著名儿科教授卡拉利兹（Karulitz）还把他介绍给与会者：“这就是发明胎盘球蛋白的诸福棠教授。”

我国著名免疫学家谢少文教授说：“诸老是我最佩服的科学家。他的重要科研成果胎盘球蛋白预防麻疹，是应用免疫学的一个巨大发现，它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又有应用上的贡献，非常有意义。”谢教授回忆他二人同在美国波士顿的情景时说：“当时他每天忙于科研和医疗，除了阅读文献、做试验，就是照顾病人，几乎没有去玩过。”谢老当年花250美元买了一辆旧汽车，休假时到远近名胜旅游，解除疲劳，“以利再战”，这本来也是

需要的，便约诸福棠同行，但诸福棠一次也没去过，辜负了好友的盛情美意。看来，要成就一番事业，没有不畏艰辛的刻苦精神是不行的。谢老还颇有感慨地说："有这样重大贡献，诸老却从不自我夸大，反映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态度。"

麻疹是可以预防的，多年不变的定律被打破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推动着人类历史不停地前进。诸福棠心里装着苦难中的祖国，装着四万万受煎熬的同胞，装着千千万万经不起病灾袭扰的孩子们；强烈的激情推动着他忘我地苦心钻研，不断探索创新。诸福棠的发明创造在旧中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解放后才在"预防为主"卫生方针的指引下，得到推广。

据联合国统计，在过去的岁月中，麻疹、破伤风、百日咳、结核病等对儿童最常见和危险性最大的疾病，每年要夺去世界上500万幼儿的生命，并使另外500万儿童在智力或身体上留下残疾，还导致大批儿童营养不良。为了拯救千百万儿童的生命，1977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要在1990年使全球儿童对上述疾病进行免疫接种。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又将"免疫——每个儿童的机会"确定为当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诸福棠欣慰地看到《北京晚报》1988年4月23日一版头条报道：首都千万儿童防病的屏障——计划免疫成绩显著。全市麻疹疫苗、卡介苗、小儿麻痹糖丸疫苗、白喉百日咳破伤风混合制剂四种制品的接种率迅速上升，1987年全程覆盖率已达95.36%，提前三年达到了卫生部颁发的计划免疫指标。计划免疫网覆盖了北京城近郊和远郊广大地区。北京市还把4月24日定为计划免疫宣传日，4月24日至30日为全市计划免疫宣传周。诸福棠十分高兴，这正是自己多年愿望的进一步实现。

诸福棠不仅是著名的好医生，还是一位卓有贡献的医学科学家。这一点早在30年代初，远在大洋彼岸，已见端倪。

四、遨游欧陆

出国进修的任务即将完成。短短两年里，诸福棠给哈佛医学院儿科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想不到这个架着近视镜的精瘦的年轻中国医生有这么大作为。诸福棠赢得人们的敬重和好感，不仅在他学术上的成就和医术的高明，他和美国同道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亲密合作，彼此以诚相待，大家觉得他朴实、恳切，乐于助人，总是那么真挚地关心爱护别人；对待病儿更是情同亲人，关怀体贴，无微不至。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和高尚的医德，诸福棠虚心好学，处处拜师求教，已相沿成习，进修期间任务重时间紧，他仍不忘抓空听各种演讲，并向名家讨教。听说哈佛医学院著名外科大师库兴教授（Cushing）要在一天晚上公开演讲脑肿瘤。那天，他匆匆吃罢晚饭，就从儿童医院起身，沿着哈佛医学院前长街步行一刻钟，赶到了彼得根勃利葛姆医院（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大楼，挤进人山人海的讲堂。库兴教授一开口，全场立时鸦雀无声。大师讲得十分生动，有声有色，内容是他研究的垂体腺体肿瘤，反映了多年的认真观察和研究心得。诸福棠大有收获，和全场观众一起长时间热烈鼓掌。这次"胜读十年书"的听讲至今难忘。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诸福棠应邀出席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宴会，恰与白宫医生同席，除向客人介绍我国控制血吸虫病的办法之外，还提到对库兴教授的印象，两位同行感受相同。

诸福棠在波士顿有机会熟知不少儿科专家，如病理科的法勃（S·Faber），血液病科的丹安蒙（L·K·Diamond）以及小儿外科的格罗斯（R·Gross）等；他还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欢迎和款待。一次，哈佛的生理学老教授坎农（Cannon）约请他到家吃晚饭。诸福棠向老教授介绍中国的情况，讲自己来

美国进修的体会，老教授对这位中华青年给了诸多赞赏和勖勉之词。诸福棠不忘向这位对痛觉生理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学者请教。他感到，美国的积学之士对中华民族是有好感的。科学技术的交流和文化界的活动，本来就不该分种族国别。

和我国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一样，诸福棠认为，学成回国，为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效力，是顺理成章极自然的事情。他带着丰硕的成果和美国朋友的诚挚情意打道回国了。哈佛医学院儿科同道们赠他一个刻着校名的大型铜质书镇；波士顿儿童医院在午餐会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全院职工给他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上面写着："诸大夫不但是一个好医生，又是一位人格完善的人。"这绝非溢美之词，而是人们发自肺腑的心声。诸福棠深为所动，把朋友们的鼓励铭记在心。他想，自己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做得还不够呢！

离开波士顿，诸福棠又开始了遍访名师的"求经"历程。他先到纽海文，访问了耶鲁大学医学院著名儿科教授盖赛尔（Gessell）；到有过救命之恩的前协和校医韦大夫家拜访叙旧；然后到达纽约去看望他的恩师、哥伦比亚大学儿科教授魏吉，并在他家做客。诸福棠还拜访了纽约大学教授豪慈（他的父亲就是1923年应聘任协和客座教授死在中国的儿科泰斗豪慈老教授）。诸福棠求贤若渴，不遗余力地一路访名家求新知。访问纽约之后，先在华盛顿参观林肯纪念碑及其他名胜，接着去巴尔的摩参观访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儿科主任教授派克（E· Park）。

1933年6月，诸福棠乘德国"欧罗巴"号客轮东渡大西洋，带着哈佛教授写的介绍信，去遨游欧陆各国，拜访欧洲的国际知名科学家。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先后访问了法国的巴斯德研究院，丹麦的血清学研究院，奥地利著名儿科专家、维也纳大学的拿倍儿（Nobel）教授，德国柏林大学的培索（G·Bessau）教授，英国的派森斯（Sir Leonard Parsons）和赖

特伍德（R·Lightwood）教授以及丹麦首次阐明维生素A缺乏症的勃鲁赫（Bloch）教授；在伦敦还参加了第三届国际儿科会议。然后路经瑞士、意大利，在法国马赛搭坐荷兰船回国。

初访欧陆，一切都是新鲜的。诸福棠在走过的异国名城都拍了一些照片。还在照片背面记下了见闻观感。可惜“文革”中遭劫，象册早不知哪里去了。还好在各国购买的医书扉页上也有些记述。聊可引起点滴回忆。在维也纳参观拿倍儿教授的诊所和医院时，诸福棠购买了他的名著《正常儿和病儿的营养》，从扉页上他当时写下的观感中可以看出当时欧洲的儿科权威、维也纳大学的著名教授毕尔奎（C·V·Pirquet）有三个有名的学生，一个是拿倍儿，一个是锡克（B·Schick，曾发明白喉的“锡克试验”），另一个是汉姆勃格（Hamberger）。前二人是犹太人，结果汉姆勃格成了毕尔奎的大学接班人。可见，虽然当时希特勒还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幽灵已在四处游荡，欧洲一些大学已受影响，选择人才要考虑“人种”优劣了。

在英国，诸福棠到伯明翰访问儿童医院及其院长派森斯教授，他擅长血液病学，曾刊出儿科专著上下两册。1933年7月访问伦敦大屋门儿童医院，（Street Children's Hospital）购得了赫其森教授（Robert Hutchson）所著《儿科病讲座》，于该书扉页上有如下短记：“此院在七十余年前开创，由私人捐款所设。院中人才辈出，蜚声于英国儿科界。参观时了解到，白发的赫奇森老教授每周到院查自辖之病房两次，为学生讲解，全系义务工作”。可敬可赞的老教授，为了科学事业，他重义轻利，不要报酬。

34岁的诸福棠只身遨游欧陆，访问名牌大学，权威学者，他谙熟英语，能讲德语，得心应手，一路顺风，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位甫过而立之年的中国医生触及了儿科学世界最高水平的奥秘，医疗技术、学术思想都得到许多启发、充实和提高。

他无心做“徐霞客式”的旅游观光，访问学习还嫌时间不够呢！只是在维也纳“小住兼旬”时，利用星期日的空隙，小游了一番。然而念及敌寇入侵，国土沦丧，又不禁览物伤感。他在医书扉页上写道：“曾走访维也纳各区，睹其建筑之宏富，音乐之优良，人情之淳厚温和。至其喧勃鲁姆（Schöubrüm）之古园陵，每逢假日，男女如云，野宴、日光浴者比比皆是，在星期日固无人不背肩行囊作郊外游也。尝得暇登库培尔古宫，远眺多瑙河，桥梁三四，宛然入画。乘车南行达拉克司（Rax）高原，由电缆车移升山巅（阿尔卑斯山脉之一部），积雪累累，疑置身广寒宫，万山围绕，皓月当空，涧水潺潺，与五千尺以上松风相呼应，壮哉此观。偶一回首，东望故乡，正日本帝国主义逞凶，似乎东北烽火隐约可见，不禁暗诵‘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二句。”

自幼熟读诗书的诸福棠，深明安史之乱中唐都长安失陷后，诗圣杜甫写《春望》时那种热爱国家眷念亲人的强烈感情和美好情操。诸福棠远在欧陆，思念疆土破碎的祖国，暗自饮泣，怅然若失。当他回到阔别两年多的北京，大片国土已改变颜色。

第九章　中国第一部大型儿科学

一、学以报国

诸福棠的这次环球旅行，历时两年，在此期间，三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使他的心情十分苦闷。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正处在新的经济危机中，美国也受着大萧条的困扰。这对前往进修深造，对西方物质生活不感兴趣的诸福棠倒不关紧要，他全力以赴在求学探索。感谢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勤劳朴实不怕艰辛的民族气质形成的一股意志力量、道德力量和人格力量，靠着这个精神支柱，诸福棠发挥个人的才智，去攀登医学高峰。他在美国期间，不肯在与医疗、科研无关的事情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可惜却不得不在常人轻而易举的生活小事上耗去不少宝贵时光。受之父母的这副身子骨毛病太多，他长年便秘，经常要靠自备灌肠器排忧解难，完成那无法回避的排泄任务。他患痔疮，别人不曾知晓，那顽疾时好时犯，不断袭扰患者，诸福棠强自克制，尽量减少其危害。有一次严重发作，再也无法支撑了，只好请熟人介绍取费较少的医院，住院动了手术。从此祛除了痼疾，更能多做医疗预防和科学研究的工作。

这文弱书生带着看不见的“无价之宝”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国，可不象在国外那样受到赞扬。没有谁向他颁发国家发明奖，没有舆论宣传给予鼓励和荣誉，尽管他发明了预防麻疹的胎盘球蛋白已誉满全球，造福全人类。只有医界同行们和有关研究人员怀着羡慕崇敬的心情热烈地欢迎他，高度评价他的科

研成果。

诸福棠并不计较这些，他从没想过把自己应尽的职责当做沽名钓誉的资本。他明白，祖国是永恒的，对祖国他要一往情深；他卑视那帮官僚政客和军阀独裁者，那些人无意关心人民健康，科技进步；他们不顾生灵涂炭，一味卖国投降，听任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却热衷于打内战，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对祖国薄情的正是那些卖国求荣争权夺利的人。为此，他对政治很反感。诸福棠虽然关心国事，却只是一心埋头做学问干事业，那个年代，他哪里有正确处理红专关系的概念呀！

诸福棠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是利国强民，事实证明，只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自身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诸福棠回到协和任讲师三年，旋升儿科主任，由副教授到襄教授。他主持繁重的日常医疗工作，又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日益迫切地感到应该有我国自己的儿科用书。在协和那么多年，所有教材全是外文的，一直沿用着美国豪慈教授所著《婴儿和儿童的疾病》一书。协和是美国人办的，可每天前来求医就诊的都是中国人，是千千万万遭受病患痛苦的炎黄子孙啊！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揭开了日寇全面侵华的序幕。北京城不到一个月就完全置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了。“党国要员”和他们的军队丢下大片国土和亿万人民，自顾夺命而逃了。苦了平民百姓和一时难以离开的各业人员，他们都有一家老小哇！协和的人们也都惶惶不可终日，少数医务人员离京南行，大多数人则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不过，靠着当时美日间互相利用的微妙关系，日本人暂时没有干预协和的事务，这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就战战兢兢地维持下去了。北平沦陷后，美国政府曾劝告美国侨民离开中国，但协和的美籍人员没有走，学校当局也无意内迁或停办。中国教职员工的想法是，只要协和存在下去，都有正当权力在自己的国土上留下来继续

工作。虽然不能奔赴后方直接为抗战出力，为此深感遗憾，但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仍然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又稍可自慰。

诸福棠和小儿科的同事们留下继续工作。他除了做好日常的医疗、教学工作之外，无心他顾，深知在当时形势下不可能有所创新，便把几年来一直萦绕心头的想法付诸实施，开始动手写书。1940年9月诸福棠派去赴美进修的青年医师吴瑞萍学成回国时，中国的大城市大多相继沦陷，他和诸福棠一样忧国忧民，心情沉重，便应诸福棠之邀，连同邓金鍌等其他几位同道参与编著《实用儿科学》。

诸福棠把国家仇民族恨化作“卧薪尝胆”艰苦奋斗的力量，展眼远望，忍辱负重，誓为救亡雪耻和创建中国的现代儿科事业竭尽所能。

二、《实用儿科学》问世

这又将是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中国还从来没有一部自己著的现代儿科医学全书。诸福棠牢记进化论的启示，从发明胎盘球蛋白的过程中也进一步体会到，科学技术发展无止境，大自然的奥秘远未被人揭开，不停地探索前进，开掘未知，是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天职。从日寇全面侵我中华，他就痛下决心，一定要写出中国自己的儿科学。他不顾一天的劳顿，每晚笔耕不辍。路漫漫，夜茫茫，字字艰辛谁人知！急煞夫人朱定一，他怕丈夫过累，便在他桌旁放一只闹钟，提醒他到时搁笔，然而竟形同虚设。

诸福棠做学生时就搞过研究，思维能力强，善于综合分析，理出问题，提到理论高度。八年的医学院刻苦学习和多年的丰富临床经验，为他写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大量实际病例。欧美之行又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正是古今中外尽收眼底，提起笔来，左右逢源，文思泉涌。

他著书的目的很明确，不为个人求取功名，锦上添花，只为解除华夏子孙病痛，增强中华儿女体质。所以全书紧密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儿科疾病在全国各地的发病状况不同，各地病种不同，发病季节也有不同，这些特点在全书各章都有所反映。注意到这点,才有针对性,从而得到正确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例如，我国有许多寄生虫病种，南北各地普遍存在，从前只知道广东人爱吃鱼生粥，容易生肝吸虫病，也容易因此而生肝癌；实际上北方如京津，中部如徐州等地也有发生这种病的条件。又如以前只知道朝鲜人比较多患肺吸虫病，后来了解到，全国20个省区都出现过肺吸虫病。特别因为小孩喜弄小鱼小虾，容易染病。书中详述了病原虫的生活史，了解其生育环节，以便积极预防,广泛地进行卫生宣传，使群众养成不吃生鱼虾的习惯。当年,结核病在全国广泛存在，防治儿童及成人结核病乃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书中特设专章讲述。又如黑热病曾广泛流行于我国北方各省，美国权威儿科学书中并未提及，在本书有专节详细介绍。另外，对新发生和新了解的重要疾病，如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也在新版中做了详细描写，以便引起广泛重视，求取更多更好的防治办法。

通观历次再版的《实用儿科学》,更可见其独特的“风采”。诸福棠在书上贯穿了预防为主的思想。当时还没有人如此明确具体地提出这个问题。中国的病太多了,孩子们更是深受其害。如果让人们少生病不生病，防患于未然，那是最理想不过了。“上医治未病”,真正高明的医生不是坐等患者上门，应该善于启发诱导，教给人们预防疾病的知识。诸福棠发明胎盘球蛋白，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长期苦思冥想,深入探索研究的成果。早在30年代初在美国哈佛校园与同时留学美国的公共卫生医师朱章赓的一次畅谈，搞好预防保健就已定型为自己重要的奋斗目标。诸福棠在书中举天花和麻疹为例，说明预防工作的重

要性。中古时代称为"黑死病"的天花，其传染之广和病死率之高，早已为人所洞悉，只因长期缺乏预防方法，以致迁延了多少世纪，为害人类。麻疹曾是个个小孩必生的传染病，城市乡村到处流行；其危重并发症如麻疹肺炎等，常置儿童于死地。旧时代任其逞凶肆虐，难以控制。解放后，人民政府提出"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连续大规模地施种痘苗，终于根绝了天花，1960年云南发生最后一例，从此未见出现。1979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宣布了在全球范围内天花绝迹，"黑死病"的可怕流行和终生麻面的残酷烙印一去不复返。60年代后期我国广泛推行了麻疹疫苗接种，基本消灭了麻疹大流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见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有朝一日，更多的小儿疾病也会象天花、麻疹一样不再为害人群。

诸福棠写书极少抽象概念和不着边际的空洞说教，而是用大量实际事例，深入浅出地把道理说清说活，医务工作者看了，有助于提高诊疗技术，并自然地接受作者"只治不防，治不胜治"的观点，重视预防保健工作。常人阅读也大有裨益，能学到不少防治小儿疾病的常识。此书定名为《实用儿科学》是名副其实的。

医疗卫生事业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它的进步发展要靠先进的社会制度，靠政府的提倡和支持。这是大量事实证明了的真理。诸福棠写《实用儿科学》时对此深有感受。他在初版序言中痛心疾首地写道："我国儿童之疾病率及死亡率远过于先进国家。最大原因乃系预防知识未能普及，医界乏倡导之热诚，政府无推行之决心，遂致疫病流行，死亡枕藉，其影响于家庭幸福，社会经济者，曷可胜言。""政府无推行之决心"，看似委婉之言，实际是对反动统治的有力抨击。诸福棠在当年写的医书，能做这种政治性的分析推断，点明实质要害，是难能可贵的。

祖国医学在世界上有独特的光采，中华民族数千年代代繁

衍生息，中医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对中医采取限制和消灭的政策，极力摧残这朵灿烂的传统文化之花。诸福棠不予苟同，倒不是因为自己的祖父和岳父曾是悬壶济世的老中医，他坚持科学的态度，经过客观的观察和实验，确认中医是祖国卫生事业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上大学二年级时就和别人一起研究过中药苦草。他认为，中西医合作同辟祖国医学新径，必有辉煌进展之一日。他在书中专写了中医儿科学发展简史一节。他对中医的推崇和所持之科学态度始终如一，晚年还向后生晚辈宣传介绍唐代名医孙思邈的高尚医德和宋代儿科名医钱乙的创新精神。

在医学著作史上，我国早有名人名言，大可学习。但主张发挥群众的专长，发扬团结精神，提倡集体著述，诸福棠是先驱。写作初稿的当时，他是协和小儿科主任，亲自动手写了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他的同事和助手范权、苏祖斐、吴瑞萍、邓金鍌等都参加了编写，付出了智慧和劳动。

披星戴月，苦战五载，80万言的《实用儿科学》于1943年1月出版问世了。诸福棠在序言中写道："此书之成，全赖儿科同志各就所长，贡献其宏论……此种分工合作之方式在吾国医学著述界中尚寥若晨星。我儿科同道毅然试行，显示团体服务之精神，至堪庆幸"。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至今为人称道，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诸福棠个人的崇高品质和道德情操确实令人崇敬。

《实用儿科学》早年问世以后，医学各科的大型著作，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了。

三、"一部活书"

《实用儿科学》初稿写成之后，诸福棠征得合作者同意，交给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华医学会总会出版，未取分文稿费。这

部儿科医学全书问世，大受国人欢迎。北大医学院医史学教授李涛的评价是："这不但是国人自著的第一部儿科学，而且是一部活的书"。宋庆龄在上海看到刚出版的《实用儿科学》十分高兴，设法寄到了解放区，在那里得到广泛翻印，对解放区广大儿童的医疗保健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又在东北解放区重印，列为大学丛书之一。但这部饱含着对祖国热爱对儿童深厚情感的大书，在旧社会並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初版才印了一千册。

解放以后，《实用儿科学》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四次增订再版，每版都要重印两三次才能满足人民需要。它成了全国医学院校和儿科医师的主要参考书，不但医务人员视为珍品，儿童家长也有购买备用的。源远流长的《实用儿科学》逐步发展壮大，从初版时的80万字一册到1985年第四版上下两厚册，共计370多万字。诸福棠常说："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有限的。我们国家很大，东西南北病种很多，即使同样的病种，病情也有不同之处。要团结全国各地有经验的儿科医师参与修订，大家共同努力来使它不断发扬光大。"他自己则率先精益求精地为这本书的不断充实随时付出辛苦。多年来，在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桌上，总有一两本新版《实用儿科学》，从新书刚出版，他即随时根据新文献与新经验，进行修改，书的墨迹未干，几乎每一页的边角行间都有了他新增的字句，甚至有整段的修改。他要求参与修订的同志随时注意改正错误和加入适合国情的新内容。诸福棠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很重视，只要在新出版的书刊上看到了新课题和新的有效诊治经验，立即认真阅读，并摘录下来。他从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近年医学界对免疫学的研究开展迅速，对组织相容性抗原这一新课题有所认识，他尽力融会贯通，写成初稿，交有关专业研究人员补充完善。这部巨著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科技事业的进步而不断充实提高。写作单位由初版时协和一家发展到遍布全国的40多个医疗科研部门；编写人员由不到十人到最近一版的150多人；主编由一人

变为三人，第二位是诸福棠多年的同事和密友吴瑞萍教授，第三位是他的得意门生、接班人，刚退任的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胡亚美教授。吴、胡二位都曾坚辞不就，只做参与编写人员，拗不过老前辈的嘱托才服从了诸老的安排，答应和他一同列名主编。曾先后做过诸老秘书的余鸾雏、郑峤二主任医师，学习诸老忘我奉献的精神，在历次《实用儿科学》再版工作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使全书统一的文字校对、内容核实及一系列的联系工作，使诸老放心、满意。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儿科杂志》总编辑、曾任协和儿科主任34年的周华康教授，在1987年第一期《中华儿科杂志》上发表《学习新版 实用儿科学 》的文章，指出："新版《实用儿科学》的内容达到了全面现代化。这是我国儿科界的一件大事，对培训我国儿科医疗保健工作者，促进我国三亿儿童的保健事业，提高下一代的健康素质，必将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诸福棠教授对我国的儿科事业，包括保健、医疗、教学和科研等方面贡献很大。《实用儿科学》凝聚着诸老的智慧和经验，是一本深入浅出的高质量的儿科参考书，是我们接受业务继续教育，提高水平的最好的教材。"

《实用儿科学》也是诸福棠教授品德和人格的写照。他胸襟博大深邃，如大海，似苍穹，他惯于搞五湖四海，鄙弃孤家寡人，从不把成果当成个人的"领地"，更不图一己之私利。这么多次大量的增订再版，稿费标准再低，也是一大笔收入，初版所得全部稿费，捐赠给中华医学会以维持困难时期会务开支，其后所得，大部分做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补助经费和编写人员的劳动报酬，这位花费精力最多的"总导演"兼"主角"却分文未取。值得提出的是，诸福棠在新版《实用儿科学》里增加了"医德"一节。耄耋高龄的老教授号召广大医务人员学习药王孙思邈的高尚医德和舍己为人的服务精神。他常说：作为医生要多立公心，少生私念，职业性质决定了医生是为病人

服务的，做医生的必须具备自我牺牲的高尚品格。

诸福棠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国人自著的第一部现代医学大书，即便是在“文革”那个万马齐喑的黑暗年代，也迫于群众要求再版过一次，只不过把主编和编写人员的名字全部取消，落了个“编辑委员会”的集体署名，在那动辄得咎的恐怖年月，哪个出版社敢写上那些“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字呢！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实用儿科学》获得国家发给的奖状，1988年又被以卢嘉锡为主任的优秀科技图书评选委员会评为一等奖。

第十章　穷时不坠青云志

一、高墙难关亡国恨

协和，在抗战开始后的四五年里，处在一个特殊环境中，日本侵略者还没有公开进行干扰，诸福棠在"豫王府"高墙大院和本校宿舍楼里深居简出，看病、教书、研究学问，过了几年相对稳定的生活。但他那颗炎黄子孙的心，并未感到有一时一刻的平静。诸福棠一家在协和南院教职员宿舍里住着，每天在北极阁和东单三条之间来来去去，没要紧事从不外出，他看不得到处飘扬的太阳旗和耀武扬威的侵略兵。他甘于寂寞，潜心工作和著述，在宁静的环境中求取事业的进步和成就。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自从1935年唯一的儿子出世以后，他多了一个精神依托，倒不是为了诸家有了接香火的新一代。他给儿子取名"沛予"，希望儿子将来继承父志，少取多"予"，为国为民尽忠效力。这孩子自幼聪颖乖觉，讨人喜爱，上学读书，成绩超人，亲朋家长常常夸奖。诸福棠也没有全部沉浸在温馨的家庭小圈子里，但经常交往的也多是协和圈里的人和医界同道，谈话内容出不了业务上的事。然而，协和总不是个远离尘世的孤岛，外部大气候的阴霾时时笼罩在人们心头，虽然由于美国人在，协和还勉强维持着，大家心照不宣，就倍感亡国之恨。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出动大批飞机，利用星期日休假，突然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美国损失惨

重，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协和，美国在中国的这块“领地”迅即被日寇侵占。《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第32页记载：“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进驻学院及医院。全校职工出入均受监视。学生停课。医院的医疗工作虽然暂仍维持，但门诊停止，亦不再收新病人住院。至1942年1月31日，学校、医院及宿舍完全被日寇侵占，病人全部出院。留校的外籍领导人员均被监禁。由于与内地交通早已完全阻断，此时突然失去凭依，又不可能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因此全校医护员工只能各谋生计”，“直至抗战结束，协和职工无一人腼颜事敌”。

协和遭到空前的灾难，全部设备财产悉被日寇侵吞。帅府园医院正门挂起了日本国旗，有敌寇哨兵站岗，协和变成了日军后方医院。在协和学习工作几十年的中国职工人人自危，纷纷自寻生路。协和牌子亮，水平高，人们谋生并不难，很多教授、高级医师在京津等大城市挂牌开业，都是业务兴旺，患者蜂拥而至。人们说，象诸福棠这样的名医，协和的教授、科主任，要是开业行医，保准金条大批来，汽车洋房很快到手。然而他计不在此，另有思谋。

二、三结义 小楼舞春风

离开协和，没有了固定收入，诸福棠首先要为他五口之家的生计谋划。但是他心灵深处的大千世界，那个特殊的精神领域无比广阔，包容着千千万万患病儿童和受难的祖国，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事业心使他不能只想着自我和小家庭；多年的艰苦磨炼培养他富有拼搏前进的能力和自我牺牲精神，他有创业的远见和实实在在的理想，深思熟虑之后定下了一个比解决一家人生活问题更为艰巨的目标，他要筹办一个儿童医院，为中国的现代儿科事业打下个根基，培养些人才。他找协和小儿科的同事、比他小八岁的讲师吴瑞萍商量，喜得知音；又

邀年富力强的主治医师邓金鎏一起干，又获赞同。于是三人倾心谋划，一幅蓝图逐渐显影了。

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鎏，这不同年龄层次的三位儿科同道携手创业，一时传为美谈，被誉为“桃园三结义”。三人交之以心，待之以诚，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兄弟情谊。吴、邓两人把诸福棠尊为院长，诸福棠确也受之无愧，他不仅学识水平、医疗技术堪为长者，又有刘玄德那种“诚笃宽厚，知人善任，以德感人，以德服人”的品德风范，凝聚力是很强的。所以他们虽然身单力孤，白手起家，全靠个人微薄之力，医院的筹建工作倒也进行得很快。建院先得有个地址。吴瑞萍征得父亲和弟弟妹妹们的同意，把东堂子胡同13号自己住的一座小楼让了出来，全家另租一处普遍民房住下。医院用的桌椅家具由三家凑来。三人倾囊集资，诸夫人朱定一的亲戚刚卖掉一处房子，所得三千元悉数被借来用作买药资金。办个医院谈何容易，光有医生也不行啊！于是请来协和老同事小儿科护士长刘静和等人，他们也成了创业功臣。大家都是身兼数职的“多面手”，医生兼管财务，护士也做采购，化验员也管挂号，见活就干。

院长诸福棠事事认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把多年行之有效的好经验都带到这个新建的小医院来了。曾经兼做协和医院儿科护理监督的刘静和精明能干，包揽了治疗以外的全部事务，她按协和的一套布置门诊部和病房，连床单也不能有接头，为此，她满城采购宽幅白布。两间小病房的墙壁、窗帘、桌布都不同颜色，一间粉红，一间淡绿，十分整洁雅致。就这一座两层小楼，不到十间房，员工十三人，1942年早春2月先开门诊，待逐步布置好了两小间病房，安排了六张床，4月4日（旧中国儿童节）挂出“北平私立儿童医院”的牌子，正式开院了。

北京城出了一件大新闻。一家发行量很大的小报为这个小

医院大做宣传，正式开幕那天，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做介绍，诸、吴、邓三位医师的照片也上了报，自然标上协和名医、专家教授之类响亮的头衔。医院没花一文广告费，也没请客送礼走后门，是那小报主笔出于自愿，主动这样做的。原来他的孩子曾患重病，是在协和小儿科住院治好的。在他眼里，这个小医院就是协和小儿科在“移师”开诊，为表心意，这一版新闻算是他的“鸣谢启事”了。

其实，何须小报宣扬，自从开始门诊以来，东堂子胡同那座小楼早已门庭若市了。四月正是春风荡漾、桃李盛开的季节，诸吴邓大业初创，倍感欣慰，忙里忙外地为孩子们操劳。医院业务急速发展，门诊、住院之外又加了出诊，盈利日渐增长，陆续增添了一些设备，药房也越来越充实齐全了。病家相互传颂，远近患儿闻名前来，益发难以容纳了。那年月，商业竞争激烈，一般开业医只愁没法多拉病人；这里却无需操这个心，协和儿科的牌子，高超的医术，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服务态度自有独特的吸引力。

三位医生忙过一天，晚上还要挑灯夜读，搞研究，写文章。诸福棠主编的初版《实用儿科学》当时即将刊出，每天还须抽些时间审核校样。

这是一座规模虽小，“五脏俱全”的正式医疗机构，一切按正规行事。专家学者开医院，没有江湖习气和铜臭味。中国现代儿科事业正在这里孕育成长。

三、创业育才的基地

东城东堂子胡同东头那座小楼门前，每天人声鼎沸车马喧，小小儿童医院快胀破了，门诊病房经常满员超饱和。吴瑞萍除承担一般医疗任务以外，还兼管一些医院行政，包括财务和对外联系等事。诸福棠遇事总先找他商量，多所倚重。但身为一

院之长，社会上一些难以躲避的活动也须亲自出面，这是无可奈何违心也得应付的。诸福棠以长者的风度，博大的胸怀，认真的态度，无私的用心，全力治院，宽厚待人。在私立儿童医院的整个历程中，诸福棠始终深切关注职工生活。在那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升的岁月里，职工的工资按着物价上涨的比例随时调整。情况最严重的时候，物价一日数变，为了保证职工取得必要的生活所需，每隔几天就先发一部分工资。由于诸福棠这种大公无私，处处为人着想的作风，全院上上下下心无二致，紧密团结，共襄院务。

诸福棠在担任协和儿科主任时建立了两个科学研究化验室，一是生化化验室，由他自己和范权主管，另一个是细菌化验室，交给吴瑞萍管理，后来邓金鍙也在这化验室工作。当时吴瑞萍研究的主要课题是百日咳的自动免疫。治疗百日咳没什么好办法，因而通过疫苗注射防止发病，尤其重要。那时候国内还没有有效的菌苗。百日咳诊断一般取决于临床，病原菌的培养相当困难，收集标本不容易，而且菌落生长很慢，又极易被生长快的杂菌所淹没，往往徒劳无功，一般细菌化验室视如畏途，不开展这项工作。吴瑞萍悉心钻研，克服困难，经常能从早期病儿的鼻咽部取得新鲜的百日咳菌株，制成菌苗应用于临床；从血清学实验及流行病学的研究成果，说明他制做的菌苗确实有效，他还和邓金鍙合作，通过长期仔细的追踪观察，初次发现接受过百日咳菌苗注射的小儿，一旦接触了百日咳患儿，不但不受感染，而且其血内原有的百日咳抗体滴度还提高了好几倍。这一发现曾受到美国研究百日咳的专家索尔（Sauer）的赞许。此外，吴瑞萍在协和工作的年代，曾对链球菌做过动物试验，发现有产生自动免疫的可能性。1939—1940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儿科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回国后继续进行研究。他还与上海医学院儿科教授陈翠贞联合主编过《小儿传染病》。

邓金鎏长于讲学和研究，写有《体液平衡与输液》、《基础儿科学》、《育婴指南》等专著。这小小儿童医院也是儿科专家们在科研领域里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他们随时得到诸福棠的鼓励和支持。

诸福棠在这方面又是榜样和带头人。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册第15章《妇幼保健》中，关于“北京儿童医院和儿科专家诸福棠”一段指出：“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诸福棠，在发展中国儿科学方面是有独特成就的”，“诸福棠教授解放前就做了不少工作”（该书第208页）。这些工作包括他发明胎盘球蛋白、主编《实用儿科学》，发表大量学术论文以及培养人才等等。奠基人，这是名副其实的客观存在，而诸福棠却坚决不予接受。本书作者请吴瑞萍教授评述，他认为，诸老功绩卓著，众望所归，“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也许诸老考虑到当年有几位同道比他年长资深，他一向是虚怀若谷，尊重他人的。现任中华儿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儿科杂志》总编辑周华康教授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诸老一贯忘我无私，谦虚得很。他是中国现代儿科事业奠基人，事实如此。

从周华康教授写的“我国儿科学术活动的历史材料”中得知，早在1936年10月，北京的诸福棠与上海的祝慎之、富文寿、高镜朗等医师发起筹组我国儿科学会，抗日战争前夕在上海正式成立，选祝慎之为会长。那时候，政府不予重视，无人关怀支持，学会活动很少，影响十分有限。学会成立时就决定办儿科杂志，多年无法实现，直至1950年7月1日才创刊，以上海医学院儿科教授陈翠贞为主办人。几位学会发起人只有诸福棠一人在北方，联系活动诸多不便。解放后，学会和杂志迁来北京，从1950年儿科学会第三届大会开始，诸福棠历任学会理事长（后改主任委员）和杂志总编辑，一直到1981年。诸福棠多次提出辞呈，学会为了照顾他的健康，推举他为名誉主任委员，由吴瑞萍教授当主任委员，自1985年起再由周华康教授接班。

诸福棠教授默默奉献数十载，勇挑重担，淡泊名利，大家由衷地敬重他。

成就一番事业，要付出心血和精力。创业尤为艰难。诸福棠的名字和中国现代儿科事业紧紧相连，密不可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是他创立毕生事业储才培干的一个小小基地。

第十一章　事业高于一切

一、辗转府前街

在八年抗战中，诸福棠无力冒着敌人的炮火去冲锋陷阵；然而胸中那颗拳拳爱国之心有力地跳动着，不曾失去大方向，他在另一个战场上同自然界的敌人，同危害儿童健康的疾病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且战果累累。东堂子胡同北平私立儿童医院办了几年已名震古城，诸福棠正当不惑之年，体质虽不佳，精力却充沛，他主持院务，亲自诊疗，还从日常工作中总结经验，研究探索新问题；他手边放着初版的《实用儿科学》，随时积累新资料，准备补充修订再版。

孩子是天真可爱的，病儿更是令人同情。三位儿科同道每天为小患儿们不辞辛劳地忙碌着，用他们渊博的才识和高超的医术，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埋头做着奉献，望着那些受病痛折磨的小生命，怜悯痛惜之情便油然而生。一天，邓金鍌大夫出诊回来，面色阴沉，闷闷不乐，一问才知道了他伤心的原因。他为一个几天拉不下屎的孩子治疗，泻药、灌肠都不起作用；原来是几块硬物堵在肛门，万般无奈，邓大夫用手帮孩子一点点地抠了出来，竟是一些杂粮壳、花生皮之类凝聚成的沙石一般的排泄物。这还不是穷家子弟，在敌伪时期每天也只得吃那种含粮极少的混合面。诸福棠也不断接诊由于营养不良、浮肿得皮肤发亮的患儿，还有并发走马疳的黑热病和先天梅毒病儿。这就是那个世道的悲惨写照。那年月，患重度营

养不良以及天花、霍乱、麻诊、结核、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不知夺走了多少儿童的生命！

诸福棠在精神压抑的苦闷中磨炼着意志，把爱国情报国志凝成一心搞好医疗、科研和著述的坚强毅力，他把自己的生命也融在重于一切的事业中了。小儿童医院日益兴旺的业务，使人增强信心，建立一座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儿童医院的理想和抱负，促使他益发勤奋地忘我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了。诸、吴、邓三位正直的儿科医学工作者，在沦陷区险恶的环境条件下苦撑苦斗，办起了一座规模虽小水平却很高的儿童医院，他们无比欣慰和喜悦地盼望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开进这座苦难的古城。诸福棠高兴地盘算着怎样给小儿童医院寻个大些的地址。

天安门西南方，今天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当时叫府前街，有几座赭红色小楼组成的一个小建筑群。那曾是福建人方石珊医生创办的“首善医院”。这几栋小巧玲珑的房子不仅位置好，正当市中心，而且建筑标准规格、医疗设施也力求现代化。可惜敌伪时被日本人占用，糟塌得不成样子了。抗战胜利后，方石珊收回了房子，却无力修复使用，便答应租给北平私立儿童医院。诸福棠认识方石珊，对这位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医务总监的前辈颇为敬重，把他答应租房看作是老人支持儿科事业的义举。不久，儿童医院喜迁府前街，在“首善医院”旧址上开始了新的业务，病床由6张扩充为30张，其中3张是为免费病人设置的。

在东堂子胡同那座小红楼里，三位“大医生”挤坐在一间小门诊室里，凭他们的学识技术，承担门诊、出诊和住院病人的医疗任务，是游刃有余的。如今医院扩大了，事业在发展，不能总是“刘关张”打天下呀！培养人才，是诸吴邓共襄大业的目标之一，还在1943年小医院开诊不久，一位20岁的姑娘来探视她因病住院的弟弟，那孩子是吴瑞萍负责诊治的。姑娘得

知大夫诊断弟弟患的是黑热病，便问吴瑞萍:"作过骨髓涂片，查到利杜氏体（黑热病原虫）了吗?"吴瑞萍不由一怔，望着年轻人那机智沉静的面孔，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些?""我是北大医学院的学生。"吴瑞萍高兴地引着这个大学生看骨髓片子和呈现在显微镜下的病原虫。两人相识了。事后,吴瑞萍告诉了诸福棠和邓金鍌,三人激动地一番计议,从此就生出了安排几名"小大夫"来院工作的用心，埋下了后来"三老带三小"生动局面的伏笔。

二、院训照人心

为了发展的需要，诸福棠租下"首善医院"旧址，花了不少钱、费了许多时日进行修缮。东堂子胡同那几件家具和些许设施远远不够了，便动用几年积累的资金购置了一大批病床、药物、医疗器械。一切都进一步正规化了，请来了专职的药剂师、化验员，新买了X光机。陆续招聘了几十名职工，大家都住在院内，不分昼夜地为搞好各项业务竭尽所能。由于诸福棠人品声望和德言懿行的感召，加上院方种种规定和福利待遇暖人心，使大家心情舒畅，紧密团结得象一家人。这里职工不分高低，吃住一律由院方免费供应，食堂随时有饭，不怕迟下班误餐；私人衣服也由医院的洗衣房包了。工资比别的单位高。到春暖花开季节，医院还组织郊游，做饭的大师傅、扫地的勤杂工和大夫、护士们同车前往，并肩踏青游览，尽情享受西山八大处、香山静宜园、碧云寺、卧佛寺等名胜古迹的美景。

天安门脚边这座私立儿童医院的名声更大了,门诊量猛增,外地病儿也纷纷赶来求诊。前门老火车站的三轮车工人不待病家开口，就会主动把患者拉到府前街来。这里还是老规矩，上午门诊，下午出诊，因为业务太忙，查病房改在晚上进行。随着服务半径日益扩大,三位大夫几乎跑遍了内城外城四面八方,

代步工具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三人核计，先后购置了三辆旧汽车代替三轮车，一辆美制“福特”,一辆法国“福勒”牌，一辆意大利的“菲亚特”。他们一不为摆阔，更不为兜风，只听病家一声呼唤，便一溜烟急驶而去了。三辆汽车不固定，三位大夫轮换着坐，这是诸福棠定的。其实，吴、邓二位要把那辆较舒适的1937年“福特”给诸院长专用，拗不过他呀！全院职工和三位院长的工资比建院初期多了许多，但三人之间月薪相差不过50元，这也是老院长下令定下的。

医院的业务蒸蒸日上，超出预料。诸、吴、邓三家分住的西小楼腾出来改为病房，又增加了20张病床。令人惊羡的是，小小儿童医院竟有个颇具规模的图书室，随时购置医疗卫生书籍和新出版的期刊杂志，为医务人员提高业务、总结交流经验、搞临床科研创造了优良的环境条件。诸福棠把自己所藏的医学书籍都放在图书室里，让青年医生护士们阅读。

抗战胜利后，诸福棠应聘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兼主任，对医、教、研兼长的著名专家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培养人才是他事业中重要的一环，大学堂是比医院更广阔的园地，给他提供了培育英才的良田沃土。不久，诸福棠先后把吴瑞萍、邓金鍌和曾在协和进修并留学美国的秦振庭都请去任教。他还聘任协和1939年毕业的赵锡祉为儿科讲师兼小儿科住院总医师，帮助他培养住院医生。以后赵锡祉赴美深造，担任了得克萨斯州的儿科教授。诸福棠当然不舍得放松府前街儿童医院的工作，他兼顾着两头。在科学领域里，医学是最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两者也是最容易结合的。诸福棠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北大医学院给的车马费，他分文不取，全部交给儿童医院会计处，以后吴瑞萍、邓金鍌也照样把北大车马费交公。这事不大，却说明三人同心协力，不以利禄为重。

北大医学院的学生们爱听诸福棠教授讲课，认为他的课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历久不忘。有一位儿科助教说，三年来听

诸教授讲麻疹，每年讲法不一，都是要点突出，娓娓动听。有个学生30年后熟记诸福棠教授所讲“小婴儿生长发育有些规律可循，大约每天长30克，每周长180克，星期日照例休息”，足见他讲课时庄谐并出，能帮助学生记忆。同学们更倾慕老师强烈的事业心。本章第一节提到的那个与儿童医院有一面之缘的大学生1946年毕业，诸福棠早就是她最钦佩敬重的前辈之一，诸、吴、邓对她也一直不忘，便有意识地安排她到儿童医院实习，接着留下当住院大夫，她从此高高兴兴地扎下根来，以院为家了。她就是担任过北京儿童医院院长的著名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这位当年被称为“小孩大夫”的22岁大学毕业生，一直在诸福棠亲手培育下迅速成长，由老院长的得意门生到可靠的接班人。1948、1949年又有江载芳、李同等先后从北大医学院到儿童医院实习，毕业后又分配到儿童医院工作，她们也是诸福棠挑中的好学生。新生力量充实了医务骨干队伍，儿童医院开始形成了“三老带三小”的基本格局。以后更有大量的青年医护人员源源而来。

诸福棠一片慈心柔肠使患儿深受其惠，也给家长无限温暖。人们交口称赞，感佩不已。那时候不讲写表扬信，病家习惯送匾或登报鸣谢，这是诸福棠无法劝阻的。他在大学课堂教学生，在病房、门诊部带“小医生”，都一再反复强调要注重医德。今已花甲之年的门生们至今记得老院长当年的谆谆教诲：“要把病人当做自己的弟弟妹妹，看做亲人”，“冬天给孩子做叩诊或触摸身体的时候，要先在热水里或暖气上温温手”……诸福棠对穷孩子尤多照顾，给予优待。三位老大夫出诊经常到贫苦人家，不是减收药费就是免费施诊。到富贵人家，是不讲客气的。在门诊看病也是这样，刚有处方权的年轻医生也受命灵活掌握，只要一看病儿骨瘦如柴，家长衣衫褴褛，便在处方笺上写上“Free”字样，病家就可以免费取药及接受输液注射抢救治疗，不收分文。

在府前街儿童医院工作过的人们，提起当年都流露出怀念和依恋之情，有的激动得流泪。老院长对职工是关怀备至的。1947年胡亚美重病卧床，高烧不退，除给以悉心治疗，诸福棠还自己掏钱为她请来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别护士”，日夜精心护理。人们互助友爱，精诚团结，已成为全院的风气。18岁的小护士马福荣家境清贫，哥哥参了军，在故宫博物院做事的父亲突然病故，一家人生计无着了。诸、吴、邓三位前辈带头解囊，全院同仁量力捐助，一下子集了两千多元。马福荣哭了，用尽心竭力干好工作报答老院长和大家的恩情。她进步很快，入了党，后来当了东单三条儿童医院副院长。

诸福棠治院有方，充分信任和依靠吴、邓两位同道好友，请他们担任副院长，分管全院的行政财务以及“外交”等事务。医疗任务是大家分担的。几位“小医生”也迅速成长，分担了老一辈很大一部分工作。药房负责人侯瑞琴兼理医院财务，管得井井有条。吴瑞萍常说：“诸院长最知人善任，他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长处。”诸福棠积多年的经验和心得体会，经同吴、邓等酝酿研究，制定了“公慈勤和”四字院训，并亲自挥毫书写，镶进一个长方形镜框，悬挂在门诊大厅里，做为全院人人遵循的守则。诸福棠自幼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和书法根底，人们不仅欣赏他的书法艺术，望着那遒劲有力、熠熠生辉的四个大字，对“公（大公无私），慈（慈祥友爱），勤（勤奋工作），和（团结和睦）”的深刻含义，都有亲身领会和切实感受。谁都明白，这是儿童医院办院方针和医疗作风的真实写照，更是老院长思想品德的生动概括。

三、殇子之痛

正当人们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时，诸福棠十一岁的独子沛予患当时无法医治的重病夭折了。这是他开办医院以后遇

到的第一件意外事故。沛予的出世曾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幸福和欢乐呀！他是爹娘和姐姐们百般宠爱的中心。沛予是那样的聪明懂事，书又念得好，父亲曾为他延请数学和英文辅导教员，盼他长大成人超过父辈，为人民尽力效忠。做母亲的恨不得爱子时刻守在自己身边，她怎么受得住这天降的大祸。她埋怨丈夫连自己儿子的病都治不好！她哪里知道，孩子得的是粟粒性肺结核，病情严重，发展很快，当年还没有链霉素、雷米封等特效药，也还没有卡介苗作事前的防范，再高明的专家也束手无策。那时候，全中国每年死于结核病的孩子无计其数。处在那个时代也只能尽人力听天命了。一向沉稳宁静的诸福棠也控制不住痛失爱子的极度悲伤，茶不思，饭不想，难以入眠。两个姐姐美端、美瞻至今忘不了妈妈那个时期天天哭，亲朋好友多方劝慰，望节哀保重。

痛失爱子是个人的不幸，动摇不了诸福棠干事业的决心和信心。看夫人激动的心绪有所平稳，他化悲痛为力量，又忘我地投入繁重的医疗工作中去了，这使吴瑞萍、邓金鍌从身处愁城、手足无所措转为惊喜交集，深感老院长的为公忘私，仍能为儿科事业奋斗的高尚品质。诸福棠寄厚望于新来的年轻大夫，亲自示范教导，尽量放手让他们锻炼。他把胡亚美、江载芳等看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每天带她们看门诊、查病房，培养她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医院坚持多年的每周一次的读书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给年轻大夫充分讲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报告经验总结的机会。胡亚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关于流感病毒肺炎的报告，后来诸福棠还推荐她去中华儿科学会的大会上做《非典型肺炎》的报告，得了个满堂彩，大家叹服这个二十几岁的“小医生”不但能治病，还会做临床医学研究和学术报告，真是名师出高徒。

1948年6月的一天上午，诸福棠正在北大医学院讲课，忽然儿童医院派来一辆汽车，催他赶快回院，说是吴瑞萍当天清

晨在浴室里摔倒，头部重伤，昏迷不醒。真是晴天霹雳，他立即赶回医院。诸福棠三步作两步急忙带同吴瑞萍驱车直达西四中和医院外科手术室。正是吉人天相，著名脑外科专家关颂韬正在手术室洗好手，准备为一名脑肿瘤病人做手术。看见这个急症，随即为吴瑞萍施行腰椎穿刺，发现流出的脑脊液是血色的，证明脑部重创损伤中脑动脉，当即做颅脑手术，取出大血块。吴瑞萍死里逃生了。但手术后过了两天，人还是昏迷不醒，终于第二次开颅。观察到脑子萎缩在一边，断定体液不足，经大量输液，渐见好转。然而在手术后最初几个月，吴瑞萍仍言语不清，右手右足动作不灵，长期疗养后才慢慢恢复原状。吴瑞萍突遭不测，被诸福棠称为儿童医院第二次意外事故。

多年之后，吴瑞萍每忆及此仍满怀深情地说："我之幸免于死，诸福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我铭感终身，永世不忘。"吴瑞萍说："我病重时期，诸院长整天守在我床边，隐隐啜泣，深深感动了我的爱人谢琳和有关的全部医务人员。当他看到我的病势越来越严重，竟想到为我的家庭准备条件，保证以后的生活，告诉我爱人他拟同齐鲁医科大学的领导商量，让在那里上学的我的儿子毕业后来我们儿童医院，子承父业。他想得这样周全，怎能不让人铭感于心！我病到最危险的时刻，主治医生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意图，提出了再次开颅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手术，谁都怕担风险，手术中死亡的可能性相当大。医院的例行手续是取得患者最亲家属的同意，签了即使死在手术台上也无怨言的字据才行。诸福棠当然不愿放弃这孤注一掷的机会。谢琳对诸院长表示：只要他认为手术应该做，她立即签字，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了。我得救了。开始我还直感激妻子谢琳，她的果断决定救了我一命。后来才得知实情。谢琳说，诸福棠是她素来崇敬和信任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哪一点不是为我们设想，这样的好上级好朋友还不值得信任依靠？原来如此，我真正的救命恩人还是诸

福棠！”

事业上的发展成就冲淡了个人的悲哀愁思。诸福棠本来对抗战胜利后的局势抱着希望，期待着政府能重视第二代的健康成长和儿科事业的发展，给这个有较大潜力的私立儿童医院以必要的支持。但是他的希望没有能够实现。他的医院职工们也曾对“蒋委员长”在《中国之命运》一书“国民今后努力之方向及建国工作之重点”一节中，做出要“建立16万所乡镇卫生院”的许诺（见九星出版社本第69页），感到兴奋，但是空头支票不能兑现。是啊，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大国，医疗机构太少了，国家办的更是微乎其微。北平私立儿童医院的创建正是适应了广大患者的迫切需要。以诸福棠为首的忠诚正直的医护人员们，在敌伪时期孤立无援的险恶困境中，做出如此成绩，确属难能可贵，可敬可佩。他30年代引起国内外重视的胎盘球蛋白的发明；他那全国第一部国人自著的儿科大书和几十篇学术论文；他创办了全国少有的专科儿童医院；他发起创立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他精心培育新生力量……这都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实实在在的卓越贡献。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和国际威望，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

第十二章　黎明前夕

一、世道该变了

诸福棠清楚,"东亚病夫"的令人深感屈辱的帽子是怎样扣到中国人民头上的。自己在本世纪初多次被病魔击倒，幸免于难；而自己的爱子却未能避过那致命的重症结核病。是进化论的法则失灵了吗？不！是有人逆着时代潮流在拖历史的车轮。细菌病毒没有种族偏见，它不分洲际国界，哪里禁区多，防治严密，它就难以涉足。为什么旧中国有那么多烈性传染病流行，儿童患病率死亡率那么高？心爱的沛予和千千万万不幸夭折的孩子一样，他们是无法抗拒那个时代给予他们的命运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除了说了一些动听的词句，实际上没有给报效国家的志士仁人提供任何帮助。诸福棠是一位最讲实际的科学家，美丽虚幻的文字遮不住他的眼睛，他对那个世道、那个政府失望了。

1946年底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的事件使诸福棠也对美国的军政人员产生了极坏的印象，认清了所谓"美国援助"的真象。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还不准学生们为此游行抗议呢？青年人爱国心强，对政治十分敏感，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对他们接二连三地残酷镇压，激起有力的反抗，罢课、游行、抗议示威，轰轰烈烈的学生抗暴爱国运动蓬勃兴起，一向埋头读书的北大医学院的学生们也奋起投入学生运动中了。遇到学生罢课，诸福棠就不到学校去了，这也是一种声援和支持。他赞同学生们

的正义行动，他对国民党已不抱希望。但是他对共产党还不了解，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缺乏深刻的认识。当北大医院的年轻大夫们积极配合学生运动举行“罢医”的时候，诸福棠激动了，他认为那是不应该的，国民党应该反对，但是治病救人是医生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能“罢医”呢！如果说这是脱离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当时他是难以接受无法理解的。他说不清楚在这场革命大风暴中，自己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他始终是爱国的，醉心于搞好事业也是为国为民效力；而这个国家被治理成如此模样，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做为一名炎黄子孙，脸上也无光啊！这个世道是需要变一变了。

他在观察，思考。

二、目击新的暴行

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然而，抗战胜利的喜悦在人们心头没驻留多久，冷酷的现实就给人们泼了一瓢冷水,那些在侵略者面前丢盔卸甲的逃跑“英雄”,却对老百姓们耀武扬威，大肆掠夺、镇压。

诸福棠家的私人房屋被“中央军”占用一部分,不肯退还；坐车出诊，不断遇到国民党军人拦截强行搭坐，你指着标有红十字的药箱解释，要求放行， 毫无作用“老子就是要坐坐小汽车！”连医院也遭到骚扰，国民党把一个打扫卫生的工友抓了壮丁。诸福棠以家长的心情关怀着那个年轻人的命运，大家也很着急，于是决定院方出面营救，托人情，花了钱才把人赎了回来。慈悲善良的专家教授医生护士们，怒火中烧，却只好忍气吞声。

在北大医学院，诸福棠看到了另一种景象：青年学生们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暴行，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先是反“甄审”斗争。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在疯狂掠夺人民胜利果实的同

时，竟宣布收复区内的公立大专院校为“伪大学”，所有毕业生和在校学生为“伪学生”，不承认他们的学历和学籍，规定在校学生须经过“甄审”考试；毕业生要进行二至三个月的集训，经过“甄审”，取得证明书后，各单位方得录用。他们声称要“甄审”，是为了“训立民族气节”。什么叫“民族气节”，究竟哪些人真正地丧失了民族气节！简直令人发指。这种倒行逆施是对沦陷区人民的莫大侮辱，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和激烈反抗。北大医学院除积极参加北京大学同学联合会组织的全市统一行动，游行罢课斗争之外，在院内还同反 动当局展开激烈斗争，在辩论会上学生们愤怒地说：“日本人一来，你们全跑了，把我们学生丢在沦陷区不管；现在又说我们是‘伪学生’，到底谁是‘伪’的……”经过长达8个月之久的艰苦斗争，反“甄审”取得了胜利。

1945年底，国民党屠杀昆明进步学生；1946年4月，北平国民党特务大闹中山公园音乐堂，殴打朝阳大学著名法学教授陈瑾昆；1947年“五·二〇”全国学生掀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斗争；1948年东北大部解放，国民党欺骗胁迫两万多东北学生来北平上学，学生们发现上当受骗后抗议请愿，7月5日发生国民党当局枪杀东北学生13人、打伤一百多人的血案……青年学生们怎能忍受如此残酷的压迫，反抗的浪潮风起云涌，势不可挡。1948年夏，国民党大势已去，面临崩溃的边缘，对学生的迫害更加残酷。8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日报》《华北日报》频频叫嚷要“取缔学匪”，“取缔职业学生”，接着进行大逮捕，8月19日清晨，各报发表消息：“特刑庭昨夜发出传票，传讯各校职业学生，十一院校共250人（第一批）……”，并列出名单，其中北大医学院有五人。

诸福棠闹不很清什么叫“职业学生”，不过他认为，那些“闹得凶”的都不会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她的大女儿美端当时已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做

父亲的担心女儿的安全，怕女儿遭到不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老话大概还有些影响，他总觉得学生应当好好读书，他认识不到这是革命同反革命的生死搏斗，更不知道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组织领导这场不断取得胜利的斗争。

后来，他不禁长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啊，我怎么没能早些认识你呢！

三、黑暗中的曙光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上崩瓦解，人民彻底胜利的形势日益明朗化。

国民党要员惊惶万状地收拾细软准备南逃；诸福棠的熟人朋友也有要走的，有些已动身离开北平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做着保护古都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的工作。北大医学院地下党支部按着上级党委的指示，采取了护校护院、保护和争取高级知识分子等一系列措施，大家严肃紧张地忙着，兴高采烈地喜迎解放。

诸福棠教授在科学事业上善于观察、思考、探索、创新。可是总觉得政治上的事不是自己的"正业"，非己之长；几十年来政治舞台上的腥风血雨和丑闻陋习，也着实让洁身自好的文人学者们有厌烦鄙弃之感，一般是采取"敬而远之"的超然态度的。事实是最好的教材，人们对国民党是不抱希望了；然而思想观念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旧传统意识的束缚和影响，因而对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难免一时辨不清，生出些模糊认识。

一天，诸福棠从抽屉里发现一份油印材料，后来又看到一本小册子，他认真看了，说得都合情合理，入脑入心，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介绍，纷乱之中，头脑里不断投入些引人清醒的光束。而眼前种种现象又扰得人心烦意乱，一些专家同行携眷南迁了，有人劝诸福棠尽快拿主意，拉他走。

诸福棠最后认为北平有多年经营的儿科事业，决定留下来。

这时，北大医学院毕业生江载芳已来儿童医院，实习后留下工作了。她和早两年来的胡亚美成了儿童医院新的骨干。在解放前夕一片混乱中，她俩显得十分清醒镇定，敢于同散布反动谣言的人面对面斗争，针锋相对地宣传共产党好。她们经常找三位老师谈心。一次，她们交给诸福棠两本小册子，说是“从门口拣的”。诸福棠倒锁上门，悄悄地仔细阅读，掩卷沉思，顿觉耳目一新，颇受启发。他读的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新工商业政策》，看来共产党能成大事，没想规划得那样周全，令人佩服。他领会两位得意门生的用心，暗自赞叹：这些年轻人不但书念得好，业务进步快，头脑还蛮敏锐呢！

吴瑞萍送一个同班同学离平去广东原籍，回来同诸福棠谈及自己的感想和决不依恋国民党的意志。诸福棠也决不相信社会上传播的骂共产党的恶毒谣言，心里逐步踏实下来。

抗战胜利后，美国的“煤油大王”所创办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派人前来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了协和的全部资产，决定恢复办校。谁都知道协和早年的毕业生诸福棠是卓有贡献的专家教授，有很高的声望，协和医学院聘请他为新董事会的董事，是十分自然的。1948年夏，诸福棠应邀去上海参加协和董事会，行前胡亚美悄悄塞给他一本书，一看是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相机抓空阅读，竟至兴趣盎然，爱不释手。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许多想法和书中论述极为合拍。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这位学贯中西，身上有不少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正直的科学家，从来就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并且在人格品德方面堪称典范。当然，当时他还无法和这本书的名称完全一致起来。

胡亚美、江载芳他们忙着组织各项护院迎解放的工作，劝三位老师携眷去协和暂避。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鍌一向以院为家，这是他们多年的心血结晶。门生弟子们如此英勇忘我，他们深为感动，决定留在院内和年轻人们并肩护院，不让敌特

破坏，还组织全院人人学习包扎急救技术，准备收容人民子弟兵的伤病员。有着团结友爱好传统的儿童医院就象黎明前夜空中一颗闪亮的星，全院几十名职工上上下下一条心一股劲，争相为护院迎解放多做贡献。

诸福棠觉得自己身边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给自己擦亮眼睛，指明方向。

第十三章　大转折

一、傅连暲来访

1949年的空前大变化，是诸福棠一生大转折的一年，一连串想不到的事情接踵而至，使他眼花缭乱，激情满怀。

这一年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了。1月31日下午，在锣鼓鞭炮声中，诸福棠同大家一起涌上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入城部队。那威武齐整的队列阵容，令人肃然起敬；战士们个个朴实憨厚，和蔼可亲，除了那一身布军装，看不出他们和普通工农百姓有什么两样。"兵"，多年来在人们心目中是个令人不安的不祥的字眼儿，诸福棠没想到共产党的军队秋毫无犯，纪律这样好。2月3日，正式举行了解放北平的入城仪式。装甲部队、坦克部队、炮兵、骑兵、步兵分别从永定门和西直门入城向前门进发，接受站在前门箭楼上的聂荣臻、叶剑英等将军们的检阅后，会合西出广安门。诸福棠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重型武器，想不到解放军这些装备尽是"运输大队长"和美国人送的"礼品"。

人们的心里沸腾了，压在心头的乌云被驱散，大家尽情说笑，欢庆解放。府前街儿童医院更是一片欢乐景象。诸福棠和吴、邓两位副院长受着他们的学生胡亚美、江载芳等人兴高采烈情绪的感染，心情都很振奋，不禁感慨万端。世道变了，大大地变了。但是一切又是那么熟悉、亲切、合乎心意。

人民子弟兵给诸福棠很好很深的印象。他看多了反动军队

逞凶欺人的嘴脸，没见过同人民群众如此水乳交融的好部队。不断有人民解放军带孩子来看病，他们是那样朴素平和，不摆架子，不搞特殊，而且都是一样的装束，分不出官兵。一天下午，诸福棠正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忙着， 有人来访。来人是一位瘦高个子，身着便装，笑容可掬，看样子比自己还大几岁。那人握住诸福棠的手，操着不太难懂的福建官话说："诸院长，你好！我是傅连暲……" 这名字早有耳闻，但只知道是搞医的，很早参加革命，是个领导干部。主人以清茶一杯敬客。客人环视一下这间 8 平方米的小屋说："你们医院办得很好，你的办公室却这么小。"接着赞扬儿童医院在险恶环境里和艰苦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早就听说你们医院很兴旺，果然人才济济，病人很多，事情很忙，就是地方太小了。"然后提起胎盘球蛋白的发明和《实用儿科学》在解放区所起的作用，一再向诸福棠表示敬意，又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希望继续努力，把医院办得更好。诸福棠引导客人参观了医院各部门，送走了客人，很长时间心绪宁静不下来。事后听说，傅连暲曾任延安中央医院院长，是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建国后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年已半百的诸福棠自然明白，这不是一般的访问，傅连暲也不是以个人身份，他是代表共产党、解放军来向自己致意的。想不到，一位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对自己了解得这样清楚，对儿童医疗保健事业这样关怀；旧社会几十年，有哪个官方人员肯"屈尊莅临"呢！

诸福棠半生孜孜矻矻，埋头苦干，不图"拜相封候"，只顾建功立业，早已声名赫赫。谁料，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亲自登门问候致敬，诸福棠无限感慨。解放了，时代不同了！

对这样一位正直清白卓有贡献的医学专家，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爱戴你的，崇敬你的。解放不久，出国留学的炎黄赤子陆续返回重见天日的祖国，他们都是学有专长、国家急需的难得人才。有几位久慕诸福棠的名声，主动要求到府前街儿童医

院效力，他们是新近从美、德、奥等国留学回来的黄景泉、鄢裕光、吴琼聪大夫。小小儿童医院实力更加雄厚了。这也是诸福棠所始料不及的，想不到，解放会带来这么多变化。

一天，方石珊见到诸福棠，笑呵呵地说："诸大夫呀，我那房租不要了！"诸福棠怔了一下，随即紧握老朋友的手摇着头说："使不得，使不得！"方石珊提高嗓门，坚持已见，情真意切，状极感人。诸福棠了解到儿童医院的房租分成两半，一半是方石珊自用，一半是由他的夫人取用的。现在，方老看见医院办的很好，愿意奉献自己那一半房租，表示维护之意。当时诸福棠不好再推辞，竖起大姆指连声赞道："豪侠之气！"此举确实令人起敬，事后分析：方老（后任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副会长，"文革"中逝世）主要是受解放后大好形势的激励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感召；同时也难忘解放初期他任中山公园理事办儿童保健检查会和托儿所时，诸福棠率领差不多全北京的儿科医生义务相助，为小儿查体保健的义举，使他对诸福棠的学识、人品很敬佩。

二、"党"在身边却不识

临近解放时，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已在京西某地成立，坚持多年艰苦斗争的地下党组织应该公开了。北大医学院的地下组织在群众中公开"亮相"时，诸福棠想不到自己喜爱的好学生李振平、孙燕华、颜纯和助教祝寿河都是共产党员。他立刻想到自己先后从北医挑选到儿童医院的"三小"胡亚美、江载芳、李同……

她们也都是共产党员！儿童医院地下党组织公开时，诸福棠激动地心跳着，眼里噙着泪水，同他的三个学生紧紧地握手，一时思绪翻腾，心中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一句来。万万想不到哇！眼前的现实和自己过去的想象太不一样了。后来他常对

人说:“想不到这些年自己一直在共产党员维护之中!”他暗自庆幸自己有这样的幸运。从身边这几个年轻人身上，诸福棠对共产党的认识又深了一层。他深切地感到，自己同共产党并不陌生，而且还是贴心人。

北京城在人民政权治理下，短期内面目就大有改观。叶剑英市长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约三个月内，共进行了防疫、环境卫生、医药救济、学校卫生等工作，特别是，91天中清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多年未清除的20多万吨垃圾，清除了市内粪便20多万斤(解放前，市区内有多处露天晒粪场)。老城市几百年的地下污水管道，严重失修，多处堵塞，清理下水道也摆上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日程。保健预防工作是诸福棠一向大力提倡的，共产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是预防为主。每逢传染病流行季节，人民政府便组织大批医务人员上街入户搞卫生防疫工作。诸福棠和同道们一起，高兴地穿起白大褂，深入街巷，亲自动手为儿童注射防疫针，宣传防病知识。这些当然都是免费的。诸福棠不由想起解放前，有的医生为人打一剂美国泊来品“白百破”(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预防针要收5美元的事情。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些顺民心、合己意的好事，诸福棠很高兴去做，他的想法和共产党的方针是一致的。

共产党言行一致，政策兑现。诸福棠看过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和工商业政策的小册子，他心里有底，对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他已经很自然地跟着共产党走了。同他相处多年的学生们最了解他，他不是只为赚钱的开业医，更不曾剥削他人，相反，他对职工多方关怀照顾;他办医院为了创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儿科事业;他苦心培养人才;他写书也不是为个人出名得利，他把稿费全部献给儿科学术单位了。这都是有口皆碑、被传为美谈的事实。不久，医院建立了工会组织，三位院长光荣地被吸收为工会会员，成了领导阶级的一员。

三个年轻党员紧紧依靠上级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使三位老师，三位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

三、新起点

1949年10月1日，划时代的一天。诸福棠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望着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聆听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心情无比激动。有五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华民族从此振兴有望。诸福棠见过清朝的黄龙旗，见过民国初期的五色旗，见过“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国旗，还有形形色色在华夏大地上飘扬过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旗子，没有哪个有五星红旗使他如此动心。天安门前曾经是自己参加反帝游行经过的地方，如今在这里欢庆祖国的新生，终生难忘这可纪念的一天。此后他每天在府前街儿童医院进进出出，每次都面向东方，深情地看几眼那面红艳艳的国旗，有史以来第一面人民共和国的旗帜。

儿童医院沉浸在新生的欢乐之中。解放后，所有公立医院都由人民政府接管了；府前街儿童医院性质不同，未予接管，但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和工会、共青团组织，全院政治生活十分活跃。党政工团领导人员仍是“三老带三小”，三位院长原职不动，江载芳任党支部书记，胡亚美为工会主席，李同是团支部书记。不过三位院长出于对党的拥护和敬重，师生往往易位，尤其在政治学习时，老师们“不耻下问”，诚恳地请三位年轻党员做辅导。这三老三小的学习会总是开得十分生动，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学习《社会发展史》，诸福棠结合进化论谈对猴子变人和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认识；三个学生同老师们一起学习了许多理论著作，掌握了许多革命道理。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

同盟条约》签定，这成了政治学习和讨论的重要内容。三位老师对苏联在旅大驻军与三位党员有不同看法，各执己见，争论得好热闹。老人们比年轻人对祖国多次遭受侵略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对之心有余悸，为了维护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利益，他们主张要有所警惕。争论难以收场，江载芳他们便去市委请来崔月犁同志，老崔同志娓娓道来，把道理讲得一清二楚；同时针对三位老院长的想法做出恰如其份的解答，并且赞扬了他们的爱国心。学习讨论会上，三位院长毫无拘束，觉得大有收获，又感到十分亲切。老崔同志多次应邀参加他们的学习会，至今大家还十分留恋那一段生活。

在诸福棠面前展现着一个新世界，他深感国家新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己多年向往而无法实现的新气象，也给自己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进入1951年，医院业务空前发展。当年春季一天，市人民政府卫生局长严镜清到医院来找诸福棠商量如何扩大儿童医院的问题，决定由政府先资助六万元，以应急需，这也是诸福棠没有想到的。他想起当年创业之艰难，只凭三个人微薄力量苦撑苦斗，官方从不置理，乃于初版《实用儿科学》序言中慨叹“政府无推行之决心，遂致疫病流行，死亡枕藉，其影响于家庭幸福社会经济者，曷可胜言!” 而今解放不久，正值百废待举，政府就这样重视儿童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他对自己事业的前途更加充满了信心。在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府前街儿童医院扩建了门诊部，又增加了20张病床；同时加强了科研和保健工作，把医院工作向深层发展了一步。

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很关心这家医院，对诸福棠也很了解，他还亲自来看过这拥挤的门诊部和医院设施。1951年秋一天，彭市长约请诸福棠一起商议建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儿童医院的事情。激动不已的诸福棠更加坚定了早已萌动的把府前街儿童医院交给国家的想法。他认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比自己还要重视祖国新一代的健康成长；而国家的力量比个人力量大

得多。他要用实际行动履行“公慈勤和”院训第一条的要求，大公无私地把医院交给人民。

吴瑞萍完成土改工作队的任务从四川返回北京，诸福棠和胡亚美亲赴前门火车站迎接，见面就迫不及待地把考虑多日的心思掏了出来:“咱们把医院交公吧！”吴瑞萍伸开两臂高兴地说:“我举双手赞成！”他从与同志们的通信中已经知道了彭真市长找诸院长商议建大医院的事。邓金鍌也完全同意交公。全院上下一条心，于是正式报告送到市里领导面前。彭真市长于1952年春节期间在家中宴请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鍌，表示欢迎他们要把医院交给国家的决定，赞赏几位专家一心为公的志向，但说先不急办，推迟一些时候再做研究，鼓励大家继续把原有的医院办好。

在诸吴邓三人的一再要求下，北京市人民政府准其所请，1952年6月1日儿童节，吴晗副市长代表政府来院接收，决定医院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儿童医院（东单三条原市立第三医院儿科已于1951年扩建为北京市第一儿童医院），医院领导人和体制等一概不变。诸福棠和同事们除保留3个人的住房，把医院所有资产，包括存款和公积金以及三辆小汽车等，全部交给了国家；三人还主动把每月700多元的工资降为300多元。彭真市长曾明确指示，三位老专家保留原工资，不准变动，但诸福棠特为到大学去了解同级教授的工资，利用院长职权命令会计造表降低了三人一半的工资额，造成了既成事实。他们的良好愿望和坚定决心是感人的。

敌伪时期于艰苦逆境中创建的北平私立儿童医院，真正获得了新生。

第十四章　市长的嘱托

一、共同设计未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受到重视，得到发展；为人民忘我奉献的科学家备受尊敬，诸福棠深深地感受到了。而更加具体强烈地显示出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是从建国后第二个月举行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始的。诸福棠作为医务界的代表，同工人、农民等各界人民代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里共商国家大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作为大会执行主席在开幕式上指出，这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行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市长、副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使这次会议成为全市最高的地方权力机关，从此北京市人民就直接管理自己的政权了。就在这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人民代表诸福棠庄严地举起右臂，郑重地行使了当家做主的权力。这是比镇压反革命、清除垃圾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的解放妇女的重大革命措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社会改革工作。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野蛮制度被打倒了。

当聂荣臻市长和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在大会上报告市政府执行《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的情况时，全场情绪激昂热烈，多次长时间的大鼓掌。那真是雷厉风行，迅即见效。《决议》于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通过，市公安局接到立即执行的命令，于5时半紧急出动干部和公安总队2400余

人，由民政局、市妇联等部门协助，分别到外城五个区及东郊西郊等地，将1268名妓女分别收容在临时设立的妇女生产教养院；同时对依靠剥削妓女为生，极端野蛮狠毒的老鸨、领家等454人分别集中审查，按罪行大小依法处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没收其财产，作为救济妓女之用。“战斗”彻夜进行，到第二天凌晨5时，胜利完成任务（见1949年11月《人民日报》有关报道）。

据报载，妇女生产教养院做了大量工作，给患梅毒、淋病的妓女治好病（95%以上患性病），教他们生产技能。之后，陆续安排部分人回原籍，有些结了婚；其余的介绍就业，有些还考取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院校。府前街儿童医院收容了两名解放了的姐妹，为他们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北京市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诸福棠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他对娼妓这种给后代造成无穷遗患的罪恶制度深恶痛绝，他忘不了旧社会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那些烂鼻子、烂屁股的先天性梅毒患儿；但是他无力割除这植根深远的毒瘤，只有在自己的著作里喟叹陈词，表达一个正直的科学家爱国爱民的心意。万万想不到，共产党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和坚定的决心，一夜之间就废除了这为害数千年的吃人的罪恶制度。他读了报纸上广大工人、大学生和市民“无限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这一“贤明措施”的报道，难怪有些被从火坑里解放出来的妓女坐汽车前往生产教养院的路上，含泪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诸福棠不像广大工农群众和贫苦市民，解放后首先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很大改善；他的变化是在思想感情上，通过他毕生从事的儿童医疗保健事业，他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

诸福棠认识市委书记彭真，也是从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始的，他二人不仅同为人民代表，诸福棠还是以彭真为主席的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委员。上一章提到的两人一起商议建一座大型儿童医院，那已不是初次见面了。那次交谈时，彭真提

出要开设一千张病床的儿童医院，诸福棠认为一下子搞那么大规模，实在不好管理，主张600张病床，市委书记尊重专家意见，同意诸福棠的主张。接着进入筹划阶段了。1951年秋高气爽的一天，彭真约诸福棠一起去选定新院地址，两人来到复兴门外护城河边一片菜田里。当时，复兴门外还是一片田野，很少建筑，彭真向西一指说:“再远一些可以选个更大的院址。”诸福棠说:“这里便好，离城近些，对孩子和家长们方便。”“用不了几年，这里就会变成繁华地区，交通会便利的。”彭真爽朗地笑着，他还是尊重了诸福棠的意见，把院址定下了。这位兼任市长的市委书记习惯地作着有力的手势，谈对新院的设想：整个建筑要科学地设计，要现代化的设施，建立先进的医疗制度，全心全意为祖国新一代服务。激动不已的诸福棠又受彭真市长的嘱托，全权负责新院的筹建工作，并且被破格地允许：建筑费用实报实销。

诸福棠无比振奋，抚今追昔，陷入了深沉的思考，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在旧时代，他经历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在所难免的曲折变化过程，如今换了人间，他觉得自己不仅是事业的主人，又是国家的主人。

二、蓝　图

在旧中国多年的梦想，解放不久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了。600张儿童病床，在哪里都是罕见的！自己曾进修过的著名的美国哈佛儿科所在地的波士顿儿童医院只有400张病床！而且这座大型的现代化儿童医院将依照自己的意志，按照自己的设想形成问世。海阔天高，诸福棠的学识才能在这块解放了的土地上将尽量施展。

建筑本身的设计，请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留学法国的华揽洪总工程师负责。一向虚怀若谷尊重他人的诸福棠同华揽洪合作

得很好，两位专家同心协力，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贡献着各自的聪明才智。为博采众长，诸福棠奔走于京津两地，参观访问了一些医院，吸取各院建筑和设施上的优点。他认为，医院建筑不能只作为艺术品给人以美的享受，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实用。他要求儿童医院大楼首先须体现“一切为了孩子”和“预防为主”的方针，强调应以方便患者和防止交叉感染为主。他吸取协和医院楼道阳光不足的教训，要求新院全部病房都要朝南；背阴部分作为配餐、治疗、浴室及处置室等用房。传染病房要安排得离开普通病房远一些。诸福棠随时同徐政闻、吴瑞萍、邓金鍌等几位老友商议，并走访北京第二传染病院的院长张兆统，听取他们对新院设计传染病房方面的意见；很多医务人员应诸院长之请出谋划策。诸福棠见多识广，在欧美参观过许多世界闻名的儿童医院，各国的独到之处也被他吸取过来了。他要求在每一个病房附近设计一个临床示教室，便于观察个别病儿，使见习医生和实习医生可以专心地坐着听讲，以免在病房里由于噪音较多，相互干扰。每个儿童病房都设有游戏室，使孩子得到心理安慰，忘掉病苦。

诸福棠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严细作风在这里体现得尤为充分，事无巨细，他总要前思后想，反复琢磨，一定要达到十分满意。他要求儿童病房墙壁、天花板涂成黄色，可以造成明快鲜亮的气氛，让孩子们情绪愉快；婴儿病房要绿色，这种颜色较暗，便于保护婴儿眼睛。他要求油漆工把各色油漆带来，同工人一起挑选，一样一样地试。华揽洪总工程师设计过不少著名建筑，学术造诣很深。他久慕诸福棠之名，内心十分敬佩。他总是虚心地按着这位儿科专家的意见做，对设计方案做了多次修改。后来，儿童医院的婴儿住院部由于具有中国特色，首次作为中国建筑的选择，列入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史》。

小儿外科的设置，是诸福棠多年的设想，过去没有条件，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为了设计好外科手术室，诸福棠特意去

找吴英恺和张金哲，向这两位外科专家请教，务求设计安排得尽善尽美。

那一阶段，诸福棠废寝忘食，不遗余力，累是累些，精神却格外愉快，从未有过的愉快。设计完毕，蓝图出来了，1952年秋，正式破土动工。全面负责筹建工作的诸福棠被任命为新建大型北京儿童医院的首任院长。

三、一座纪念碑

诸福棠是一位敬业精神极强的医学科学家，他百忙中仍不忘正在日新月异发展的府前街儿童医院的业务工作，他还随时记挂着凝聚他大量心血的《实用儿科学》的再版工作。这部著作早已脱销，欲购者日众，解放后从1950年1月到1954年3月，就将原版重印过四次，每次都做了一些修改补充，这些工作大部分是老教授挑灯夜战来完成的。

新院工程进展顺利，诸福棠常到工地去，见宏伟楼群逐步成形，不禁喜从心来。他还计划在医院南部一块空地上建一座小花园，植一片桃林，使整个环境更加美丽清幽。他身为“大总管”，又是一位经验丰富、事事认真的长者，建院中的大小事情，人们都愿意来问他。不过，这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开院后的人员配备、医疗设施和工作制度等重大问题。须未雨绸缪，要秣马厉兵，迎接更加振奋人心的“大战”啊！

具有远见卓识的诸福棠在解放前那样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就在考虑整个儿科事业的发展，他医、防、教、研一起抓，为未来培养人才，积累适合国情的实践经验。但面对即将落成的这座大型医院，诸福棠深感现有人员设施远远不敷应用，还须大力充实。除了原市立第一儿童医院和第二儿童医院全部人员作为班底以外，还要配置大批人员，尤其缺少各分科的骨干力量。诸福棠四处招兵买马，罗致人才，求贤若渴。他和耳鼻

喉科专家徐荫祥教授挂勾，请他支援技术力量。眼科、口腔科、细菌科、生化科、放射科、理疗科、病理科及药房均须安排人事，按期设置。诸福棠还延聘协和老同事，曾在欧美进修过的护理专家王懿任护理部主任。他为各个分科作规划，物色专科医生。

过去不分科时，12岁以下外科病儿死亡率很高，诸福棠早就为此绞尽脑汁，苦于无力解决这个难题；现在有条件了，他决心把新院的外科办成全国首屈一指的小儿新专业。他有充分信心。早在1950年他就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下紧紧抓住不放了。此人就是前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现任医院顾问的著名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教授。1950年，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外科住院总医师的张金哲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讨论加强妇幼医疗保健工作的问题，专家们都感到小儿外科无人搞是个大遗憾。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建议当时尚未固定专业的张金哲干小儿外科。张金哲在大会上有个发言，可以看出这个年轻医生对此做过些探讨。他指出：12岁以下的外科患儿几乎每三个就有一个丧命；新生儿皮下坏疽更是一个也活不成；幽门狭窄本不算什么大病，死的也很多……如果有从事小儿外科的专业医生，问题不会如此严重。在场的外科专家吴阶平很欣赏张金哲的发言，后来这个信息传到诸福棠耳朵里。诸福棠急不可待地找到张金哲。“你真想干小儿外科？”“想，外科病孩子死亡率太高，应该有人干！”诸福棠高兴地连声说：“大喜事，大喜事！”从此，两代“有志者”结为忘年交，时有来往。这次，诸福棠自然把张金哲列入新院主要骨干名单，几次请张金哲吃饭，让他看新院设计图，共商开设小儿外科大计。北医怎肯放走一个大有前途的好苗子，诸福棠同在协和时的同级好友胡传揆商量，请院长放人来负责新办的小儿外科；他又给北医附属医院院长、协和老同学吴朝仁写信，恳请支援。当时，北医尚无大办小儿外

科的条件，终于把张金哲请来儿童医院了。张金哲没有辜负老前辈一番苦心，肯钻研，有魄力，新设的小儿外科突飞猛进地发展，除普通外科外，还陆续把骨、泌尿、烧伤、肿瘤等专业都开展起来了。“文革”期间，靠边站的老院长还同当时的党委书记李仰岳紧催着把难度较大的婴幼儿心血管外科也建立起来了。这是个大成就，是国内的新生事物之一，在国际上也受到了重视。诸福棠由衷地感激上海新华医院小儿心血管外科主任丁文祥帮助培训了一大批人才，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在张金哲及其第一助手潘少川等领导下，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利用150张病床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培训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量青年医生，学成以后回到各地开展小儿外科事业。张金哲还多次应邀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会相应成立起来，张金哲任主任委员；1980年又创办了《中华小儿外科杂志》，请诸福棠题写刊名以资鼓励。这些都是后话，在这儿顺便提早叙述了。

张金哲教授最近对笔者说：“中国小儿外科的创立和发展，是从诸福棠教授开始的。我不仅深受诸老学术造诣和高度事业心的激励和鼓舞，他谦和诚挚善于团结人的高尚品德也使我深受教益。”

由于大型现代化儿童医院的吸引，尤其是诸福棠教授学识人品的感召，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人们愿意来这里工作。随着新院落成，一切都准备停当了，1955年“六一”儿童节，矗立在复兴门外南礼士路边的、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的北京儿童医院正式开幕了。彭真为新院剪了彩，康克清、傅连暲、崔月犁等许多领导人和中外著名人士出席了盛会。

第十五章　卓越先驱

一、“头等医院”的魅力

诸福棠半生的理想，解放后才得到党和人民充分的尊重、保护、鼓励和促进。

《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一书中，专有一部分介绍“北京儿童医院和儿科专家诸福棠，在发展中国儿科学方面是有独特成就的”，“他的事业的黄金时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儿童医院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医疗、保健、科研、教学等全面的儿科基地。”（作者注：诸福棠在审阅本书初稿时，在这里加了这样的话：“新办的上海新华儿童医院等单位已经赶上来，而且超过了我们！还是不要自满好”。）

解放几年来，诸福棠以空前的高度热情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儿童医疗保健事业上，他在八十岁以前一直亲自看门诊、查病房，主持和领导这座大型医院的各项工作，还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修订全国医生所应用的《实用儿科学》，撰写和审改科研论文，他关注着全国和全世界儿科事业的新成果。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出席有关会议，他总要情不自禁地介绍解放后祖国儿科医疗保健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1932年毕业于协和的著名儿科专家、上海儿童医院院长苏祖斐教授，在致北京儿童医院30周年院庆的贺词中说：“我国儿

科的卓越先驱在30年辛勤劳动中，提高了儿科保健和治疗水平"，这是同道对北京儿童医院和诸福棠教授如实的赞誉。大量生动的事实说明这座名扬海内外的儿童医院的发展壮大。过去儿童医院只有内科，新建北京儿童医院内、外、中医、传染、五官和基础科室俱全；后来，规模、科别不断发展，又分设了呼吸、心脏、血液、肾脏、内分泌、神经、结核、新生儿急救、肿瘤、烧伤、骨科、泌尿与心血管外科等专业组；床位增至750张，门诊量日平均达到4000左右人次。由于海内外热心儿童工作者的大力捐助，设备也逐步增加，有了不少现代化的诊疗仪器。此外，医院附设的北京儿科研究所也不断做出新成绩。目前儿科研究所以免疫为研究的重点项目，已分设基础免疫、临床免疫、遗传免疫及呼吸道免疫与营养等研究室，另外还有微生物和同位素研究单位。儿童保健所正在研究儿童智力测验，并且大力培训干部，担负起全北京市城乡儿童保健工作的领导。北京儿童医院自1958年起还承担了首都医学院（前称北京第二医学院）的教学实习任务，胡亚美任该校儿科系的系主任。医院有自己的护士学校，每年招新生五十名。

医院的发展倾注着诸福棠的心血，医院的成就也是他一贯思想作风的体现。他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团结了大批有志之士，全院人员同心协力，积极舒畅。新院的人事安排充分考虑了原市立一、二两个儿童医院的班底，诸福棠主张由原一院院长徐政闻担任新院第一副院长，吴瑞萍、邓金鍌完全同意，愉快地团结合作，相互尊重，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诸福棠一向重视祖国医学，在对中医学术素有研究的徐政闻的协助下，把号称"小儿王"的老中医王鹏飞和金厚如、刘韵远、任守中等著名中医及针灸大夫请到医院工作。他常说："在执行疾病防治和教学科研任务中，我们体会到做医疗工作不可忘记预防，搞城市工作不可忘记农村，掌握现代医学不可忽视祖国医学，改进技术工作不可忽视医学道德。"儿童医院传统的

“公慈勤和”院训，如今又高悬在医院庭园显著处，把大公无私、友爱、勤奋、团结的精神进一步发扬。

现在人们都把自己的“独苗”看成是一流后生，孩子生病就要找“头等医院”，哪怕是一般的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大老远也要挤到复兴门外北京儿童医院来求诊。这里一直超负荷地运转，每日门诊量往往超过4000人次。这是诸福棠的名声和全院医务工作者忘我劳动和出色奉献产生的魅力在吸引着人们。曾任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的郭玉莲说：“如果没有老院长，咱们医院得矮一大截儿。”

二、随新中国一道成长

北京儿童医院在医疗、预防、教学、科研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的新成果。全体医务人员以攻克危害小儿健康的多发病为目标，积极开展工作，1958年与北京友谊医院小儿科、协和医学院病理生理科、东单三条儿童医院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等单位进行大协作，对中毒性痢疾、中毒性消化不良、腺病毒肺炎、麻疹后肺炎等常见病多发病进行研究，在短短两年内，采用冬眠疗法及消除微血管痉挛药物将中毒性痢疾的病死率从30%左右降到5%以下。1962—1964年深入研究病原学和水、电解质紊乱的规律，不断改进液体疗法，使中毒性消化不良的病死率由20%降到1%以下。1958年北京流行腺病毒肺炎，经过改进医疗，病死率由26%下降到10%左右。这几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市委的表扬和奖励。抢救中毒性痢疾小组还参加了全国文教卫生先进代表大会。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科常见病方面，首先开展了对乙型脑炎的辨证施治，加强临床观察，总结老中医的经验，降低了病死率，并为以后治疗其他病毒性脑炎打下了基础。在继承“小儿王”等老中医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对肺脓肿进行疗效研究，

提高了治愈率。

小儿外科的建立，挽救了大批患儿的生命，还提高了急性出血性坏死性小肠炎的疗效；降低了粘连性肠梗阻的发病率；经过加强急症和病房管理，使伤口感染率降到0.07%的最低水平。外科医务人员还不断创新，先后改进了胆道空肠“Y型”吻合防反流矩型瓣成型、带血管蒂腓骨移植、尾路肛门成型、小儿副舟骨手术以及小儿脊柱侧弯固定等手术方法，分别得到市科委的科技成果奖。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新时代，北京儿童医院也勃发了新的生机，各项工作频传捷报。胡亚美教授领导的对小儿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综合化疗，自1977年以来共进行201例，近期缓解率为95.6%，其中坚持治疗的167例，4年缓解率为50%，达到了国际水平。颜纯领导的内分泌专业组治疗糖尿病儿童百余人，与家长合作进行，成绩良好。历年来办理病儿夏令营，提倡他们的体智教育，得到普遍的赞扬。内科、急救中心、耳鼻喉科通过对呼吸衰竭的抢救，开展了乳酸酸中毒、血气分析和肺功能的研究，并总结了小儿机械通气的呼吸道管理的治疗和护理要点，使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的病死率进一步从19%降至2%以下。随着诊断技术的提高，先后在国内首次报告海蓝组织细胞增生症、遗传性口形细胞增多症以及肥胖通气不良综合症。江载芳领导的儿科研究所各研究室也屡有新成果，特别在遗传免疫方面，效果卓著。遗传免疫研究又称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的研究，在人类白细胞抗原和疾病相关的问题中，骨髓移植配型，亲子鉴定，民族白细胞抗原调查等项目，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成了我国参加1987年国际第十届HLA工作会议时唯一的进行脱氧核糖核酸（DNA）研究工作的实验室。

北京儿童医院不负“我国儿科卓越先驱”的美名；大量事

实证明它确实是全国儿科的先导。从它的苗壮成长，可以感受到人民共和国前进的脚步声。60年代初，营养不良还是小儿内科的重要病种；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渐趋少见；至80年代初，营养不良不仅已绝无仅有，相反，营养过剩——小儿单纯肥胖病，已成为儿科医生经常遇到而必须加以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老一辈专家善于结合临床做研究工作的精神，感染着全院医务人员。自新院开幕以来，全院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各种学术论文近400篇。1979年以来，先后有30多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和北京市各种奖励。这里有老教授们的作品，更多的是中青年后起之秀的成果。

这不是功劳簿。如果一一列举北京儿童医院几十年来的各种贡献，那将是厚厚的一本专著。人们很自然地把北京儿童医院同诸福棠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但是，诸福棠的心胸和视野远远超出这座大型儿童医院，他希望下一代人的体质、智慧、品德和创造力远远胜过先辈。

三、星火燎原

北京儿童医院是诸福棠的心血结晶。为了治疗病儿的便利，也为了团结群众的需要，他说服老伴于1955年夏天迁到儿童医院一座普普通通的职工宿舍里，一住几十年未再迁居。

诸福棠着眼于全国儿科事业的发展，不愿“独善其身”，他盼望着儿童医疗保健机构遍地开花。1958年，北京市决定建立西城区、崇文区等区级儿童医院，并扩大东单三条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积极支持，派出医务人员分别前往筹备建院或扩建，成为各院的领导和骨干。这在当时叫做“下蛋”。北京儿童医院真是一只优良品种的多产的“老母鸡”。诸福棠把用协和毕业时得的“文海”奖金买的一架德国名牌高倍显微镜，赠送给西城区儿童医院。此后，北京儿童医院日益显示其医疗指导中

心的作用，不断对各区级儿童医院进行帮助，从人员培训到请求会诊，一向来者不拒。

诸福棠是人民中国最早一批科学院学部委员之一；50年代就被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多年主持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学术活动和儿科杂志的编辑任务。他又是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副主席。这些职务更便于他立足北京，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培养人才，是他的奋斗目标之一，他考虑儿科事业的长远发展，努力做好北京医学院儿科主任，后来着重抓好儿童医院作为首都医学院教学医院的工作。30多年来，他们培养的医学生和进修生遍布全国各地，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边远地区，这些新秀大多已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力量。兼任首都医学院儿科系主任的胡亚美教授，深得老师真传，在教学上也积累了不少好经验，深受学生的爱戴。

诸福棠高兴地接受卫生部交给的任务，每年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科进修医生，已有1500多人满载而归。北京儿童医院不以“老大”自居，在培训进修医生的同时，教学相长，相互切磋，交流经验。有不少地方性疾病的诊疗经验是由进修医生提供的。近年来，北京儿童医院除了派人出国进修，还选派中青年医生到各地医院去学习专业，交流经验。

解放前，全国只有三家小型儿童医院。目前全国已有34所正规的儿童医院。各院新建开幕时，都给北京儿童医院发来请柬，特别邀请诸福棠参加。他去了，人家由衷地感到光荣，倍受鼓舞。早年他总要满心喜悦地前往祝贺，激动地致贺词；进入耄耋之年，行动不便，就由吴瑞萍、胡亚美等代他出席。诸福棠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各地儿童医院建成开幕的年份；在医院外宾接待室里挂的全国大地图上标着许多小红灯，成了全国儿童医院分布图。国内外有人来访问北京儿童医院时，他总要亲自招待，热心地指点着小红灯在逐年增加。他亲切地关怀着各兄弟单位的成长发展。他本人历年获得的各种荣誉奖状以

及各地赠送的纪念礼品，他不往自己帐上记，一般都放在医院办公室，作为全院人员协力同心取得的成果。

除了身边许多得意门生，诸福棠桃李遍寰宇，国内外数不清。更有众多未曾谋面的学生，那都是《实用儿科学》的虔诚读者。

第十六章 奉 献

一、 四位“母亲”

无论在社会交往，或是家庭生活中，诸福棠处事为人和干事业做学问一样，都是正直朴实，宽厚诚恳，热情无私。在他身上，既有西方文化之精萃，又有古老文明的传统美德，他是把中西道德的优秀成分融汇一身的“混合体”。

解放初，他夫人朱定一常不无自豪地对人说：“我有四位母亲。”是的，除了老伴和他的亲生老母以外，另两位“母亲”都在北京，住在他家，由他们侍奉赡养。一位是诸福棠的独身姑母诸希贤，由他们供养终身已志前文；还有一位是诸福棠同事的母亲，同事赴美任教，老人没有和儿子一起离开祖国，诸福棠主动承担了做儿子的责任。哪位同事开始还写信并寄钱来，后来中美关系中断，音讯全无了。但老人在诸福棠家享尽晚年的幸福，直至辞别人世。朱定一和丈夫一样孝敬老人，对两位老人关怀照顾，体贴入微，赛过亲生儿女。类似这种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事，在这个家庭里不足为奇，孩子们司空见惯，潜移默化地从中受到启发教育。长女美端有更多的记忆，下面摘录一些诸美端的谈话：

“我和妹妹在中学时，爸爸对我们说：‘我供你们念大学，你们将来不要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遗产或可依赖的东西’。爸爸叫妈妈把家里取暖用的立式电炉借给儿童医院，妈妈同意了，以后一直用了很长时间。爸爸年轻时外面西装笔挺，里面衬衫

是打补丁的。妈妈很节约，又要面子，要适应爸爸的社会地位。别人送的沙利文饼干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吃，留着再送别人。妈妈讲，有一次她对爸爸说：'梅兰芳快老了，陪我去看一次梅兰芳的戏吧！'爸爸就陪妈妈去看戏，散戏后找不到人力车了，只好步行回家。爸爸在路上说：这个京戏是很好的，可惜时间太长，有点影响我为明天的备课。家里好米不多，留给他一个人吃，他不肯，非要和大家吃一样的。他爱吃海鲜，有时买些大虾米，他又抱怨说太贵，不让买……"

在家庭这个小细胞里的表现，正是他在社会这个广阔领域里佳言懿行的"原型"。老协和的同学、师友对诸福棠的评价是"一贯的正人君子"，这是由衷的敬重爱戴之词。在旧社会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氛围中，诸福棠反复倡导"多用公心，少发私念"，从少年时起就做出许多助人为乐的好事。他利用中学暑期为本乡儿童补习功课，他为小儿童医院制定"公慈勤和"的院训，为穷人家的孩子免费施诊，他继承"乐善好施"的古训，他和"芸芸众生"有着血肉相连的情感。

高尚的医德源于高尚的人品。哈佛医学院的波士顿儿童医院同道给诸福棠的临别赠言中提到"诸大夫不但是一个好医生，又是一位人格完善的人"，体现了美国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崇和赞扬，诸福棠深感欣慰，不仅因为个人得到了荣誉。

爱因斯坦高度赞扬居里夫人：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摘自爱因斯坦《悼念玛丽·居里》）

诸福棠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其高度不亚于他在事业上对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

二、找到归宿

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诸福棠的理想和愿望一一实现。新旧中国如此截然不同，这对在旧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诸福棠来说，感受尤为深刻。他从根本上对共产党有了明确的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不仅从理论上认识了这个客观真理。诸福棠从人民共和国的巨变中得出结论：发展我国的儿科事业，建设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已被历史上多次的惨痛教训和大量的现实所证明。

诸福棠每天心情舒畅，热情积极地忙着各项工作，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和自豪感，展望未来又是霞光万道，充满光明。在共产党领导下，他的工作贡献受到高度尊崇，人生价值得以充分体现。自己的思想由信仰进化论升华到更高层次，他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把个人力量溶进那个巨大的洪流中去。因为自己的愿望理想和共产党的主张是那样合拍，这个想法就是顺理成章极为自然的了。

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开幕不久，诸福棠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一不拜佛门，二不信上帝，在旧社会对政党“敬而远之”的这位著名专家要求当一名共产党员。党组织认真考虑他的请求，从各方面进行考察，帮助他学习理论，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本来就具有一定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的诸福棠具备了条件。按规定，三级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由市委讨论，并由市委有关负责人亲自谈话。同一级教授诸福棠谈话的任务交给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佘涤清。老佘解放前是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对诸福棠有所了解，钦佩这位正直的科学家。谈话中佘涤清问诸福棠为什么要求参加共产党和思想认识转变过程，诸福棠一一做了回答。佘涤清问：“解放前您对共产党是什么看

法？” 诸福棠毫不迟疑地答道：“那时候认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差不多，都不是认真读书的好学生。”佘涤清认为诸福棠动机纯正，话也实在，至今记得他那种忠实诚恳的科学态度。1956年4月，诸福棠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解放后入党较早的科学家之一。

1956年5月31日的《北京日报》上，有诸福棠写的一篇文章《珍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说：“我曾经有过美好的理想：开办一个大型的儿童医院，培养更多的儿科医护人员和不断充实自己主编的《实用儿科学》。但是在旧社会里虽然我曾经努力和种种困难搏斗，事业的成就却是有限的。解放以前我和同事们合资努力，只开办了一个能容纳50张病床的小医院。当时感到，理想和事业今生都难以实现”。接着他谈了受彭真市长委托筹建大型儿童医院的过程。他说：“我多年的理想在今天终于实现了……我渐渐由实践中认识了党。我真感到党的事业是十分伟大的，党已经为国家经济建设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党又给科学事业开辟了广阔发展的道路。党比我看得深的多，远的多。党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我下定决心永远跟着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了解到，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是无比重大的，我一定要珍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为了祖国第二代的健康，为了党的伟大事业，贡献出自己微小的力量。”

三、高峰总在前

诸福棠毕生为之献身的儿科事业，包容在共产党的伟大事业中了，他也成了这支先锋队的一员，他的理想和奋斗目标随之延伸为解放全人类。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除了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儿科医疗保健事业上。加入共产党是人生一大转折，这付催化剂调动起火一

般的热情和空前的积极性。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先进制度，给自己铺设了一条广阔的坦途，你那学识才能、"百般武艺"，尽管施展就是了。

诸福棠入党那年57岁，事业上实现了多年的宿愿，又获得了更加宝贵的政治生命，他由衷地感到欢乐和幸福，他要从这个新的里程碑起步谱写历史新的篇章。一向信奉进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一直在探索追求的诸福棠，他的创造生活已不仅出现两个高峰，他坚信科学无止境，高峰无尽头。

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之一是"预防为主"，这正是诸福棠的一贯主张，如今，天时、地利、人和，万事具备，正是努力加强儿童预防保健工作的好时机。1958年他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发表了《全面推动地段保健是做好儿科工作的重要关键》一文，极力主张防患于未然，让孩子们散居的街道地段也担负起家庭宣教、防疫注射等预防保健工作，尽量减少儿童的发病率。这种做法开始实现了，而且一直在继续下去。这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实地普遍地办到的。1959年他发表了《建国十年来儿童保健事业的成就》的文章，介绍预防工作取得的可喜进展。到了晚年，他仍反复强调预防工作的重要性。在1985年《实用儿科学》新版的序言中，诸福棠主张："确认预防小儿疾病是个非常广泛大有可为的领域，必须总结经验，努力钻研，争取成果。"在1988年出版的《基础儿科学》的绪论中，他又着重指出："当今，预防儿科学的广度和深度与以往大不相同……对象涉及各年龄组小儿。具体预防措施包括：①增强体质的一般卫生措施和锻炼方法；②及时供应适当的营养要素，以预防营养缺乏病和地方病；③增强个体的特异性免疫，以防止传染病的侵袭和传播；④加强心理卫生，预防行为异常和精神疾病；⑤预防意外事故及药物中毒；⑥胎儿期可以诊断的畸形及其他先天性疾病应施行流产或其他预防措施，并对家长给予遗传咨询；⑦对遗传性代谢缺陷进行早期筛查及适当处理；⑧对已经

发生的疾病及早确诊和积极治疗，以免转成重症或发生后遗症。——还应协助促进儿童教育，培养小儿的高尚人格，强调社会公德，为提高下一代的质量而努力。"

科学家的眼睛随时盯着全球科技事业的新进展。诸福棠没有在成绩面前停步，他的理想和信念促使他奋勇前进，不断夺取新胜利。60年代初期，麻疹减毒活疫苗在国际上迅速发展。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也在进行疫苗制造、临床应用和流行病学观察。作为免疫学先驱，早有胎盘球蛋白被动免疫发明的诸福棠，参加并组织领导这项工作，与北京、上海、长春的病毒、生物制品和儿童保健工作者一起，团结协作，用我国自制的疫苗，到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进行接种，并观察临床反应、免疫作用和流行病学的效果，最后取得成功。1964年，诸福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代表七个研究单位作了题为《麻疹人工自动免疫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受到中外科学家的一致赞扬。这项成果在北京城区推广，为儿童广泛注射麻疹疫苗，控制了历年频繁发生的麻疹大流行。

这又是一次造福儿童的科研成果。但尚未在广大农村大规模推广。1965年秋，诸福棠带头下放农村参加医疗队，在顺义县张喜庄公社工作了三个月。看到农村还不富裕的生活条件和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他心情沉重，以一个革命者的政治责任感，不顾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尽心竭力为改变农村卫生工作面貌贡献力量。他日夜出诊，随请随到。有一天午夜时分，已经睡下的诸福棠被唤醒，立即随来人到远处一农家去诊视一个严重麻疹肺炎患儿，他悉心治疗，守护了一个半小时，病儿终于脱险；他还负责追踪观察，直到病儿痊愈。麻疹一般盛行于春季，一到五六月就是尾声了。当时正值秋季8月，诸福棠发现那里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还在出麻疹，可见疫势不轻，这是极为反常的，说明农村居住不象城市那样集中，所以蔓延比较迟缓，流行期较长。诸福棠立刻采取行动，为周围的接触易感儿

肌肉注射胎盘球蛋白，保护他们免受麻疹感染；进一步建议顺义县卫生局开设专业讲习班，诸福棠亲自讲解已研究成功的麻疹减毒活疫苗在城区推广取得的效果，教给大家如何组织群众，集中易感儿进行接种。他请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把疫苗装在日常用的大口冰壶里，送到张喜庄公社医院，于当年初冬把全公社的大批易感婴幼儿集中起来一一作了注射。到了第二年春天，此地已不见麻疹流行，这是空前的。全北京市农村闻风而动，纷纷为易感儿注射疫苗，做麻疹自动免疫。从此，北京全市儿童不再遭受麻疹流行之苦。这个宝贵经验在全国农村推广后，婴幼儿的麻疹病死率大为减少，麻疹不再成为危害小儿的大患。往年各地医院为应付麻疹流行及麻疹肺炎的医疗工作都要忙上半年的被动局面扭转了。

诸福棠带动儿科医务工作者更上一层楼，登上了又一个高峰。

第十七章 园 丁

一、理智的园丁

诸福棠出于对革命理论的逐步深入了解和对共产党的由衷信任，对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积极参加，并始终保持着一个科学家实事求事的科学态度，既满怀高度的政治热情，又不失理智的冷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中曾经引起巨大的震动产生深刻的影响，诸福棠在北大医学院接受了这次难得的锻炼机会。他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不夸大不缩小，不为过关而违心地给自己扣大帽子，基本上是平心静气地对自己前半生的思想做了个总结，开始为自己谱写历史新篇章。解放之初，人们热情高涨，在政治运动中难免出现一些激烈场面，有些人不了解过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真象，言词过激也是有的，诸福棠不气不恼，泰然处之。风风雨雨，甚至疾风暴雨，不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破旧立新，提高思想吗！

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一场更大的“风暴”，知识分子们都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接受了考验，诸福棠又有了新的思想收获。在扩大化的消极影响之下，他没有随风跑，凭他的品德和一贯的思想作风，他不会给人施加诬蔑不实之词。

“大跃进”，曾经使人们的头脑热过了头，那个巨大的洪流无处不在。诸福棠借在儿童医院掀起的那股“放卫星”热浪，把人们的政治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鼓励全北京市的儿科

工作者日夜奋斗，取得了提高中毒性痢疾等小儿疾病治愈率的积极成果。对“小麦亩产万斤”，以及种种显然不切实际的夸大口号，他不敢苟同，因为那是不科学的。科学家的确是老实人。诸福棠坚信“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他也坚信要实现更高的目标到达胜利的彼岸，不付出艰苦的努力、做出必要的牺牲是办不到的。事业，胜过生命，他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去探索、追求、创新。

诸福棠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又是培育新一代专家学者的辛勤“园丁”。解放不久他就一一做部署，给他的得意门生指方向、定目标，他要胡亚美钻研小儿血液病，要左启华主攻小儿神经病学，要江载芳研究小儿结核和呼吸系统疾病，要李同研究儿童保健，要颜纯进攻小儿内分泌学，要梁翊常深究小儿心血管疾病，要邬裕光研究小儿传染病学，要张金哲、潘少川和黄澄如等分别深究小儿外科各专业，再后来还有樊寻梅专攻小儿急救……他还竭尽全力，与全国各地的儿科专家作多方面的联系，以期群策群力，推动儿童保健事业。

二、硕果累累

诸福棠对创建和发展我国现代儿科事业，煞费苦心，人们称他是小儿科的先驱、权威、泰斗、“中国儿科之父”。但他始终认为，个人力量有限，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事业前程无量，自己开了个头，算是跑完了第一棒，这接力赛必然要靠后生晚辈们一代一代地继续跑下去，由他们去追赶飞速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诸福棠早就重视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从在协和、北医当教授，到在医疗科研实践中发现和培养好苗子，他都无私地传授知识，诲人不倦。他对身边的门生高徒有计划地安排是有深谋远虑的，几十年后看出

效果来了。

胡亚美是诸福棠、吴瑞萍最早从北医选来的好学生，如今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正式接老师的班，成为北京儿童医院第二任院长。前不久她又被选为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胡亚美早年成功地主持了中毒性消化不良、婴幼儿肺炎、营养性贫血等研究工作，1977年又着手进行儿童白血病的研究，已找到了缓解这种病的途径，取得理想的效果，对小儿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治疗已走在全国前列，达到了当今国际水平。她兼任首都医学院儿科系主任，诸福棠夸奖她教书有特长。胡亚美教授有较高的学识和技术水平，直接得益于老师的谆谆教导，诸福棠的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学生们。胡亚美把病儿当亲人，常把自己的血输给病儿；多次慷慨解囊，为手头拮据的家长交纳医疗费、住院费。她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是个先锋模范作用突出的优秀共产党员。胡亚美对老师有很深的感情，常念培育之恩。她深情地说："诸福棠老师对我们就象老爸爸一样，他手把手地教我儿科知识，还鼓励和指导我写论文，扶植我一步步成长起来。"最近，胡亚美接连地访问日、美、苏、法、瑞典、加拿大、泰国、新加坡、西德、丹麦等国家，为儿科事业奔走忙碌。

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左启华回忆当年在诸福棠门下为徒，感受极深，她说："一生能有几位好老师是很幸福的。诸院长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各方面都很完美的科学家。我毕生都要学习他的治学精神、科学态度、远见卓识和待人以诚的优秀品德。"左启华按照老师的指示，专攻小儿神经病学，艰苦努力几十年，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成了我国小儿神经病学科的知名专家，通过她已培养出第三代、第四代优秀学生。1981年，左启华的心血结晶、22万字的《小儿科神经系统疾病》一书出版了，这是全国第一本这个专业的教科书。诸福棠高兴地为学生的呕心力

作写了序言，给予左启华诸多鼓励之词。左启华说："这是诸院长精神支持的产品。"她想起1964年老师出差去广州，为一位国际友人的孩子会诊，把她带去了。那孩子患的是神经系统疾病，诸福棠让学生多做，尽量听取她的建议，给左启华实际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左启华早年写的《婴儿痉挛症14例报告》的文章，是诸福棠及时推荐刊登在《儿科杂志》上的。左启华认为，有远见的人才能有上进心。她至今仍然按照老师的精神和原则去做，不断地追求、探索、创新，不满足已取得的成果。对晚辈新秀的工作成就，诸福棠总是热情赞扬，积极支持，四川廖清奎等所著《小儿营养学》、上海金汉珍等所著《实用新生儿学》，他都答应作者之请写作前言，热心介绍。

诸福棠曾先后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所长及北京儿科研究所所长，1982年他把北京儿科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放心地交给江载芳了。这也是他顶喜爱的一个优秀人才。江载芳儿童时代是诸福棠的病人，长大是诸福棠的学生，如今成了老师的接班人。她在临近解放时到府前街儿童医院实习，1949年7月从北医毕业，正式到儿童医院当大夫。她学着老师的榜样，热爱儿童，工作精益求精，她也曾多次给病儿献血，是个上过几家报纸的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954年江载芳赴苏联留学，按照老师的部署，专攻小儿结核和呼吸系统疾病，1959年回国后被结核病研究所要去工作几年，再返儿童医院。她发表学术论文，主编全国小儿结核病通讯，从而使小儿结核病成为独立专业。现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她坚持业余义务教医学英语10余年，还培训美国送来的医学生，在中青年医师中有很高的威信。诸福棠说："我赞成江载芳的培养人才"。近年来，江载芳先后到美国、日本、菲律宾、意大利、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西德、法国、瑞士与丹麦等国进行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不断送中、青年出国进修，使我国的儿科事业在高度深度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诸福棠在协和任教时的学生许汉光是美籍退休教授、著名小儿科专家，曾在新兴的休斯敦主管儿童结核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卓越成绩，在美国各地及瑞典发表论文，誉满中外。为报答老师恩情，许汉光给了北京儿童医院一笔赠款，诸福棠决定作为派人赴美进修用费，1980年首先派出江载芳。江载芳已是学者、教授，在美国没有固定学哪个专业，只是按照诸院长的意见，着重看看美国对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情况，全面考察一下美国医、防、教、研各方面的情况，掌握新信息。一年后准备回国，一位美国教授挽留她再待一年，费用由他们负责。这本来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但她考虑应派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出国进修；同时自己在国内还有带研究生的任务，便婉言谢绝，按时回国了。为了多培养青年医师，充分利用美方给予她延长一年的工作资助，经过她努力争取，征得休斯敦贝勒医学院儿科主任同意，把这一学习机会让给了她的一个年轻助手，去学习了一年半。从此架起了一座“北京——休斯敦”之间的桥梁，至今已有六位医师从休斯敦进修学习回来。

江载芳在北京儿科研究所建起呼吸道疾病、临床免疫、生理免疫、遗传免疫、营养、变态反应、结缔组织病、病毒以及微生物免疫共八个研究室，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开展多种创造性工作，使北京儿科研究所声名日隆。

江载芳把诸福棠尊为“有远见的忠厚长者”，认为老师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是为年轻一代搭桥铺路无私育人的高尚风格，和思想常新，不甘落后，不停地探索新事物的可贵精神。

府前街儿童医院时期的“三小”之一李同，五十年代末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调出儿童医院近20年。“四人帮”垮台，新时代开始，李同又回到诸福棠身边，先是帮助老师修订《实用儿科学》，准备第四次再版。书成后在江载芳的倡议和老院长的关怀下，到北京儿科研究所任营养研究室主任，重新开始履行老师三十年前交给的任务。在国外，儿童营养学

是个热门学科，老院长经常把儿童营养的新的国外信息与书籍送给李同，支持，鼓励她的工作。李同不怕起步晚，苦心钻研，培养人才攻难关，花甲之年出成果，为预防佝偻病、维生素A缺乏与维生素A D过量，研制成了维生素A D强化牛奶，临床效果很好，通过专家和有关部门鉴定，获市科委科学进步奖，已在北京市并即将在全国推广，得到前辈、同行和社会上的好评。

万紫千红才是春。在中国现代儿科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征程中，众多后起新秀把老一辈交给的接力棒又传给了下一代；诸福棠的思想品德也随着一代代传下去，哺育着一批又一批新秀。

三、泽被后学

胡亚美当了七年院长，她继承老院长的思想作风和高尚医德，发挥业务专长，把医院各项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年龄过限了，胡亚美几次提出交班，1989年初才批下来。专长小儿急救并作出突出贡献的樊寻梅接过接力棒，当了北京儿童医院第三任院长。

52岁的樊寻梅1959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就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做为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鍌的隔代学生，一直在老前辈们的亲切关怀教导下工作，进步很快。诸老院长对她时有帮助。1977年她奉派参加赴上沃尔特医疗队，行前老院长请她到家便饭，亲切交谈。诸福棠对樊寻梅说："到非洲看看人家是什么样子，就知道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了。中国也还是个穷国。"樊寻梅至今牢记着老院长这样的话："要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1981年，樊寻梅考取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去法国进修急救学，老院长又为她送行，请樊寻梅到家里恳谈，希望她"到国外要多交朋友多联系，认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老院长说的都是中肯的经验之谈，为后生晚辈指明方向，激励新一代迅速成长。1983年初，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急救中心，樊寻梅主持其事，尽施所能，成绩卓著。这个急救中心不仅成了儿童医院的重点科室，连年获奖得“先进”，还应卫生部的委托，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一批急救专业人员。北京儿童医院急救中心初创时只有三张病床，逐步发展到二十多张，积极抢救危重病儿，开展新技术，努力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有力地推动了儿科急救事业的发展。樊寻梅先后荣获卫生部先进个人、市卫生局先进党员、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她忘不了80多岁的老院长对自己和急救事业的教导和关怀。诸福棠几次亲自到急救病房，问还需要什么帮助，夸奖医护人员工作出色，鼓励大家探索创新，不断前进。离开时总要交待一句：“有事可以找我。”老院长想得周到，事事关心，不断给后继新秀们以具体指导。他经常给樊寻梅写信，介绍有关急救的学术论著，提供新信息。近在咫尺还要鸿雁传书，不过不用贴邮票，把信放在医院传达室就行了。这是老院长离开一线后，同后生晚辈们经常联系的惯用方式。樊寻梅有时去看望问候老院长，更多的是写信或电话联系，怕影响老人休息。

领导北京儿童医院这样一个名扬中外、影响巨大的单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北京市卫生局在物色新院长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多方考察，民意测验，层层筛选，最后确定由樊寻梅领头“组阁”，胡亚美欣慰地交了班。老院长象自己交班那次一样，又把新老领导班子成员都请到家里，备下丰盛茶点招待，几代儿科精英欢聚一堂，交心畅谈。诸福棠高度评价并赞许上一届院领导的工作成就，希望新班子团结友爱，为儿科事业做出更多贡献。樊寻梅同老院长多着一层关系，她的父亲、著名儿科老专家樊培禄教授（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是诸福棠的好朋友。1989年3月，樊培禄收到诸福棠一信，信中说：

“培禄老友：今天给你写信，主要是向你贺喜，祝贺你的

女儿寻梅，经过多年的认真工作和团结锻炼，已于上周被北京市卫生局推选为我院院长，接胡亚美同志的班。我和吴瑞萍同志对此新旧代谢之事非常喜悦，欢庆医院得人，特向你报喜，并愿新领导班子团结友爱，为公忘私，把我院建设得更有成绩。胡亚美同志忠诚勤恳，为我党优秀之士，闻名于时，此次辞去院长职务，减轻行政负担，但仍将做儿科教学（仍兼首都医学科儿科系主任教授）及中华医学会等学术领导工作。她仍与江载芳同志参加医院领导核心小组，想寻梅同志定能追随彼二人，努力医、教、研、防，为全国的儿科事业多做贡献，破浪前进!"

樊寻梅不负前辈期望，决心竭尽所能地投身于几代师长呕心沥血创出的这番事业。她在就职讲话中庄严地宣告：把"公慈勤和"院训和老院长的思想作风继续发扬，并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个人能对几代人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是不多见的。诸福棠感人之深在于他自身具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那种朴实谦和诚挚的慈心柔肠，对晚辈的苦心提携，诲人不倦的谆谆教导，都给人以温暖和力量，使人倍受鼓舞和激励。如今，北京儿童医院还在坚持早已形成制度的读书报告会，医疗科研人员定期聚会，轮流报告自己最近读书的收获和心得体会，着重介绍国内外儿科的新进展。这对提高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们学习钻研的热情和积极性很有作用，有利于促进医疗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胡亚美他们那一代记得清，这种钻研文献的好风气，正是当年老院长带头兴起来的。当时诸福棠还兼着北大医学院儿科主任，他轮番在大学和府前街儿童医院定期举行读书报告会，三位老院长每场必到，和大家一起做报告，谈读书心得。年轻人们最高兴，因为还有好吃的，夏天是花生米，冬天有糖葫芦，以及其他美食，一般都是诸院长掏腰包做东。在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年轻人们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可不能光想吃的哟，如果在报告会上显出自己学得不够，钻研的劲头还差，那

会觉得脸热心跳，很不自在，逼着自己加倍努力的。

左启华说老师是真正的学者，有充分根据。她曾看到过老师有几册精装的笔记本，上边详细记载着他三十年代在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时看过的大量病例。左启华钦佩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踏踏实实探求真理不搞虚夸的科学精神。“大跃进”年代，医务界也搞了些“花架子”，如鸡血疗法之类，人们争相仿效，老院长反对盲目追“风”。左启华把老师当作事业上的精神支柱，几十年来一直学着老师的榜样，遇到困难，只要想一想老师那感人的精神和如春风拂面的教言，信心和勇气就来了。

尊师重教是我们国家一向强调的民族传统美德。诸福棠的学生们心中永远树立着老师那高大慈祥的形象，在事业上，他是引路人和催人奋进的动力源泉。反过来，众多后继新秀又给老师以莫大的慰藉。这已经是一支庞大精干的队伍，诸福棠以爱抚的目光注视着大批生力军奋勇前进的时候，不由想起当年在东堂子胡同和府前街初期三位同道孤军奋战的情景，他们多么希望中国的儿科事业人才济济大发展啊，可是七、八年的艰苦努力，不过是个只有30张病床、十几名医务人员的小医院，全国的小儿科医生也寥寥无几。喜看今日各业欣欣向荣，儿科事业迅速发展的动人局面，怎不令人振奋！诸福棠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超人的权威，但那是一种公认的浸透于儿科事业中和几代弟子们身上无形的力量，这股非凡的力量使儿科大业同诸福棠密不可分，使学生们终生难忘这慈父般的恩师。诸福棠同身边几位得意门生情同子女，胜过子女，多年来彼此间构筑成一种十分感人值得赞美的忘年深交。近年来，每逢11月28日，诸福棠家便有一场悄悄进行的小型祝寿会，每次都是在老寿星反对下学生们自发组织坚持办的。到时候人们带上生日大蛋糕敲门进来了，“宾至如归”，自己动手张罗起来。这里没有需要特意应酬的客人，没有刻板的祝寿辞，只有晚辈人发自内心的真情祝愿，那灼人的热流，满堂的欢声笑语，充满爱的温馨。老人

健康长寿是学生们的幸福，他们是捧着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老寿星的，诸福棠无法拒之门外，如果老人肯点头，那么为他办的祝寿会就是在大礼堂举行，也会挤破门的。

不仅北京的学生有如此的深情，上海的儿科同道刘湘云、郭迪、齐家仪、金汉珍，天津的范权，成都的樊培禄，沈阳的李助宣、项全申等老教授们，每次到北京来开会，一定要到儿童医院来看望诸福棠，倾心长谈。

根深叶茂。诸福棠这棵大树已花果满枝。即使是择要介绍他的芬芳桃李的事迹，也将是厚厚的一本《群英谱》。

第十八章　合格公民

一、好代表

诸福棠是中国儿科事业的一颗恒星。他光彩照人，不仅在病房诊室、研究所，他的思想作风，品德情操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闪耀着光辉。最讲科学态度、一生忠厚诚挚的老实人在解放了的大地上才有了适当的位置，受到党、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和尊敬。诸福棠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就被选为代表，一直连任到第六届，此时年迈体弱，乐于退休。他代表人民参政议政，是新中国历年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参与者，多次庄严地举手、投票，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脱下白大褂，走进大会堂，老教授心潮澎湃，感奋不已。

那还是在1954年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选举了29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诸福棠名列其中，还有另一位医务界的代表林巧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当选。各界人民代表欢聚在中山堂，合影留念，多么值得纪念的时刻呀！从此，诸福棠认真负责地履行人民代表的光荣职责，他把这项任务看得重于自己的儿科事业，因为这是包容万象的大事业，搞好了这项大事业，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可以得到更充分地实现。

体弱多病的诸福棠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又逢健康欠佳，单位特为他安排了一个休养的好去处——景色秀丽的颐和园。半个多世纪以来，哪有过这样愉快舒畅的日子！

饮食起居关照得细致入微，静养两周后，诸福棠精神抖擞地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各界各民族人民代表一起相聚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商国家大事。

时值1954年秋高气爽的一天，9月20日，中国人民自己制定的第一部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了。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诸福棠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说：

“我感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三十多年来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胜利果实，也是全国人民逐步完成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奋斗目标。它是真正地代表着全国人民共同的意志。我对于这个宪法草案完全同意并且衷心地拥护。宪法草案的内容给了我们医务工作者很大的鼓励。解放以前，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之下，根本就谈不到卫生设施，就是有一些医疗机构，也只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大的工人和干部都享受了劳动保护和公费医疗的待遇。现在宪法草案又规定了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可以得到物质的帮助，国家要举办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要逐步扩充劳动人民的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这些设施无疑地将要进一步提高全国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宪法草案特别提出了母亲和儿童受到国家的保护。这种对于新一代的重视只有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得到。从今以后，劳动人民的子女将要永远得到健康和快乐的生活。宪法草案对于卫生事业的重视，对于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视，也大大鼓舞了我们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拿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从前在反动统治时代，我们要想办一个医院，做一些医学研究工作，是没有人来支持的。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早在1951年的秋天，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爱护首都的儿童，就计划了一个规模相当大并且具有教育设备的儿童医院。在这个医院的附近，又保留了一些空地，准备设立儿科研究所。这些都是我们在解放以前绝对梦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这些具体的事实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做一个新中国的医务工作者能有这样好的机会来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真是最大的光荣！”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庄严肃穆的会场上，回荡着一个正直、爱国的科学家的肺腑之言，通过无线电波和新闻传播，全国人民听到了这位著名儿科专家由衷的心声。诸福棠，人民的优秀代表，时时关怀着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历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都认真收集选民意见，把人民的一片爱国深情连同自己的赤子之心带到大会上。

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在“大跃进”热浪中召开。诸福棠和林巧稚联名作了《为消灭疾病保证健康提高生产力而斗争》的大会发言，中国医界两位巨星高兴地提到卫生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取得的可喜成绩：城乡人民死亡率、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天花、回归热已经消灭，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开始显示了“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作用……他们在联合发言中提出了努力消灭常见传染病、推广地段保健制度、大力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中肯的权威性的建议，这都是当时全国医疗卫生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他们说：“必须指出，计划生育是对于我国人民长远利益的一个重要措施。做好了计划生育，可使家庭中保育、教育、经济各方面都得到妥善的安排，对于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经济建设的速度一定会有良好的影响。‘生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是我国妇幼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早在四十年代初期，诸福棠根据小儿多的家庭死亡率比小儿少的家庭明显为高的事实，就在初版《实用儿科学》中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问题。他的想法和论点几乎同著名的爱国学者马寅初的主张不谋而合。科学家始终为真理而忘我奋斗，任何时候都坚持正确的观点。

诸福棠十分珍视人民代表的光荣身份，严肃认真地以主人翁姿态行使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多次提出针对性很强的有关提案，一般都得到了认真的解决和处理。他质朴诚实的性格始终如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不会看风使舵，违心地变换面孔。在一次大会发言中，他真挚坦诚地指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有肯定的成绩，但是也有缺点。首先，我们的医疗工作质量不够好，还远远赶不上人民的需要。一方面是由于一部分的工作人员有个人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于病人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对于这些医务人员，必须加强政治思想的领导。另一方面，一般干部的技术水平不够，应当加强业务学习。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改善领导的工作方法，把他们主要的精力放在培养干部的工作上。关于医学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也做得很不够。我们必须吸取世界各国的医学成就，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

二、伟大公民

诸福棠是一位尽责的人民好代表，他处处受尊敬。早在三十年代的大洋彼岸，被美国同道誉为"品德高尚的人"，他的发明创造被誉为"小儿福音"。由于他的学术贡献，他是举世闻名的。

随着人民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1953年，诸福棠作为中国卫生代表团成员，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医师大会。会后往捷克斯洛伐克参观两周，又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作了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1956年夏季，诸福棠作为儿科代表团团长，去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八届国际儿科大会。在大会秘书处报到时，忽然发现名单上有"另一个中国"的代表。诸福棠深感震怒，焦急地打听这个人是谁，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从香港去参加大会的徐庆丰医生。徐庆丰是诸福棠多年

前在协和培养的儿科医生，他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加大会的，并不代表谁。诸福棠当即要徐庆丰向大会秘书处说明真象，并要秘书处在会场公开张贴布告，申明代表名单上“两个中国”的写法是错误的。后来丹麦报纸上也登载了这件事。诸福棠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定地维护了祖国的荣誉。这是他第一次代表人民中国出席国际儿科大会。过去历次大会都没有中国的代表，只是1947年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儿科大会，诸福棠曾收到一份邀请电报，那是美国朋友出于对他的崇敬和重视，请他以个人身份参加的。但适值有病在身，未能前往。这次不同了，他代表的是一个新兴的文明古国，这个欣欣向荣的东方巨人处处受到尊重，他感到光荣。在我国驻丹麦大使馆的一次邀请丹麦著名教授的宴会上，诸福棠即席介绍了新中国儿童保健工作在短时间内的突出成就，受到丹麦朋友们的赞扬。第八届国际儿科大会后，诸福棠偕同陈翠贞、祝寿河二位代表访问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儿科著名教授华尔格兰(A·Wallgren)和芬兰赫尔辛基的儿科老教授耶尔波（A.YlPPÖ）和他的助手霍尔曼（N.Hallman）教授；又与法国儿科老人杜勃利（R.Debre）教授等聚餐，老人深望我国能派儿科医生赴法交流，由于当时两国尚未建交，未能如愿。建交后两国医务人员互相访问交往频繁，北京儿童医院连年派人到巴黎进修儿科急救和血液学等技术。

在一片赞扬声和温暖的友情中，诸福棠回想起1933年欧陆之行，那次纯系个人访问，凭着美国朋友几封私人介绍信；这一次是作为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科代表团团长，大会场上有五星红旗飘扬，前后两次出访，心情大不一样。诸福棠有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又借助新中国的威望，他到处受欢迎受尊敬是理所当然的。1962年，他应邀率团去苏联基辅市，参加全苏儿科大会，在会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麻疹疫苗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另一篇是《腺病毒肺炎的临床观察》。苏

联同行高度评价这位世界级科学家的成就和学术造诣，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崇敬之情。事后，苏联儿科学会授予诸福棠名誉会员称号。诸老的学生、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顾方舟教授当时也被邀出席，陪同赴会，诸老那两篇论文是由他代为用俄语宣读的，俄语讲的很流利，受到听众的赞扬。

东邻日本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儿科年会，近年来常邀请诸福棠前往赴会，他只偕同胡亚美去过一次，以后就把机会让给各省市儿科专家轮流派人参加，以便更多的儿科医生去交流学术，增广见闻。北京方面1980年吴瑞萍曾偕医科院儿研所张叔伦去参加一次。

英国皇家学会儿科负责人，曾任国际儿科学会秘书长的斯坦普来顿（Thomas Stapleton）教授久慕诸福棠的声名，二人鸿雁传书，时有交往。此人多次访华，1988年夏天又来，正值诸福棠住院，他赴友谊医院探视，回国后寄来一信：

“当我每次访华，看到你经手设计和开办的儿童医院，常设想，你一定回想到一生的辛劳和突出的成功。不知你当初开始从事北京儿童医院的建设时，是否想象到它会是今天这样一座设备完善的著名学府。这是你热爱儿童和儿科工作，创建了这样的高尚模式，使后来的接班人得以仿效，继续这种高标准的科学工作。

“你作为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作为伟大的中国公民，我十分钦佩你！”

三、赠“马”

诸福棠的高足胡亚美夫妇俩在诸老从医60周年时赠给老人一首颂诗字轴，其中一句是“从不为名名益重”，这是胡亚美几十年在老师身边亲自感受的深刻体会，事实如此，恰如其份。

一向淡泊自许的诸福棠不图名利，撒向人间都是爱。他以高超的医术造福儿童，受惠者千千万万，有很多人家两代都是诸福棠的病人；有时走在街上遇到有人向他鞠躬致敬，老人一时记不起是谁。在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到处有诸福棠起死回生救起的患儿，感激不尽的家长会告诉孩子救命恩人是谁。

诸福棠以显赫的功绩和默默的奉献，在国内外赢得了光彩夺目的盛名。数不尽的颂词赞语，感谢信，纪念品，使他那颗爱人之心时时沉浸在温暖之中。文学家艺术家们则以独特的方式向他们敬重的儿科专家表达谢忱，使诸福棠的人性之美、人格之美升华到更高境界。萧军，这位不失东北人粗犷豪放性格的著名文坛巨匠，有作家特有的深沉细腻的丰富感情。他的女儿萧滨幼年时患重病，由诸福棠诊治转危为安。萧滨于1987年3月18日写信给诸福棠："三十几年来您的名字牢牢地记在我的脑海中，是您给了我新的生命，是您使我从肺结核死神的手中逃了出来。对于您来说，您会认为治病救人是您的职责。但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们则是感念至深之事。我的父亲萧军虽然有众多的子女，但每个儿女对他来说都是掌上明珠，舐犊情深是难于言表的。三十几年来，他时常提起您对我的救命之恩。"一个月以后，萧滨捧着父亲亲笔书写装裱精美的一幅字画给诸福棠送来，"济世活婴"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浸透着老作家一片深情。

著名画家周怀民几次赠画，不是出于和诸福棠是无锡同乡。他为庆贺诸福棠行医58周年特作一幅长轴，画的是串串紫红透亮的葡萄，旁书"果实累累庆丰收，万紫千红玉液香"。这幅挂在北京儿童医院办公室的名作，特别引人注目，他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更使人对老院长辛勤育人的功绩肃然起敬。人们并非只是因为诸福棠为自己的子女治好了病才感激他尊敬他。当代杰出画家蒋兆和在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开幕时送来大幅画像《毛主席与中国儿童》，以示祝贺。这幅妙笔佳作曾悬于医院大

厅，惹人注目，但因批判画家，十年动乱中也遭浩劫，幸东藏西匿，得免于难，至今仍保存完好。医院三十周年院庆时，画家已久卧病榻，还嘱其子蒋代明作儿童花瓶一幅送来致贺。蒋兆和是位出色的爱国画家，他"热爱中华大地，无论在旧社会对世上疮痍的揭示，还是在新社会对光明未来的憧憬，都倾注了他的全副身心"(摘自范曾《丹心可表碧云天——怀念恩师蒋兆和》)。画家蒋兆和对毕生致力于儿科事业贡献卓著的诸福棠教授深怀崇敬之情。

驰誉中外的美术大师徐悲鸿赠"马"是诸福棠铭记在心深为所动的一段佳话。画幅题为《回顾当年旧战场》,那奋蹄奔驰的骏马是头向后的，含义深邃。那是1949年解放之初，普济众生、广施医术的诸福棠被徐悲鸿请去为孩子看病，手到病除，患儿痊愈。美术大师向杏林巨匠表达谢意，特作画一幅面赠。"回顾当年旧战场",不待言传，自能意会。解放前，两位蜚声海内外的名家辛勤耕耘，培育英才，为国为民立了功劳；但是旧时代没有给过他们多少相应的尊重，都曾经历过坎坷。如今旭日初升，光明在前，当牢记过去苦，方知今日甜，愿协手同为人民中国尽心竭力创事业。

直到1953年徐悲鸿去世，两人保持着友谊。已故悲鸿大师融合中西技法自成一体的力作，如今更被人们视若珍宝。多年来，诸福棠把大师赠画高悬壁上，满堂生辉。1983年，徐悲鸿纪念馆新馆开幕，诸福棠带着怀念和崇敬的心情，忍痛割爱，亲自把画送还，交纪念馆展出。徐悲鸿夫人廖静文馆长感佩莫名，由衷起敬，特与其他负责人一起接受还赠，并与诸福棠合影留念。这对诸福棠来说，本不足挂齿，他一向以他人利益为重。诸福棠说："这么贵重的名画应该交纪念馆展出，长期供人欣赏，不能留给自己的子女。"徐悲鸿纪念馆新馆落成开幕，是党、国家和人民对这位爱国艺术大师的高度评价和推崇；诸福棠成人之美的高尚品德为纪念馆充实了内容，增添了光彩。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教研组副教授李守仁了解了诸福棠的事迹后，仰慕老人品德高尚，提出为老人塑像，真心实意，盛情难却。李守仁自带材料工具两次亲赴诸家临摩，做出初步模型，精心雕塑。不久像成，李守仁亲自送去，诸福棠不胜感激地收下了这份厚礼。那是一座头像，诸福棠把它放置案头，亲友来宾见了无不击掌叫绝。雕像把老人亲切慈祥的面容和坚毅凝重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至，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艺术家饱含深情创造的一件精品，又另做了一座铜质的，将置于医院办公室。李守仁副教授代表千万人的心意，为可敬的诸福棠老人立起了一座功德碑。

第十九章　十年劫难

一、有功的“罪人”

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建设我们的国家，但是，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阴谋家、野心家们却千方百计进行捣乱破坏，妄图乱中夺权篡国。在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遭受了一次浩劫。诸福棠是拔尖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帽子，押往医院传染病房楼暗无天日的地窖子里，睡在一块紧挨阴凉潮湿地面的木板上，裤带和一切身边长物悉被收去，电灯终夜不关，以便室外监视。这样困闭囚室，食宿均失自由，对一位69岁又身体孱弱的著名教授是极为残酷的。每天黎明起身，慌忙洗漱，然后和同被关押的十五名院级领导人一起，列队鱼贯进入饭厅，站着吃一个馒头，喝一碗稀粥，只给五分钟时间，早餐就须结束。上午劳动，下午学“毛选”，随时准备着被传去批斗。在各处打派仗的播音大喇叭一片狂喊乱叫声中，诸福棠的耳朵终日嗡嗡作响，更加心烦意乱。大半辈子从未见过这种场面。他不理解，如此“经风雨见世面”到底有什么积极作用？

他承认自己几十年来只会动脑，体力活干得很少，家务事由老伴大包大揽，什么也不让他干。平时的干部劳动，也总是不让老院长参加。这下可以好好接受“再教育”了。然而每天各式各样的劳动，老人却有点吃不消。冬日清晨，寒风割面，一行十六名在押男女扛锹荷帚列队前往医院大门外清扫积雪。

哪个敢稍有懈怠！大家都在用尽超出自己能量极限的力气挥臂大干。难为这些平日专为病儿操劳的“白衣战士”们，你们倒是犯了什么罪过呀！老院长一向事事走在前，他是全院领导，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发挥得很充分。然而在这里，他远远地落在了后边。你看他，汗流满面，弯腰弓背，吃力地清扫着，不时抬头望望前面的伙伴，急着想赶上去。年近古稀，瘦弱的身子，明显的力不从心，目不忍睹啊！

医院里一般脏活累活，老院长差不多都干过。打扫厕所虽不干净，却较省力。扫院子如时间不长也还能应付。推车运煤就累得多。从来没干过这种事的老教授有时还把工具拿倒了，遭到斥责，惹得看守们一阵哄笑。诸福棠和当时做内科主任的胡亚美等人关在一起，师生成了难友。胡亚美虽是个“豆芽菜”式的瘦女子，但比诸福棠年轻二十多岁，她看见老院长的样子心如刀绞，恨不能自己受双份罪替老师解除些痛苦。然而这里不允许有人情温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哪能“温良恭俭让”！倒是带他们干活的老清洁工刘金贵能经常抽冷子帮老院长一把，替老院长装煤推车。老刘是血统工人，三代没缺儿，他不怕，他认为不该这样让老院长受罪。

复兴门外南礼士路边的北京儿童医院，五十年代在那个地区算是宏伟的建筑，如今连前几名都排不上了。可是医院环境优美，绿化搞得好。这也是诸福棠当年设计的。“文革”期间一切全乱，花草树木也疏于管理了。一天，十六人队伍被拉到医院西门内，受命砌墙造语录牌，地点选在栽种多年的一棵挺拔苍翠的大雪松处。砍掉！一声令下，这棵曾为医院增色的大雪松被沿根锯倒了。直到1978年，语录牌被拆除，才重新栽种了花木。

诸福棠最喜爱医院南部那座小桃园，常去那里缓步散心，“桃园三结义”的友爱情思也便油然而生。“文革”受难期间有时让他去那里干活。春暖花开时节，坐在树下，清理乱铅丝。

活不重，又有鸟语花香，诸福棠的心情却好不起来。也许你认为那乱铅丝不难整理，到老院长手里可就不容易了。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正如自己的思想，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这场空前的大浩劫给诸福棠的磨难够多的了。最难忍受的是不断的人身侮辱。批斗会上，“造反好汉”们把老院长的双臂扭在背后，按着头押到台上，几小时的九十度直角大弯腰，两腿要直挺，上胸蜷伏下去，老人浑身冒汗，不住地颤抖，着实难以支撑。即便如此，正直一生的老科学家不改初衷，句句老实话，在强暴与淫威面前不曾屈服。日常的凌辱已司空见惯，咬牙忍过便是。诸福棠肠胃弱，消化系统常有病。一天饭后忽然肚痛难忍，急忙入厕。立即有人紧随其后。她，只好等在厕所外。时间长了点，她走开了。上级斥责她擅离职守，放松了“无产阶级专政”。她就转来找诸福棠撒气，对准老院长的脸挥起拳头，刚刚触及皮肉，那双手又缩回去了。可以想象，此人那一瞬间的激烈思想斗争和情感翻腾。

诸福棠，毕竟是有声望受敬重的权威学者。肌肤之苦，精神折磨，丝毫动摇不了他的浩然正气。

二、最老的“住院大夫”

难堪的逆境，没有影响诸福棠对党的坚定信心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入夜，灯光直射下难以成眠，他辗转反侧，苦思冥索，他想得很多很深。自已受的委屈再大，也比不过刘少奇主席、贺龙元帅，还有一大批为国为民立过大功的老革命们，他们连身家性命都没有保住！还是那句老话：“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阴云遮天，暴雨成灾能有多久，阳光总要普照大地的。一个科学家经过多年入微的观察和锻炼提高，认准了的真理决不会轻易放弃。受尽煎熬的诸福棠坚信党终有一日会拂去

身上的灰尘，重放光辉。他念念不忘由于“文革”开始被迫中断的《实用儿科学》的再版工作，瞅准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隙时间，抓紧写稿改书。正在被专政期间，万一被造反派发现，这可不得了！难友们为老院长捏着一把汗。胡亚美悄悄劝说：“您留神点，就别……”老人痴心不改，一往情深，忘掉了身陷囹圄的困境。谁知，老愚公竟感动了“上帝”，加上读者强烈要求，卫生局军管会居然批准《实用儿科学》再版。

“文革”中两派纷争，都争取老院长参加自己的一派，更加重了诸福棠的苦难。有一次老人被“勒令”去接受批判，两派你拉我拽，来回争夺，古稀老人实在承受不住，他晕倒了，一量血压：高压220！一个好心的医生赶忙背起这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名医学者，到附近的月坛医院抢救，幸免不测。

医院军宣队、工宣队决定改变对诸福棠的专政方式，把他发配到病房去当住院医生：叫你个大专家去做小大夫！诸福棠却喜出望外，高兴地接受了“惩罚”，穿起白大褂，戴上听诊器，到孩子们中间去了。每天一早准时上班，老院长不光给患儿诊断治疗，还须按着人们在“文革”中的“一条龙”的新创造，连护士、卫生员的活也得干。诸福棠耐心细致地给孩子们喂药，把屎端尿，丝毫不勉强，更无怨言，他乐意做。“一切为了孩子”的一贯思想作风又一次得到实践的机会，他感到欣慰。

七十高龄的住院大夫，绝无仅有。老院长在内科第七病房“重操旧业”，如鱼得水，干得格外出色。他认真负责，把患儿的病历写得明晰扼要，条理清楚，文字工整。老院长的一言一行，对年轻医生们都是示范。一次，病房收进一个初生两个多月的婴儿，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达40摄氏度以上。门诊照过胸片，大夫认为右侧上方有大块阴影，诊断是支气管肺炎。于是给以青霉素肌肉注射，但高烧始终不退。患儿母亲十分着急，常发脾气，与医护人员产生矛盾。难题交给了“住院大夫”诸福棠。老院长仔细观察X光片，看到阴影特大，上边碰到肺尖

位置；但是除了高烧之外，没有咳嗽，也听不到罗音，只是叩诊时听到右肺上部满是浊音，呼吸音减弱。诸福棠怀疑这不是肺炎，有可能是少见的肺部肿瘤。请来外科潘少川大夫会诊，决定作诊断性穿刺，抽出少许液体，涂片做病理检查，结果确诊是神经母细胞瘤，是从后纵隔发生而压迫右肺的。这种毒瘤一般生长在腹部，在胸部是很少见的。确诊了这个少见病例，完全可以解释患儿特高体温和气促等严重症状产生的原因了。老院长从接管这个患儿一直热情地安慰那焦急的母亲，又耐心地通俗地讲解病情，那母亲知道孩子得的是无法治好的恶性肿瘤，虽然孩子终至不救，也心平气和毫无怨言了，反而感激老院长为她释疑解难，敬佩尽心竭力地诊断和抢救患儿的高尚医德。这个事例对年轻大夫们更是一次深刻教育。老院长语重心长地对医护人员说："遇到严重病例，首先应当耐心静气地进行诊疗，决不可同心情紧张激动的家长产生对立情绪。儿科工作者特别应当提高涵养，要同病儿家长站在一条战线上考虑和处理问题。"

这位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住院医生"在内七病房是个人人热爱倍受尊敬的人物。承德军区医院派来进修的张大夫久仰诸福棠大名，今日得同室并肩工作，颇感三生有幸，便抓紧机会，虚心向老前辈学习。他请教老院长如何对常见的腹泻患儿进行适当的补液。老人细心讲解，还教他如何准确计算各种电解质剂量，演示具体操作方法。张大夫学成回原单位，依法操作，果然灵验，便给老院长写信，极力赞扬这种补液方法，认为既简单易行，又安全保险，值得推广。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随行的美国"第一夫人"要参观北京儿童医院，到这所有名的医院见不着有名的诸福棠院长是不可思议的。于是这位早为美国人所敬仰的学术权威被紧急动员出来，受命接待尼克松夫人。总不能没个头衔吧，诸福棠想不到自己被当成反革命批斗专政了一通，又当上

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外宾接待任务圆满完成。诸福棠不卑不亢，如实介绍新中国的成就，贵宾很感满意，留下深刻印象。在周总理招待尼克松一行的盛大宴会上，诸福棠应邀到多年不曾迈进的人民大会堂赴会。

十年浩劫终于结束，诸福棠不愿提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不在自己的帐上算得失，全党、全国、全民的这场大悲剧已被中央彻底否定，做了历史性的正确结论。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大量深得民心的细致工作，使社会主义祖国终于恢复了元气，重新振作起来。中国共产党自己医治创伤，大公无私，豁达大度，益发显示其伟大。诸福棠经过十年的磨炼考验，再一次表现了思想人品的一贯完美。

第二十章　贤内助

一、涸辙之鱼

在诸福棠"文革"蒙难期间，夫人朱定一痛苦不比他小。恩恩爱爱几十年，朱定一从没有如此为老伴的安危揪过心。抄家，由他去抄，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人平安无事。可是那年月，人人惊慌疑惧，时时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谁心里都没底。诸福棠的家与囚室不过百米之隔，同家人却无法会面。朱定一放心不下，坐立不安，常常凭窗发呆。忽一日，见一队男女列队朝食堂方向去了、老伴走在里边，他腰背弯了，行动蹒跚，苍老了许多。朱定一心头紧缩，泪如泉涌，稍可告慰的是总算见到老伴了。这以后，她摸准了规律，每天到开饭时间都到窗前眺望，看老伴一眼。

自从嫁到诸家，朱定一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放弃了学成就业的机会，一心支持丈夫去建功立业。诸福棠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而自豪，亲友们赞羡，说他是有福之人。他对妻子也很体贴，两人相敬如宾，从没红过脸拌过嘴。子女们在这种家庭氛围和道德环境中受熏陶，也都知道尊重他人，互相关怀，很懂文明礼貌。这个家充满温暖，这是夫人的功劳。为了让丈夫安心学习、工作、写书、搞研究，朱定一每天忙乎吃喝，置办全家人四季衣装，热心招待亲朋好友。她注重子女家庭教育，孩子们读书肯用功，随着父亲事业的发展，他们逐级升学，大女儿美端进入燕京大学，二女儿美瞻随之考入大连医学院，后

来专攻儿科，转入北京儿童医院内科工作。二老进入晚年，本该欣慰地安享幸福生活，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给这个家庭蒙上了阴影。1973年7月16日是两位老人的“金婚”纪念，谁也没有兴致大事喜庆一番。

乌云终被驱散，这个家又恢复了温馨的气氛，诸福棠不顾年近八旬，又全部身心地扑到事业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进入令人振奋的新时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带来喜人的信息，诸福棠由于心血力作《实用儿科学》以及其他贡献，在大会上获得荣誉奖状。他高高兴兴地把奖状捧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用饱蘸深情之笔工工整整地写下“有朱定一一半”几个字，贴在荣誉奖状上，夫人得到莫大慰藉，一生辛劳有人知，老伴最知心。诸福棠曾在1973年和1976年，陪伴朱定一游览苏杭、峨嵋山、成都、西安、洛阳等地，参观南北胜迹，补偿夫人一生勤劳。

过了几年舒心日子，朱定一忽感身体不适，不思饮食，日渐消瘦。经查，系肝癌作怪。诸福棠竭尽所能地为老伴延医诊治，悉心服侍；孩子们为老母病倒心急如焚，随侍床侧。这时，诸福棠除了耳聋，其他还好，还算健康，这使老伴略觉宽心，只是担心过分执着的丈夫不分昼夜地为儿科事业辛劳伤了身子。别的不说，就那部《实用儿科学》的主编工作他是紧抓不放，呕心沥血写个不停，出了新版，又忙着为再版增补新内容。诸福棠一边照顾病人，仍紧握手中笔没完没了地忙。朱定一半个多世纪与老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最了解他。他既不为个人沽名钓誉，争权夺利，广集财富，也不会让后辈人为此而丧失人格尊严，辱没人生价值。她深深地敬佩丈夫的高尚人格和道德情操，教孩子们学习父亲的好榜样；她为有这样一位好丈夫而感到幸福，一生默默地为丈夫为这个家竭尽辛劳，觉得有意义，日子过得充实、坦然。她离开亲人们去了，虽然心疼老伴今后的孤独，却也满意地走完了80年的人生历程。

1982年5月30日，朱定一永远地离开了亲人。诸福棠暮年丧偶，悲痛至极。办完丧事，医院安排吴瑞萍、胡亚美陪诸福棠去香山休养些日子，帮助老院长排解心头哀伤。这以后，每年朱定一的忌日，诸福棠都要孩子们把母亲的骨灰奉迎回家，供上亡人生前喜爱的花卉果品，全家素食一日，深致悼念。

二、悼亡与教导后辈

诸福棠在悼念夫人朱定一八十诞辰时，有一篇告诫后辈的谈话：

"今天，1982年6月23日，正是端阳节前两天，是你们妈妈的八十岁生辰。妈妈在5月30日上午11时50分逝世，迄今仅24日。我们想念她生前的为人，在她灵前供置一些鲜花和她生前爱吃的豌豆黄、水蜜桃、西瓜等，以表悼念。趁此机会，让我们全家追忆她一生辛勤劳苦建立家庭，成就我的儿科事业，以及助人为乐等高尚品德，后辈们正可纪念先人，借鉴学习。

"五十余年前，你们妈妈伴我来北京，让我继续就学于协和医学院，当时收入低，我们租了一间平房，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家庭，过着俭朴的生活。她自始至终克勤克俭。为帮助我专心于医学事业，担负起家庭里外一切事务，并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常为我殷勤接待我的老师、朋友、学生、外宾等，为我的学业创造良好的条件。以后生活逐渐好转，但她总是自己节俭，宽厚待人，心地善良，急他人之所急，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尤其使我不能忘怀的，'文革'期间我被隔离劳动时，每当取饭路过医院宿舍时，她天天在窗口探望，见到我排队走过去，没有病容，她就安心一天。真似亲友倪小迂老先生在寄来的悼念诗中写的，说她胸襟宽广胜于男儿。亲友们有困难，她总是尽力帮助。她自己也常说，她有四个母亲，意思是除了我和她的母亲及我的未出嫁的希贤姑母之外，连我一位同事的母亲她

也担当起照顾的责任，直至处理丧葬事务为止。这些琐碎的事情，的确是不易做到的。因此有些青年人在她逝世后都寄信来悼念她，说她象慈母一样对待他们。有些亲友怀念她那热诚好客，和蔼可亲，谊重情深的品德，甚至悲泣泪下。可她终生自奉节约，连乘车也尽量多走几步，省几分钱；用纸也不肯浪费一张。

“总之，你们妈妈的一生是勤劳积善的一生，私心少而公心多，顾全大局，成全他人。她为我的儿科事业，为这个家庭，为亲友们的安危，费尽她毕生精力，对自己并无所求，诚可称得上‘无名英雄’。愿后辈们学习妈妈的优点，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都有益的好人！”

慈母的榜样，严父的教诲和家庭的良好风尚，是子女们健康成长的有利社会条件。诸家属于经济条件优裕的阶层，孩子们却从不自恃高人一等，远离“凡人”。诸福棠培养子女们从小就养成勤劳节俭的好习惯，学做有益于他人的高尚的人。孩子们同别家孩子打架，查明情况后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父亲生活简朴节俭，却最爱请客招待亲友。他烟酒不沾唇，没有不良嗜好，对孩子自有好影响。日常生活中也不自视特殊。诸福棠常对子女们说：“我是个中才，既不是天才，也非地才。我有今天全靠努力，说明勤能补拙。”孩子们从小懂得学习、工作要努力。父辈的言行举止随时都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大女儿美端1948年参加革命后服从组织安排，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了三年，五十年代初再回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化工研究院工作。在她的档案里有“艰苦朴素”的评语。她上大学时，家里每月给20元钱。供给制三年基本上没回家吃过饭，一直和同志们吃大灶。偶而家里给煮几个鸡蛋，还大部分送给同志们分享。二女儿美瞻从大连医学院毕业后先在大连妇婴医院任职，到了1964年转到北京儿童医院内科工作，性格很像父亲，沉稳宁静，工作上也是孜孜求进，不遗余力，现已升

为主任医师。

目前，诸福棠的孙辈也都已各有专业，在电子计算机、免疫学、教育学和美术学等方面学习均有成就，不断进步，处世为人都学习前辈，自奉节俭，宽厚待人。

三、高风亮节

诸福棠受过上辈人某些有益的影响，也教育子孙们学习长辈的好思想好品德；但他无意荣祖荫子，用自己的荣誉为祖上加什么光环，为后辈人捞什么好处。大女儿美端大学毕业后就自食其力，没沾过父亲的光，工作、房子一切自行解决，到53岁才分到一套两居室，儿子结婚没房到处“打游击”。老人根本没动过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儿孙们找门路寻方便的念头。美端发现乳腺上长了一个瘤子，医生说不排除癌的可能。她自己通过有关同志找到一位医生成功地做了手术。医生们听说是诸福棠的女儿，都愿意帮忙。为她动手术的那位医生说：“你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很敬重他。”

为子女谋点福利也是人之常情。但诸福棠认为那样做不尊重别人，也不自重。人各有志，他不愿意为私事给别人添麻烦，更不能超越自己所应享受的范围去伸手强求，不能自视特殊，脱离群众。在生活上他对子女照顾不多，看似寡情，实为真正的爱护。诸福棠认为，一个人精力有限，如果在生活上斤斤计较，孜孜以求，那就难以开拓视野，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这个家，朴素雅致，有女主人遗下的好风格，有老父亲照人的光采，经常高朋满坐，讨论国家和儿科大事。凭诸福棠的贡献、地位和声望，他有条件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向这套五十年代初不宽绰的老房子告别；然而他不要，安居斗室，奋斗不息。节假日，子女们回到母亲曾居住过的这个温暖的家，三代人欢聚一堂，享尽天伦之乐，十分愉快。

第二十一章　生无富豪志

一、义心义举

用某些人世俗的观点看，一身荣耀的诸福棠本可名利双收，腰缠万贯；他这个家可以是个高收入高消费的上等家庭，远远超过目前的水平。然而，诸福棠志不在此，名利场上事他没有兴趣．在为祖国花朵的健康成长辛勤奉献的同时，他为人类社会聚集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

1975年，诸福棠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到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政府发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化的号召，不觉激情油然而生。尽管当时“四人帮”还在肆虐，诸福棠对党和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他要表达一个科学家的爱国心，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征得老伴同意，把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十万元钱全部贡献给了国家。组织上考虑到老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算高，年纪又大了，决定把钱退还给他。诸福棠哪里肯受，把钱作为党费又交给上级组织。他写了一份申请:“把这笔钱交给组织，对集体、对我的家庭以及我个人的思想提高都有一定好处。希望组织上批准，使我能在垂暮之年实现这个心愿。”老人想得周全，又用古训“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唐太宗李世民语）告诫子女不可贪财，并说明为什么不把钱留给他们。北京市委终于批准了他的申请，诸福棠高兴地说：“就像一个赤子对母亲尽了一份心意，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诸福棠这样做决非“视财如粪土”,他个人和家庭生活需求

都离不开金钱。但是他把自己的一切融汇于集体、民族、国家的利益之中了，他懂得怎样使用金钱。知识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是真正的无价之宝，诸福棠把这无价之宝无私地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他所得到的补偿与他的贡献相比,本是微不足道的;令人起敬的是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出来了，包括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有人认为可以只讲利，不要义了,这实在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见解。我们的教授是重义轻利的，他对“义”和“利”有自己的正确理解。他追求的是一种对民族，对人类的大义大利，而不是不义的利己主义，因此他才能有如此感人的献身精神和令人讴歌的高贵品质。他仗义疏财，把全部积蓄交了党费之后，又把平日的节余零星地寄往无锡，支援家乡建设，每次500元,连续多年。东亭乡杨亭村按着诸福棠的建议，用这些钱先后建立了图书室和资助医务所的发展建设。除了寄钱，诸福棠还经常寄去书刊。目前农村经济改革给这个江南小村带来了繁荣，杨亭村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随着工农业的巨大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文教事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诸福棠资助建立起来的村图书室有两千多册书，几十份报刊杂志，新建的村办公楼里给它一间大房子，桌椅齐备，供全村大人、学生前来阅览、借书，外村的学生也是这里的读者。医务所也具有相当规模，有五名医务人员，设有五张简易病床，一间药房，小病可以不出村。用诸福棠寄回的资助金从天津购来一架激光针灸机，疗效好，大受欢迎。这里也接待外村患者。这些都是诸福棠资助兴办的福利事业。最让老人高兴的是，杨亭村的计划生育率、一胎率和独生子女领证率都达到100％，几年来都是乡、县的先进单位。

诸福棠尽全力支援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事业。他为家乡分忧解愁，减轻负担。他有一位远房叔父名昌公，是油漆匠，遗下叔母昌婆无以为生，有个养子又不尽孝道,成为村里一个负担。五十年代初诸福棠把叔母接到北京赡养，为夫人朱定一迎来第

五位“母亲”。昌婆日子过得快活，只是怕身后不尽理想，常唠叨：“此地要烧掉的，还是回去好，将来可以睡棺材。”在北京住了两年，昌婆坚持着回老家去了。并无赡养义务的诸福棠每月给叔母寄15元生活费，直至1972年老人故去。

杨亭出了个诸福棠，乡亲们引以为荣。进入八十年代，农村比过去富裕得多了，尤其是无锡等苏南各县，居全国之首。乡亲们感谢诸福棠的热情支援，领了他一片心意，不愿再让老人破费了。前几年，村党支部书记诸全兴特地到北京看望诸福棠，代表乡亲们向老人致敬问安。他向老人详细介绍了家乡的新面貌，并说：“欢迎您再回家乡看看。那时候我们已有了小轿车，您不必乘小船了。”

二、劳动者之间

诸福棠是有贡献的脑力劳动者，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自视尊贵，而是把自己当做普通劳动群众中的一员。帮助他人，认为是责无旁贷，受益于人则常思报答。这些优良品质到晚年尤为感人。

在十年浩劫中诸福棠与儿童医院老清洁工刘金贵成了患难之交。前面已经提到刘曾帮老院长推车运煤，此外刘还教老院长不少本领，怎样做垃圾分类，怎样理直如麻的铅丝，怎样使用铁锹、扫帚等工具，说来是简单劳动，老院长却要从头学起。朴实憨厚的刘金贵少言寡语，也不会说让老院长宽心的话，只是用一颗火热的心和实实在在的行动给老院长以温暖和鼓励。比刘金贵还大十多岁的诸福棠心领神会，他把这位朴实的老工人看做是自己的老师和知心朋友。清算了极左政策之后，人们又可以无顾忌地自由交往了。每逢春节，诸福棠总要说：“给我老师拜年去！”他带上好茶、名酒，由女儿扶持着，安步当车，到已经退休的刘金贵家去贺新春，看望良师益友。从南礼士路

到西单太平桥南丰胡同，抄近路不算太远，年轻人走起来不当回事，对一个八十岁的老翁并不轻松。刘金贵见老院长亲自来访，慌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招待为好。诸福棠随便坐下，那平易近人安详自如的神态使坐立不安的主人平静下来，与贵客聊起来，亲如家人。街坊四邻知道来客是著名小儿科专家，都羡慕脸上有光的刘金贵。一时间，佳话传遍。近年来，老院长年事日高，行动不便，很少出门了。刘金贵也着实不敢当，恳请老院长务必留步，千万别再给他拜年去了。

诸福棠无论在家里外头都很谦恭平和，尊重他人，并无尊卑之分。他家的安徽老保姆在夫人在世时已来多年，户口也落到了诸家。在诸福棠眼里，她是一位受尊敬的称职的家庭服务员，情同家人。诸福棠爱带晚辈人逛公园，老保姆常常同行，有几次老院长专门陪她到月坛、北海去赏花游玩。老保姆比诸福棠小二十几岁，也是六十大几的人了，诸福棠象关心家里人一样经常嘘寒问暖，要她注意健康。有一年初冬，老保姆凌晨就到街上排队等候购买冬贮大白菜。老院长用罢早点，去替换老保姆回家吃饭。冒着冬晨的寒风，耄耋老教授伫立街头，完成一个普通市民每年一次的“必修课程”。

诸福棠的生活是大众化的，他很爱吃大白菜，每年必买几百斤在家里存放，吃起来方便，经济上合算。老院长不畏风寒亲自在大街上排队买大白菜，这件事惊动了医院领导，党委书记郭玉莲听说以后很觉不安，立即决定派出一辆卡车，到郊区联系来一批大白菜，分送到各位老专家府上。诸福棠说：这算什么，别人能做的我也应当做，何况我也要吃大白菜呀！

在北京儿童医院，诸福棠是一院之长，又是普通一员。按规定，他有专车，有事一个电话车就备好了。可是除了公事，老院长极少用车，有急事私用，必付油费。坐车外出误了吃饭时间，那司机就会被老院长请到家去与老院长同席共餐。平时出门访友、出游，叫女儿陪同乘公共汽车。八十多岁的老人挤

上挤下的叫人揪心。大女儿美端心直口快，要父亲叫车，老人不依，便告到医院党委。医院领导一向关心老院长，连老人由宿舍到办公室经过的便道都加意修得平平整整，确保老人安全。用车更没问题，有事尽可随便叫。可是诸福棠“我行我素”，依然故我。

三、力倡文明风

在学术上、事业上，诸福棠有极大的权威；多年领导一个大型医院，又是全国性儿科学术组织的负责人，党和人民给了他权利。但他不认为这就可以为自己图方便捞好处。就像对待金钱的态度一样，诸福棠用权讲原则，决不滥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那是市侩、官僚们的权力观。

在党内产生腐败现象的情势下，诸福棠坚持清廉的作风，并大声疾呼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

“我感觉到人类社会的进步一定要以精神文明辅导着物质文明向前推动，缺一不可。正象共产主义的到来要有高超的思想意识和丰富的物质环境作为先导。党中央提出这两个大前提作为我们的前进目标，是有深远的意义的。我们的国家目前有三大问题要克服：一是人口太多。已经由党中央确定计划生育为国策，并且开始获得成功，还在继续努力中；二是经济太差。现在正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深化各项改革，长期对外开放，以便提高国库收入和吸收利用先进国家的新技术和管理方法；三是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水平太低。非大力提高和培养人才不可，对于在这方面多花本钱，多费力量，已为历届人民代表的共同呼声，希望得到中央的进一步决策。关于控制人口和提高经济效益，对提高物质文明有直接作用；关于进一步推进科学文化水平，则是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均能起到根本性促进作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三个方面都能获得丰实成

果，不但可以达到古代管仲所提倡的‘衣食足然后知礼节’，并且使全国人民享受科学文化的好处，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好处，从心底里能够多用公心，少发私念，把国家的事情，集体生活的公事，比以前干得更好。这才是有力地运用精神文明辅导了物质文明。我们今日正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乘机泛滥的环境中，更需要处理好这两个文明的关系，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我相信，有党中央的明察秋毫，善于安排政策和具体计划，上述三问题的解决和两个文明的互相协调，一定可以胜利完成的。"

诸福棠又是一位辛勤育英的教育家，寄厚望于祖国未来的主人，希望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起好习惯，学做懂礼貌、知荣辱的"四有"文明人。北京官园建起了一座十层大楼，"中国儿童发展中心"于1987年春节落成。它是在全国妇联领导下取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助，致力于有益儿童全面发展的多学科跨学科的应用性研究的新建机构，同时创办了《中国儿童发展》杂志，请诸福棠为杂志写了发刊词，他开头就说："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中外人士荟集于此，不但向往其燕赵遗风、猿人古迹、历代文化遗产和崭新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还看到千千万万俊秀的少年儿童，在他们身上展现着光明灿烂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中国儿童发展中心"新屋落成时，诸福棠和胡亚美前往祝贺。诸老欣喜之余，赋诗二首表心意：

雄心壮志建文明，
奋斗艰辛育幼英。
生产全凭科技化，
健儿四亿保和平。（到2000年我国儿童将达四亿）

静安团结好登楼，
细雨和风最自由。
才德兼备前程远，（两个文明不可偏废）
儿童幸福乐优游。

第二十二章　晚霞高照

一、老当益壮

比世纪同龄人还年长一岁的诸福棠已进入耄耋高龄，从旧社会承受下来的瘦弱多病的身躯没有影响他积极上进的人生观和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在旧社会五十年，我体重一直不到五十公斤，如今却有六十二公斤"，老人非常高兴，经常对人夸耀。1982年，他坚决辞掉了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和中华儿科学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在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他做了题为《新陈代谢是自然界的永恒现象》的发言："目前玉宇澄清，四化在望，更喜会务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在儿科事业方面，已经开过第八届全国学术会议，人才辈出，后继力量非常雄厚，正是我引退的时刻。从此我将愉快地从旁协助会务，尽心力所及，对儿科建设工作略尽天职，稍献一得之见。我认为新陈代谢是自然界的永恒现象，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明白这个道理。人类社会正如达尔文进化论所提示的那样，应当是永远前进，自强不息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是自然界永恒现象。老中青团结协作，使新的社会日臻完善，才能加速自然界的进化。"

从此诸福棠把领导职务让给了新秀，退出了繁忙的第一线，只担任名誉院长、名誉主任委员。但至今已六七年，他一天也没有好好休息过，开始他照常去医院办公室，到科室、病房，指点工作，样样关心。1985年秋，他突患脑血栓病，右侧肢体

麻木，住院治疗后回家休养，这才每天在家里书房工作。疾病袭来，他处变不惊，精深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使他对微妙的人体结构和各种病理变化了若指掌，洞若观火。1936年1月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的右侧麻木感觉渐见减轻，但由于左脑患微血管血栓之处，显然是右侧异常感觉的根源，必须有耐心地等待该病区逐渐出现侧支循环，使血流得以畅通病区才能使症状消失，所以我很乐观地作适当的疗养及锻炼，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达到这个目的。虽然我的体质上有了暂时的缺陷，我的精神仍是照常活动的，总觉得老年虽然免不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病变，我的积极人生观还想利用余热，发挥一些对社会有好处的作用。"

上了年纪就会不断添病，何况他本来体质就弱。这脑血栓是很令人气恼的，诸福棠病得虽不算严重，却也造成许多麻烦。从厕所出来，右脚上的拖鞋失落了竟毫无察觉，就那么光着脚走。右手的麻木最讨厌，因为它影响老人提笔工作。于是便针锋相对地进行积极的锻炼，每天练写毛笔字，又购得两只保健球，时常握在右手里滚动。每天早餐后，老人就坐在书桌前开始读、写，隔一两小时起身到住房的狭窄过道里往返踱一千步，以加强肢体活动。他的诚心和毅力令人感动，也使疾病却步，老人健康有所好转，精神更旺盛了。

便秘，这个断不了根的痼疾，使诸福棠大半辈子不得安宁，灌肠器、药物轮番使用，痛苦不堪，到了晚年仍摆脱不了这顽症的困扰。有时半夜起来吃根香蕉，以增加胃肠蠕动，促进排泄；用药尚须当心，稍一不慎反要泻肚，给家里人添不少麻烦。老人一生为他人疗疾除病，同时坚定顽强地同自身的疾病斗争，忍受着难言之苦，自强不息地努力做出奉献。

三四十年前的老朋友得知诸福棠如此长寿，都很高兴。人的生命力竟如此神奇般的强大。为纪念协和七十周年出版的《话说老协和》一书中，在著名血液病专家邓家栋教授写的

《内科大巡诊杂忆》一文后面，附有一幅生动有趣的漫画，题为《1940年内科G－3病房大巡诊》,作者是协和1940年毕业生林俊卿，想不到这位善于绘画和唱歌的大医生有这样高超的美术素养，他把25位协和教授全部入画，抓住各自的形体特征，夸张但不违真实地用漫画形式刻画出来。诸福棠在他笔下显得尤为突出，那瘦削的脸成了一个尖尖的倒三角形。诸福棠的大女儿美端很象父亲，同志们问她为什么那么瘦，她拿出30年代同父亲的一张合影做答。那是在一个游泳池边照的，父女俩都着泳装，小姑娘倒看不出什么特殊，那父亲一副如柴瘦骨十分显眼。

就是这副身子骨，解放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强大的思想力量战胜和弥补了体力的欠缺，诸福棠奋发进取，赛过青壮年。他的学生江载芳说："老师思想开朗，没有私心杂念干扰，没有个人烦恼，定能长寿。"李同说："我们老师治学精神好，医德高，不亚于唐代的孙思邈，也能活过这位百岁药王。"

弟子们把老师的健康长寿看做是自己的幸福，时时关怀着老人的生活起居。诸福棠三十年代在协和任教时的一位高足定居国外已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与老师恢复了联系，几次回国探望，为老师的健康操心。诸福棠患脑血栓惊得这位高足更加不安。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给老师写信，劝诸福棠信奉上帝，祝愿老师获得"永生"。老人为弟子一片深情所动，却不能从命信天主。他给学生复信说：

"××教授：由胡亚美院长转来函及新年贺片均已收到。对您祝愿我的健康早日恢复表示感谢。我由于从小未受宗教训导，对任何宗教均无倾向性，但是我的人生观是愿意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我们人类永远是前进的，主要是依靠科学和文化，把人类比较迅速地推向前进。为了使人类前进（进化是自然界生物的原则）得快，必须注重精神（道德观念与思想意识的向上进步）与物质文明同步并进，所以中共提倡两个文明一起抓，

是正确的，无非是要人心都向善而且还要帮助别人一同前进，这与基督教的宗旨基本上是相同的，并无大矛盾。像您这样处处助人为善，我祝您长寿常乐。"老人的话说得策略，得体。

二、岱顶日月新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诸福棠所做的巨大贡献，近年来连续给了他各方面的荣誉。

他连年被评为医院和卫生局的优秀共产党员。1981年建党60周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事迹载入市委刊物《支部生活》专刊。

1987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少年儿童工作者座谈会，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在会上授予诸福棠"热爱儿童"荣誉奖章，同时受奖的还有孙敬修、陶淑范和斯霞三位全国知名的少年儿童工作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全国报纸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新闻，并刊登了四位老人受奖时的大幅照片。

诸福棠主编的《实用儿科学》新版本，获得1988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他偕同另两位主编吴瑞萍、胡亚美参加了当年9月10日举行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主办的授奖大会。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评选委员会主任、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发言，称颂科学家的奉献精神。

从数量的概念讲，一，是微不足道的最少值，但是，诸福棠的几个"一"：一项发明，一部著作，一座医院，一支队伍，却可以说是难以计量的巨大贡献。诸福棠如此高寿，也可以说是开始登上了年龄的顶峰吧！

但是，老人对所有这些荣誉并不自鸣得意。他清楚，到达

顶峰是一步一步艰苦攀登的结果，一步登天万不可能。他寄厚望于刚刚起步和在登临途中的后生晚辈和各路新秀们，不畏艰辛，忘我无私地多做贡献，加快步伐，尽早登上各自的“珠穆朗玛峰”，把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上世界最高峰，而不仅仅是把个人的声名留在高处。

诸福棠两度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绝顶，最近这次感触尤深，他那高昂的气势和深邃的意境大大超过古人。1984年再登泰山返京后老人提笔述怀：

“余登泰山两次，第一次在1936年夏，我和老伴偕同老友胡传揆夫妻乘便轿至中天门，然后步行登山，经十八盘，到南天门庙内住宿，翌晨4时拥棉被迎风东行，至日观峰瞭望东海日出，可谓海阔天空，赏心悦目。但国难临门，日本帝国主义者连年猖獗，处心积虑要吞并我国。不久，出现了西安事变，迫使南京政府共同抗日，八年抗战终于获得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强的里程碑，我们必须衷心歌颂。第二次，由全家后辈陪侍赴青岛海滨疗养，回途中路经济南，再登岱顶，是在1984年秋旬，正值新中国建立三十五周年前夕，全国欣欣向荣，农村初步繁荣，城市企业走上改革中兴的道路。斯时重游泰山，由山东省卫生厅马际芬处长、省立医院儿科主任杨亚超教授等陪同登临，搭坐了新建的缆车，自中天门到达南天门仅十余分钟，在山顶招待所进餐；看到全国来的工农兵学商以及国外来的旅游者络绎不绝，不禁回忆这三十五年来翻天覆地的伟大建设，亦历尽了颠沛流离的十年内乱，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领导正确，政策开明，迎来了今天的光明前途。我年已八五，老弱无能，但愿青年同志们能在这样的盛世努力前进，不但能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党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等同志所号召的‘四化’大业，还要在未来的世纪中进一步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引导人类登上更高的山峰，建设更美好的文明科学和和平的世界。”当时曾做纪游诗一首：

江山留胜迹，耄耋复登临；

一线通云外，岱顶日月新。

八五高龄老翁登上泰山之巅，实属难能可贵。他那昂奋的精神状态和盼望年轻一代"登上更高峰"的亲切急迫心情，更是感人。由泰山返京不久，诸福棠被邀请参加35周年国庆大典，可惜因身感不适体力不支，未能亲赴天安门观礼。老人兴致勃勃地同家人一起观看电视，从头至尾看完了游行和阅兵等庆祝盛况，忽见学生队伍里高举起一幅醒目的标语："小平您好！"老人十分激动，深感青年学生确实思想敏锐，关心国家大事，他们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里话。老人激动之余，提笔作五言绝句：

虎啸云端起，龙腾"天下"先；

中兴看伟业，不醉亦陶然。

三、另一种丰收

诸福棠自幼受过诗辞歌赋的熏陶，文学根底好，虽一生从事医学和科学研究，偶而兴之所至，也提笔赋诗。晚年心境如此美好，看大局，喜上心头，时时文思泉涌，诗兴大发，近年是他诗作的丰产期。

但他"不书儿女情，不作风月诗"，不恪守儒家诗教的复古之作，是对现实生活深有所感而抒情言志。正如周恩来同志谈文学创作时说的，灵感是"长期积累，偶而得之"，诸福棠作诗极少即兴草成，那字里行间饱含着他积年累月蕴积的丰富的思想感情。他是个虽不外露但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他真心地、全心全意地爱着孩子，爱着他人，爱着祖国，这颗诚挚的爱心，贯穿着他的一生，如今借着五言、七绝喷涌而出了。

他写《颂社会主义二首》：

封建消踪军阀收，自由民主遍神州；

严刑普教兴经济，贪吏瘟神永不留。

人民竞赛均劳酬，贫富同谋风雨舟；
今后康庄多大道，子房不需赤松游。

又写《赞小平同志抓年轻化制度》：

终身旧制羁进论，颖脱多才代谢新；
永不倦飞迎夕暮，峥嵘喜看接班人。

当诸福棠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家人齐集祝寿。他对儿孙们说："今天家人齐集一起庆祝我的生日，更有意思的是庆祝新中国三十周年，我看到社会主义的祖国复兴起来，欣欣向荣，我家后辈努力学习，蒸蒸日上，感觉到前途无限光明，我要讲几句话：少长咸集，东西交流；科学昌明，四化在望。老人又做感怀诗一首：

生平常碌碌，瞬息耄年期；六代烟云过，三山魔力移。人间新国立，天际卫星驰；沧桑是正道，喜看进化棋。

1985年，北京儿童医院三十周年院庆，老人赋诗志贺：

护城河畔菜园周，大厦高楼弹指秋；
专设杏林医稚幼，党心温暖照神洲。(彭真同志为本院创办人，经常关心院务)
扶伤救死有奇才，负襁携手千里来；
莫道嫩苗培育苦，岁寒松柏此时栽。

诸福棠最高兴听到哪里又新建了儿童医院，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快慰。1988年湖南儿童医院落成开幕，院长赵祥文特邀诸福棠光临指导，老人不便远行，由胡亚美代表前去祝贺，自做贺诗一首驰送长沙：

洞庭秋水捷音传，保卫髫龄种福田；
儿院神州三十处，欣逢盛世迎新贤。

这里说的三十处是指当时全国儿童医院的数量已达三十处，不久以后很快达到三十四个儿童医院，使诸福棠满心喜悦。

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诸福棠的亲朋好友时有仙逝，他几乎为每一位亡友赋诗志哀，仅录《胡传揆老友久病后逝世，作悼联》：

庆盛世足迹遍四海，消灭性病，根治发癣，防止麻风，从来良医疗疾，君为先驱；

忆往事同窗逾八载，欢迎解放，振兴医学，培植新人，而今级友凋谢，我愧独存。

我愧独存！诚挚谦虚的可敬老人，感人肺腑的四字诤言，这里有老人对亡友的深沉哀思，有督促自己晚年再做贡献的良好心愿。

诸福棠有《实用儿科学》这历久不衰青春常在的大部著作奉献；这位名医兼诗人的众多力作不是也应当随传记刊出以飨读者吗！

四、心怀天下事

诸福棠的晚年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朋友问："您晚年都做些什么？"老人笑答："我消遣的方法很多。"是这样的。他重温古人名篇，但不是钻故纸堆发思古之幽情。他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新的领悟和更深切的体会。读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超然台记》，摒其超脱尘世的老庄思想、消极情绪，学其达观豪迈、喜爱人间、无往而不乐的精神。老人订阅了《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英文《中国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每天认真阅读，尽情欣赏改革开放四化大业的令人振奋的各项成就，追踪世界风云变幻，真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看世情发展，国事日进，老人说："这正合我意，进步就好。"他最喜爱中国地图，每出新版图本，立即购来，爱不释手，尤其注意哪里又新修了铁路。常忆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听孙中山先生演讲"建国方略"、"建国

大纲”；喜看人民中国正把孙中山先生“广筑铁路”的宏伟计划付诸实施。象如今正在兴建的大秦（大同至秦皇岛）新线，则是我们这位尊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所未曾设想过的。老人自幼爱花，时常去公园观赏，自家书房、居室也育有多种花卉，于姹紫嫣红间自寻雅趣，其乐陶陶。这些都不失为长寿之道。

当然，老人最关心的还是日夜挂在心头的儿科事业，每天要花更多时间浏览国内外书刊，指点第一线的医疗、科研工作。他认为，这是自己最大的乐趣、最好的消遣。有关医学书刊堆满桌，特别是新出的必一一细读。曾两度赠款资助儿童医院赴美进修生的许汉光教授，自1987年起每年花一千美元购买在美国出版的最新儿科书及其他刊物，寄给老师诸福棠，老人读后都交医院图书馆，供大家阅览。老人如饥似渴地追索着国际最新进展，及时把各专业的新知识新信息转达给各科室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帮助大家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安徽老保姆有时发现凌晨四五点钟诸福棠书房的灯就亮了，推门一看，老人家正在潜心读书写作。《中国科学报》每期赠送，中英文的中华医学杂志，美国和日本小儿科杂志等国外刊物以及北京、上海、沈阳、河南新乡各省市所刊出儿科杂志等书刊资料，定期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老人凭着自幼养成的读书习惯、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刻苦认真的工作精神，在书海里尽情畅游，乐在其中，为他的第二生命——《实用儿科学》不断增添新内容。最近的新版本两大册常置案头，新书拿到手的第一天就写进了修改意见，目前各章节的边角、页缝间又被老人“修饰”得琳琅满目了。随着儿科事业的不断发展，这部大书将不断再版。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国际交流、中外来往日益增多，诸福棠的晚年也添了几多同国外的联系，友好往来不少。三十年代在美国进修时的导师麦肯教授十分怀念诸福棠，诸福棠也不忘这位师友的情谊。近两年，麦肯的两个都是医学教授的儿子先

后来我国，探望诸福棠，被待为上宾，受到热情款待。自己平日从不挑吃，随保姆的便；来了贵客，诸福棠要亲自点菜，摆满一桌。麦肯之子请诸老对父亲说说话，录下音来，带回美国，放给以轮椅代步的老父亲听。1988年3月，90岁的麦肯教授去世，噩耗传来，诸福棠不胜哀痛，“我愧独存”之情又上心头。在他简朴典雅的书房兼客厅里，除了经常有全国各地的儿科后辈和医界同道前来拜望，许多国外朋友也不断成为座上客。

五、只愿大地满阳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儿童医院又取得了新的发展变化。身处其中的诸福棠对医院十年来的长足进步很感振奋。十年浩劫害得我们国家几近崩溃，科技事业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了。北京儿童医院急起直追，从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加快步伐，屡有建树。他们组成北京市协作组，参加全国维生素D丸预防婴儿佝偻病的科研大协作；制定了本院的科研规划，开展了白血病、肺炎、肝炎、哮喘、粘连性肠梗阻五大科研项目；中药治疗肺脓肿被定为全国医药卫生和市卫生局的重点科研项目。召开多次全院学术报告会，出版了全院学术论文汇编。《多发性神经根炎护理经验》在全国护理新业务新技术交流会上宣读，并被编入《百科全书》的护理篇。1979－88年全院（包括研究所）共获76项科研成果奖，培训研究生43名。1978年增加病床50张，1980年又增加12张新生儿病床。各科室进一步细分专业，建立了30个专业组，开始建立小儿先天性心血管畸形诊疗工作。中医科也建立了实验室。资料室、照像室等科研后勤部门进一步加强。经市里验收，北京儿童医院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近年还创立了急救中心和医院管理、心理卫生、骨髓移植等新部门和新项目，引进国外先进议器设备。院内恢复了业余英语学习班，开办了各种业务培训班，大抓医护

人员的基本功训练。多年来医院被卫生部定为进修教育基地，承担全国各地的儿科医生的进修任务。成立了教学办公室和五个儿科教研室，更好地担负起首都医学院儿科系的教学任务。国际学术业务交流频繁，有些科研项目得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全国小儿急救中心之一，成立了急救外科，接受委托，训练急救外科人员。

“欲穷千里目”的诸福棠永不满足，高兴地看到附属护士学校和托儿所大楼落成之后，又为新建一座业务大楼操心。1985年医院三十周年院庆时，前来祝贺的陈希同市长当着老院长的面表态：一定大力支持大楼早日动工建成。老人又和胡亚美联名上书当时的李鹏代总理，请中央多予关照，给以支援。目前，一座造型新颖美观的业务大楼已拔地而起，即将完工，届时，医疗急救单位、儿科研究所、儿童保健所都可迁入，那些无处安放、只好堆在医院楼道里的新购现代化仪器设备可以安家落户了，医疗、保健、科研事业更可大展鸿图了。1987年9月，新老院长一行乘车前往京南良乡，视察新建的以江载芳为名誉院长的北京儿童医院分院，诸福棠不顾年迈，仔细观看了病房、科室等全部建筑，欣喜万分，极感快慰。

时代飞速前进，新事物层出不穷。以不断探索创新为己任的诸福棠就是新事物的创造者，他在新版《实用儿科学》里加进了胎儿诊断、免疫缺陷和医德等新篇章；向市卫生局提出今后最好能把儿童医院和妇产医院建在一起的新设想。在新事物面前，这位青春永驻、活力常存的科学家总是喜不可支，张臂欢迎。最近，久负盛名的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医院与北京儿童医院结成姊妹医院，老院长很兴奋，亲自拟定迎接加拿大客人的日程安排，起草欢迎词，一直忙到午夜。在庆祝会上，卫生部长陈敏章、加中儿童保健基金会名誉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和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出席致词。加拿大籍华裔著名儿科教授、加中儿童保健基金会主席谢华真随团前来，在两院结成姊妹医

院的仪式上,他尊称诸福棠为“中国儿科之父”,并表示将筹集“诸福棠奖学金”,帮助优秀青年儿科医师出国进修。前不久，台湾淑馨出版有限公司通过人民卫生出版社征请诸福棠同意，由他们翻印出版繁体字的《实用儿科学》。诸福棠、吴瑞萍、胡亚美三位主编收到信函的当天，就在复函上签名盖章,表示同意。海峡两岸同胞心相连，诸福棠十分高兴把自己几十年的心血成果献给台湾同胞。这不是那家出版公司对诸福棠个人的恭维抬举，而是他们有远见卓识，扩大两岸学术交流、造福广大儿童的义举。

树有根，水有源。老院长常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离开党的教育。”他一次不落地参加组织生活，同志们建议党小组会在老人家里开，未获老人同意。每次党组织有活动，诸福棠由女儿搀扶着准时到会。党课也常常到,戴上助听器,坐在第一排，全神贯注地认真听讲。年近九旬的老教授关心着全国、全党大事，淡泊无私，心情总是那么愉快舒畅，不念老之已至。

老年人常常回忆那些年深日久的往事，有些事是留有遗憾之感的。他多年来觉得不安和歉疚的一件事，是感到自己遮掩了好友吴瑞萍的才能。自从二十年代在协和医学院前后同学，毕业后同在小儿科工作，又携手建功立业，至今已六十余载，两人可谓形影不离，情谊之深厚无与伦比。诸福棠年长 8 岁，在医学院早毕业 6 年，在领导工作岗位上诸福棠一直是正职，吴瑞萍始终任副手。论资历与学问的渊博，吴瑞萍虽不能和诸福棠相比，但这位长于小儿传染病学的知名专家，一般重任都担得起。可是他尊诸福棠为师，常对人说:“诸院长的优点我一辈子也学不完。”前些年诸老引退要吴瑞萍继任院长，吴瑞萍坚辞不受，把位置让给了正当年富力强的胡亚美教授，自己只接任了一届中华儿科学会主任委员，过了几年又交给了协和的周华康教授。这是吴瑞萍由衷的真诚的意愿和他的一贯作风，也是当初办理私立儿童医院团结合作精神的延伸。

“桃园三结义”的佳话久被传诵，可惜1973年折损“大将”邓金鍌,令人悲痛泪下。这是诸福棠等三人创办儿童医院以后遇到的又一件极为惨痛的事。诸、吴二老每念及此，无不痛惜。1988年3月13日是邓金鍌逝世15周年，诸老约了吴瑞萍率诸美瞻、吴津（吴瑞萍之女),陪同邓夫人及其家属到八宝山公墓向邓金鍌遗像和骨灰盒致敬。怀念当年同心协力办医院的深情厚谊，不禁黯然神伤。

诸、吴二老都是共产党员，又有半个多世纪的亲密相处，同志情、挚友爱把两位老人连结得更紧密了。象过去一样，诸福棠有什么重要事情总要听听吴瑞萍的意见；年轻几岁的吴瑞萍常过来坐坐，对诸老一片赤诚之心胜过兄弟、师生之情。他对诸福棠的敬重爱戴，是内心深处生出的一种十分纯洁真挚的感情。

老年人常常怀旧。彭真想念老朋友，约请诸福棠、吴瑞萍、胡亚美到家便餐，叙旧。诸福棠多年不见曾携手共建儿院大厦的彭真同志，两人相谈甚欢。同多年至交畅叙友情乃人生一大乐事，更是晚年一种安慰。

凡接触过诸福棠的人，都会被他高尚的品德和人格力量所吸引、感染和折服。老人用自己美好的心灵美化着人们的心灵。出国进修是令人羡慕的“美差”,诸福棠不让自己的女儿去，叫英语水平更高的另一人代替。诸福棠用亲切真挚的深情盼着儿科队伍迅速成长，不断壮大。他的学生们很了解老师的心情，常常应老师的要求把自己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带到老师家，让这些年轻人向老爷爷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谈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老人高兴极了，用爱抚的目光和亲切动人的话语给后辈们以鼓励和鞭策。出国进修的年轻医生愿意和老院长通信，不仅仅是请安问好，谈的多是学习研究方面的事，还给老院长通报新信息。老人是每信必复，亲自动笔，那认真劲儿不亚于撰写学术论文。

诸福棠把自己当作一滴水，溶于时代大潮中，他与党与人民同呼吸，忧乐与共。他关心政治，为改革开放四化大业中的每一进步和成果叫好。他的学生、儿科医生何鲁丽被选为西城区副区长，不久又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诸福棠修书一封致贺：

“新年里真有新的好消息。昨天读报，知道你被邀担任本地区行政任务，从‘良医’而进入‘良相’之范畴，从此可以施展你的才智，为社会主义社会谋福利。欢欣之余，驰函祝贺，祝愿你在国家改革前进中大有作为，前途非常光明。良相良医都以仁慈济世为怀，在本质上原是相似的。今天，你由从医扩大到从政，服务范围扩大了，而且服务的性质也无限制地扩充到每一个角落。愿你学习孙中山先生和鲁迅先生从学医开始，以后从事革命，做出一番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包括为下一代人的保健培育人才的工作在内。”

何鲁丽立即给老师复信：“赐书敬悉，拜读后热泪盈眶，不能自已，我深深地感受了您对我的鼓励和厚爱。如果说过去二十多年为病儿服务的过程中有点成绩的话，那是与您的教导分不开的。您和吴院长（瑞萍）、胡院长（亚美）以及已仙逝的邓院长（金鎏）的高尚医德，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和鞭策自己的力量。许多几十年前的事一直萦绕心头，您关于首先要有责任心，要千方百计为病儿想办法的教导，是您的学生包括我在内一直牢记不忘的。”

诸福棠的晚年过得幸福愉快，不断有使他高兴的新消息。1989年2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召开隆重大会，表彰210名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市委书记、市长亲临祝贺致敬，这些专家获得荣誉证书和晋升一至三级工资的奖励。这里边就有诸福棠的得意门生胡亚美、江载芳和隔代弟子、现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樊寻梅。

诸福棠有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他以赤子之情无比痛恨那股虽非主流却令人不安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现象，为第二次“读书无用论”的泛起而焦虑。他对细微末节都一丝不苟地恪守原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更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1987年是他从医60周年。医院和市卫生局决定为他举行较大规模的表彰庆贺活动，已批下三万元专款。诸福棠坚决反对，决不从命，都生气了。他给卫生局局长孙衍庆写了一封信：

“正当国家大力实行‘双增双节’的时候，请停止此类活动：第一，去年国家支出超过收入，赤字高达数十亿元。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后压缩重点放在非生产性的支出。我认为节约应从一点一滴开始，多事祝贺，徒增虚靡之风。第二，刚刚庆祝过我院30周年，同时也大大表彰了我们年老的人，仅隔二年，无需再行祝贺，祝贺太多，效用难期。第三，中国科学院去年在人大礼堂已经大规模地庆祝过许多老年学术人员从事五十年以上学术活动，我也为其中之一，已经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鼓励和祝贺，更不用多次同样性质的祝贺。第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已经多次得到党和国家的表扬。现在年迈多病，无所作为，更不敢惊动同志们。而且目前励行勤俭建国，艰苦奋斗，更应当一切从我做起，减少靡费，于心稍可自慰。”

卫生局领导尊重老院长意见，取消了庆祝活动，并号召全市医务人员学习诸老为国分忧、从我做起的高尚精神。

这种高尚精神何止医务人员应该学习呢？在一些庸俗、腐败之徒看来，也许认为老教授过于古板，跟不上“新潮”吧。这就是鹰和鸡的不同。一次，某君有求于诸老，带来丰厚礼品。老人按原则办事，未允所请，并且怒冲冲地追出去把来人放下的礼物扔到那人的车上。去年诸福棠生日，医院领导送来一只庆寿的大蛋糕。老人感激组织的盛情关怀，却又十分不安，他说：“决不能让公家为我花钱！”退回蛋糕不合适，便设法问清了价钱，拿出30元连同一封言词恳切的信送交院方。

《实用儿科学》新版的一万元主编费，老院长和吴瑞萍、

胡亚美三位主编献出作为医院对优秀职工的奖学金；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的一千元奖金也同样捐献了。真是“一掷千金”！然而这与某些人滥用公款挥霍浪费的一掷千金，又是何等的不同啊！

1988年11月18日完稿

后　记

为诸福棠教授作传的想法由来已久，1985年才具体酝酿，花两年多时间搜集材料、进行采访，1988年写出初稿，费半年时间修改，基本完成。这是费了不少周折的。开始老人不同意为他写传，幸得北京儿童医院党委领导热情支持，亲自“说服动员”才获允准。而一向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从不突出个人的老教授是很难采访的，感谢他的众多同事、同道、学生、家属，包括他的司机、老保姆以及他故乡无锡的亲朋好友，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情况和资料；感谢吴瑞萍、胡亚美、江载芳教授等诸老的挚友、门生帮助审核文稿；尤其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李同主任医师和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余鸾雏主任医师为本书的写作、校阅、出版花了许多精力，默默地做出了可贵的奉献，在此对她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谢忱。

深知诸福棠教授的思想作风和高尚品德，作者是怀着深深的崇敬爱戴之情进行写作的。作者是北京日报、晚报的记者，从建国之初就不断对诸老进行采访，尊老人为师长，几十年相处，老人以忘年交相待。学着诸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严细作风，自信作品是忠实于老教授的真实情况的；但初稿送老人审阅时，他做了大量删改，尽量压低对自己的评价，缩小个人作用，却不惜笔墨对另方面加以补充，对书中涉及他的同学、同事和学生晚辈多所赞扬。修改过程中，一般都尊重了他的意见，只有一处未能从命，作者坚持称他为“我国现代儿科学奠基人”，因为事实如此，群众亦都同意的。这是从《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一书中“移植”来的。

水平所限，未能将这位著名医生、科学家和教育家介绍得尽如人意。如果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朋友们能从中得到些有益的启示，学做诸福棠这样有远大理想，多用公心，忘我奋斗，努力为国为民多做贡献的人，那将是对作者的极大奖励。

刘文典

1989年6月

中国现代儿科学奠基人——诸福棠教授的一生　　刘文典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胶印厂印刷　850×1168　1/32

6印张8插页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4.20元

ISBN 7—80037—329—0/K·11

责任编辑：伏　琥
封面设计：宁成春

ISBN 7—80037—329
0/K·11　定价：4.20